

安徽人民出版社

武汉师院 江苏师院
郑州大学 安徽大学
南京大学合编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小辞典



Voice Of Marxism-Leninism
Group Of EBOOK

制作

编 者 的 话

这部小辞典是应高等院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需要而编写的，同时也可供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学习参考之用。

本书的编排，是按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历史顺序，将问题分类集中。全书分六部分：（一）马列、毛主席著作；（二）重要人物；（三）重要政党组织；（四）社会主义流派思潮；（五）重大历史事件；（六）重要名词术语。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陆善炯、李明新、周惠珍、李世达、吕玉屏、滕世宗、林今柱、杨纯仁、吴运祚、田广业、陈汉生、徐报伍、卢颂江、聂运林等十四位同志。部分青年教师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并得到了兄弟院校和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我们深表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时间仓促，缺点和错误之处自知难免，欢迎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七九年三月

目 录

(一)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
《共产党宣言》	(2)
《论波兰》	(4)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5)
《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6)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8)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0)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12)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	(13)
《法兰西内战》	(14)
《论权威》	(15)
《哥达纲领批判》	(17)
《反杜林论》	(19)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 等人的通告信》	(21)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23)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25)
《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	(26)
《法德农民问题》	(27)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 民主主义者？》	(29)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31)
《怎么办？》	(32)
《进一步，退两步》	(34)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36)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38)
《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	(40)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	(41)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42)
《论民族自决权》	(43)
《卡尔·马克思》	(45)
《第二国际的破产》	(47)
《社会主义与战争》	(48)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49)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	(52)
《国家与革命》	(53)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56)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57)
《伟大的创举》	(59)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60)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62)
《论合作制》	(63)
《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64)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65)
《论列宁》	(67)
《论列宁主义基础》	(68)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	(69)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	(70)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72)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73)
《实践论》	(75)
《矛盾论》	(76)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78)
《新民主主义论》	(79)
《改造我们的学习》	(80)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 报告》	(82)
《论人民民主专政》	(83)
《论十大关系》	(84)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85)

(二)

托马斯·莫尔	(87)
康帕内拉	(88)
摩莱里	(88)
马布利	(89)
巴贝夫	(90)
卡贝	(91)
黑格尔	(92)
费尔巴哈	(93)
亚当·斯密	(93)
李嘉图	(94)
圣西门	(95)

傅立叶.....	(96)
欧文.....	(97)
梯叶里.....	(99)
米涅.....	(99)
基佐	(100)
布鲁诺·鲍威尔	(100)
克利盖	(101)
格律恩	(101)
魏特林	(102)
约瑟夫·莫尔	(103)
沃尔弗	(103)
亨利希·鲍威尔	(104)
魏德迈	(104)
沙佩尔	(105)
哥特沙克	(106)
波尔恩	(106)
路易·勃朗	(107)
阿尔伯	(107)
布朗基	(108)
马志尼	(109)
加里波第	(109)
施蒂纳	(110)
蒲鲁东	(111)
巴枯宁	(111)
拉萨尔	(113)
施韦泽	(114)

莫斯特	(114)
哈赛尔曼	(115)
杜林	(115)
俾斯麦	(116)
威廉·李卜克内西	(117)
倍倍尔	(118)
左尔格	(118)
白拉克	(119)
燕妮·马克思	(119)
埃卡留斯	(120)
库格曼	(120)
龙格	(121)
拉法格	(122)
赛拉叶	(123)
东布罗夫斯基	(123)
符卢勃列夫斯基	(124)
德米特利耶娃	(125)
米歇尔	(125)
弗兰克尔	(126)
费烈	(126)
瓦尔兰	(127)
瓦扬	(128)
鲍狄埃	(128)
狄盖特	(129)
梯也尔	(129)
卡尔·李卜克内西	(130)

卢森堡	(131)
蔡特金	(131)
梅林	(132)
辛格尔	(133)
伯恩施坦	(134)
考茨基	(135)
福尔马尔	(136)
谢德曼	(137)
休特古姆	(138)
列金	(138)
大卫	(139)
希法亭	(139)
英克平	(140)
海德门	(140)
麦克唐纳	(141)
盖得	(142)
米勒兰	(142)
饶勒斯	(143)
龚帕斯	(143)
屠拉梯	(144)
万·科尔	(145)
阿德勒	(145)
奥托·鲍威尔	(146)
布兰亭	(146)
格里姆	(147)
王德威尔得	(147)

胡斯曼	(148)
赫尔岑	(148)
别林斯基	(149)
车尔尼雪夫斯基	(150)
普列汉诺夫	(150)
克鲁泡特金	(152)
米海洛夫斯基	(152)
查苏利奇	(153)
阿克雪里罗得	(154)
波特列索夫	(154)
马尔托夫	(155)
波格丹诺夫	(156)
卢那察尔斯基	(157)
司徒卢威	(158)
克伦斯基	(158)
策烈铁里	(159)
巴布什金	(160)
克鲁普斯卡娅	(160)
阿尔曼德	(161)
捷尔任斯基	(162)
斯维尔德洛夫	(162)
托洛茨基	(163)
季诺维也夫	(165)
李可夫	(166)
加米涅夫	(166)
布哈林	(167)

拉狄克	(168)
潘涅库克	(169)
片山潜	(169)
贝拉·库恩	(170)
台尔曼	(171)
季米特洛夫	(171)
福斯特	(172)

(三)

雅各宾派	(174)
吉伦特派	(175)
青年黑格尔派	(175)
流亡者同盟	(176)
正义者同盟	(177)
四季社	(178)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178)
全国宪章协会	(179)
北美土地改革派	(180)
全国职工联合会(英国)	(180)
民主派兄弟协会	(180)
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181)
共产主义者同盟	(182)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	(183)
德意志工人协会	(184)
德国工人俱乐部	(184)
科伦工人联合会	(185)

科伦民主协会	(186)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186)
芬尼亚社	(187)
全德工人联合会	(188)
第一国际	(189)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190)
爱森纳赫派	(190)
劳动骑士团	(191)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192)
美国社会劳工党	(193)
苏黎世三人团	(194)
可能派	(195)
劳动解放社	(195)
社会主义同盟	(196)
美国劳工联合会	(197)
第二国际	(19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9)
英国独立工党	(200)
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201)
崩得派	(202)
国际社会党执行局	(202)
费边社	(203)
青年派(德国)	(204)
英国工党	(204)
美国社会党	(205)
经济派	(206)

社会革命党	(206)
布尔什维克	(207)
孟什维克	(208)
世界产业工人联盟	(208)
取消派	(209)
立宪民主党	(209)
召回派	(210)
人民社会党	(211)
劳动派	(211)
英国社会党	(212)
八月联盟	(212)
斯巴达克联盟	(212)
“左派”共产主义者	(213)
民主集中派	(214)
第三国际	(214)
伯尔尼国际	(215)
军事反对派	(216)
国际联盟	(217)
工人反对派	(217)
第二半国际	(218)
托季联盟	(219)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220)

(四)

科学社会主义	(221)
德国古典哲学	(222)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223)
空想社会主义	(224)
空想共产主义	(225)
斯巴达式共产主义	(226)
魏特林主义	(226)
封建社会主义	(228)
基督教社会主义	(229)
“真正的”社会主义	(229)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231)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232)
庸俗社会主义	(232)
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	(233)
布朗基主义	(234)
波拿巴主义	(234)
蒲鲁东主义	(235)
工联主义	(237)
拉萨尔主义	(238)
国家社会主义	(239)
巴枯宁主义	(240)
无政府主义	(242)
无政府工团主义	(243)
基尔特社会主义	(243)
社会民主主义	(244)
改良主义	(245)
机会主义	(246)
讲坛社会主义	(247)

合法主义	(248)
议会主义	(249)
新康德主义	(249)
伦理社会主义	(250)
马赫主义	(250)
马尔萨斯主义	(252)
自由主义	(253)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	(253)
米勒兰主义	(255)
考茨基主义	(256)
农民社会主义	(258)
民粹主义	(258)
合法马克思主义	(260)
国际主义	(261)
狭隘爱国主义	(262)
民族主义	(262)
大国沙文主义	(263)
泛斯拉夫主义	(264)
殖民主义	(265)
军国主义	(266)
帝国主义	(267)
社会沙文主义	(267)
社会和平主义	(268)
民主社会主义	(269)
革命护国主义	(270)
托洛茨基主义	(271)

法西斯主义	(272)
纳粹主义	(273)
绥靖主义	(273)

(五)

一六四〇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275)
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276)
英国工业革命	(277)
英国废除谷物法运动	(278)
英国议会改革运动	(279)
英国宪章运动	(279)
十小时工作日运动	(280)
法国七月革命	(281)
法国里昂工人起义	(281)
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	(282)
十九世纪波兰民族解放运动	(282)
美国独立战争	(283)
美国南北战争	(284)
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	(285)
法国二月革命	(286)
巴黎工人六月起义	(287)
柏林三月起义	(287)
德国护宪运动	(288)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289)
芬尼亚运动	(289)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290)

一八六一年俄国农奴制改革	(290)
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291)
普法战争	(291)
法国九月四日革命	(292)
巴黎公社	(293)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295)
米勒兰事件	(295)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296)
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	(297)
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	(298)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	(299)
巴塞尔宣言	(299)
日俄战争	(300)
斯托雷平反动时期	(301)
第一次世界大战	(301)
第二次世界大战	(302)
布拉格代表会议	(304)
齐美尔瓦尔得会议	(305)
昆塔尔会议	(306)
俄国二月革命	(307)
七月事变	(308)
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	(308)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309)
苏维埃和平法令	(311)
苏维埃土地法令	(311)
苏维埃国内战争	(312)

一九一八年芬兰革命	(312)
布列斯特和约	(313)
奥匈帝国一九一八年革命	(314)
德国十一月革命	(315)
匈牙利一九一九年革命	(316)
日本“米骚动”	(317)
朝鲜人民“三·一”运动	(317)
印度尼西亚一九二六年起义	(318)
基马尔革命	(318)
英国一九二六年大罢工	(319)
国会纵火案	(320)
慕尼黑协定	(321)
德黑兰会议	(322)
茉莉芬事件	(322)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323)
亚非会议	(323)

(六)

《莱茵报》	(325)
《德法年鉴》	(325)
《前进报》	(326)
《新莱茵报》	(327)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328)
《民主周报》	(328)
《人民国家报》	(329)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	(329)

《社会民主党人报》	(330)
《新时代》	(331)
《纽约每日论坛报》.....	(332)
《火星报》	(332)
《曙光》	(334)
《无产者报》	(334)
《斗争报》	(335)
《真理报》	(335)
《国际歌》.....	(336)
君主制	(337)
君主立宪制	(337)
共和制	(338)
两党制	(338)
议会制	(339)
普选制	(339)
国家杜马	(340)
苏维埃	(342)
“三八”国际妇女节	(343)
“五一”国际劳动节	(344)
容克地主	(344)
第三等级	(345)
工人贵族	(346)
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	(346)
橡皮决议	(347)
“民族文化自治”	(348)
民族自决权	(349)

“社会主义殖民政策”	(351)
“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351)
“超帝国主义论”	(352)
战略和策略	(353)
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	
不平衡的规律	(354)
战时共产主义	(355)
新经济政策	(356)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358)

(一)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是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于一八四四年九月——一八四五年三月写成，同年五月在来比锡出版。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研究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时考察社会运动的基础和出发点。但是，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真实情况了解甚少，影响他们正确地深刻地研究社会运动。恩格斯为了给社会主义理论提供坚实的基础，抛弃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切空想成分，利用在英国居住期间，亲自考察工人的劳动和生活状况，所得到的科学材料，写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

在该书中，恩格斯研究了英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以这个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例，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系列规律；揭示了使工业无产阶级得以出现的产业革命的全部奥秘，强调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失业、周期性经济危机、工人阶级受剥削的加剧是不可避免的；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难以忍受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指出了无产阶级所处的这种地位必然会推动它去为自身的解放、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阐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批判了欧文派社会主义者鼓吹的博爱、友好的错误观点；总结了英国工人运动的经验，高度评价了宪章运动，称它是无

产阶级的第一次独立的政治运动，并强调指出：宪章运动必须和社会主义相结合。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是对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一份义正辞严的控诉书。它对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和促进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列宁认为这部著作是世界社会主义文献中最优秀的著作之一。它反映了恩格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进一步形成。

恩格斯认为，这本书还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说，在本书中到处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该书个别观点事实证明不正确，即共产主义是旨在把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都从现存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的理论。恩格斯后来对此提出了修正。他说：“这个论断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16页）

《共产党宣言》

是马克思、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而起草的第一部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写于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一八四八年一月。同年二月，用英、法、德、意、荷、丹六国文字在伦敦公布于世。第一个中文译本于一九二〇年在上海出版。现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宣言》是由前言和四章正文组成，后来马克思、恩格斯

又为它写了七篇序言。

《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第一次全面的、系统的论述。

《宣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出，在一切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各对立阶级之间不断地进行着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正是这种斗争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提出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著名原理；并对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进行科学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阐述了无产阶级产生、发展及壮大的过程，并指出其所担负的埋葬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阐明了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特点和作用，规定了党的纲领和斗争策略；驳斥了资产阶级对共产党人的攻击和诽谤，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批判了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潮，并对空想的批判的共产主义学说作了科学的评价，分析了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阶级实质及其历史作用；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战斗口号。

《宣言》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的问世，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列宁指出：“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列宁选集》第2卷，第578页）一百三十多年来，它一直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锐利思想武器。实践证明，它的

基本原理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全世界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

《论波兰》

是马克思、恩格斯于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一八三〇年波兰起义十七周年国际大会上的演说。现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一八三〇——一八三一年反对沙皇制度争取波兰解放的起义，由于掌握运动领导权的波兰贵族拒绝广大农民群众废除农奴依附地位的要求，没有能够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结果遭到沙皇的残酷镇压而失败。为了总结民族解放斗争的教训，阐明无产阶级对民族问题的立场和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这篇重要演说。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篇著名的演说中，第一次阐述了关于民族问题的重要原理。针对当时各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打着“各民族团结友爱”的旗帜，干着联合起来镇压被压迫民族和本国被剥削阶级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彻底消灭民族压迫，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是使一些民族剥削压迫另一些民族的根源。并且提出了“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8页）的著名论断。还指出，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把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民族的斗争看成是自己的斗争。德国无产阶级应当帮助波兰从德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本文论述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揭示了产生民族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阐明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这篇充满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著名演说，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理论的重要著作，是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思想武器。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是马克思、恩格斯于一八五〇年三月底为流亡国外的以及德国国内的“盟员”而写的关于革命斗争策略的内部文件。这个文件于一八五一年因几个盟员被捕而被普鲁士警察查获，刊登在资产阶级的《科伦日报》上。现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日益猖獗，许多共产主义同盟的盟员失去了跟“同盟”的联系，在组织上出现了涣散和瓦解的趋势，革命暂时转入低潮。在此期间，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趁机活动，并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起了支配和领导作用，严重地阻碍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开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恢复和发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组织，使无产阶级革命沿着正确路线前进，因此，为中央委员会写了这篇著名的通告——《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在该文中，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一八五〇年德国的政治形势，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占支配地位的原因，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阶级基础和行动纲领；预见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并根据这个估计，为无产阶级制定了策略路线；指出了必须建立一个坚强有力、完全独立的工人政党的秘密组织和公开组织的重要性，坚决反对把工人政党的作用降到官方资产阶级民主派附庸的地步；特别强调要使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立刻建立起独立

的武装工人组织，坚决以武装回击任何一种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要与农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不断革命论，指出对无产阶级来说，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是对一八四八年——一八四九年德国革命的经验总结，文中所提出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指导意义。它是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重要文献。

《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是马克思于一八五〇年专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写的一组连载文章，总题目叫《从一八四八到一八四九年》。它和马克思、恩格斯在同时期撰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都是从理论上总结一八四八——一八五〇年欧洲革命，特别是德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的。现选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在书中，马克思第一次提供了把历史唯物主义应用到历史研究上的光辉范例。他透彻地分析了法国革命事件的原因（尤其是经济原因）、性质和具体过程；总结了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澎湃的革命年代所创造的斗争经验，并用极其重要的新的结论丰富了自己的理论。根据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的教训，把工农联盟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意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马克思认为，如果革命进程还没有达到把农民发

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的地步；如果革命进程还没有发展到使农民认识到只有工业无产阶级是自己的领导者从而团结在它的周围，“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3页）并且指出，由于农民和工业无产阶级同受资本的剥削，只有推翻资本统治，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才能结束农民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下。这种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便是无产阶级能够同农民结成联盟的基础。马克思高度颂扬革命的群众运动，认为它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形象地比喻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在该著作中，马克思还第一次使用了“工人阶级专政”这一经典术语，并且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区别于任何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把“不断革命”作为自己的战斗口号，它表明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并且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就是要“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马克思还首次得出了一个精确的科学公式，简要地表述了无产阶级在社会的经济改造方面的历史任务：即由工人阶级占有生产资料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在这本著作中，马克思以他特有的深刻的分析和卓越的文学技巧、学者的科学精神和政治家的革命热情密切地结合起来，它是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经典著作。

一八九五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以单行本出版，书中并载有恩格斯的导言。在这一版中，恩格斯增添了第四章，使本书内容更加丰富和完整。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是马克思应《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理·德纳的要求，委托恩格斯写的总结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德国革命经验教训的一组文章。写于一八五一年八月——一八五二年十月间，并在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署名是马克思。直至一九一三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发表，始知为恩格斯所著。现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猖獗，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当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研究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1页），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从理论上武装和提高无产阶级，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作准备。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写了许多文章。《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就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之一。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由十九篇短文组成。前四章着重分析德意志联邦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前的社会性质、政治经济状况、各阶级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论述了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前提、性质、动力及其所要解决的迫切任务，分析了德国革命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指出一八四八年德国三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是用革命手段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废除一切封建经济关系，实现国家和民族

的真正统一。第五章至第十九章，通过分析革命武装起义及其被镇压，分析法兰克福议会方面的反复的曲折的斗争，以及德国境内被压迫民族要求独立的斗争及其被镇压等问题，概述了德国从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开始至一八四八年七月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被镇压期间的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过程，分析了社会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及其作用，指出，封建反动势力在革命中并没有受到彻底打击，并且在等待时机准备反扑；揭露了德国资产阶级力图同封建贵族勾结，急于扼杀革命的反革命嘴脸；批判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性和动摇性，指出其到关键时刻，它同资产阶级一样背叛了革命；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法兰克福议会是一个无所作为的“老太婆议会”；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彻底革命的阶级，应当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但由于德国资本主义不发达，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实际领导革命的程度，从而说明德国社会的现状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对革命极其不利，所以第一次德国革命的失败决非偶然。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学说，阐明了武装起义的规律，指出有领导有组织的全民性起义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必要手段和条件。并对民族运动的基本纲领和策略原则也作了论述，特别指出对不同性质的民族运动要确定不同的态度和策略。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不仅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总结了这次革命的历史经验，强调社会经济基础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且通过分析革命发展的主要阶段、各阶级和党派的态度，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原则，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起义的基本思想，从而为无产阶级

级夺取革命胜利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即《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是马克思于一八五一年十二月至一八五二年三月间写成的一部伟大著作，是《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继续。现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路易·波拿巴是拿破仑第一的侄儿。自一八一五年老拿破仑被放逐，第一帝国被推翻，波旁王朝复辟之后，波拿巴曾几次起事，均归失败遂流亡国外。直至一八四八年十月，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政府取消了放逐波拿巴族的法令，他才得以回国就议员职。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当选为总统，不久以政变手段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自称拿破仑第三。从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到第三帝国建立，法国无产阶级进行了反复的艰苦的斗争，但没有取得胜利。马克思为总结经验教训，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写作了本书。

在书中，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深刻地分析了从一八四八年二月至一八五一年十二月法国历史的进程，叙述了这一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把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事件解释为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认为它是法国一八四八年二月开始的革命自巴黎工人六月起义被镇压后沿下降线进行的必然归宿。对“政变”的分析既区别于只把这一事件看成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从而不自觉地把这个丑角描写成了伟人；又区别于为了说明“政变”是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从而变成了不自觉地替这个丑角作历史的辩护。马克思深刻揭示了波拿巴政变的社会的和阶级斗争的背景。他指

出，一切历史上发生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和哲学领域中进行，都是各社会阶级彼此斗争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他们之间的冲突，则是由他们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决定。法国一八四八至一八五〇年期间，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正是这种规律性的表现。

马克思根据原来互相冲突的法国资产阶级各政治集团联合起来镇压无产阶级的事实，详尽地研究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倒退到第二帝国的具体原因和进程，着重分析了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产生和发展及其演变，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演变经历着两个阶段：“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然后“使行政权力臻于完备”，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演变的趋势和实质，它必然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而日益加强，甚至抛弃议会民主的外衣，实行赤裸裸的军事独裁统治。路易·波拿巴的上台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建立正是表明法国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国家机器的加强。马克思深刻指出：过去的“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2页）而我们应当“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权力”。（同上，第691页）在这里，第一次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科学结论，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根本态度。

列宁对于马克思的上述科学结论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比《共产党宣言》中的论述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指出它“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列宁选集》第3卷，第194页）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从头至尾贯串着对资产阶级国家制度、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资产阶级专政实质的揭露，指明了无产阶级应当采取的立场和态度，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它与《法兰西阶级斗争》一起，都是研究法国历史的重要文献，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马克思于一八六四年十月为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成立起草的宣言，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文献。现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一八六四年九月，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成立。在制定该组织纲领和章程的问题上，因参加的代表各执己见而不能形成正确和统一的意见。为了保证“国际”成为团结和统一各国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领导核心，马克思抱病参加了会议，并亲自起草了这个《成立宣言》。

这个《成立宣言》，通过分析一八四八——一八六四年间无产阶级的状况和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形势，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出发，论证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性；高度评价了英国无产阶级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立法和合作社运动的重大意义，认为这不但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经济斗争的胜利，而且在理论上也有重大意义，它推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谓不能干涉经济生活的反动论调，而证明了马克思所阐发的以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这一原理的正确性；同时也是对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和工联主义经济斗

争错误理论的否定。《成立宣言》阐述了工人运动和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结合的必要性，强调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意义。

《成立宣言》为国际工人运动制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指出了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建立革命政党，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从而达到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目的。

《成立宣言》是第一个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纲领，它的通过不仅对第一国际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不断前进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而且也为以后无产阶级政党制定革命纲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

简称《共同章程》，第一国际的重要文献。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这个章程，是马克思受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托起草的。马克思在一八六四年十月用英文写成之后，同年十一月一日经中央委员会批准为临时章程。一八七一年九月底至十月，马克思、恩格斯参照国际所有各次代表大会以及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重新修订章程和组织条例，准备了新版文本，同时删去了章程和条例中已经失效的提法。现在常见的《共同章程》，就是一八七一年十月由马克思、恩格斯修订过的章程。

马克思在《共同章程》中，阐明了第一国际的目的、任务和组织原则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为第一国际制定了组织路线。《共同章程》首先指出，第一国际是各国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核心，其目的是联合各国无产阶级，为消灭一切阶级

压迫而斗争。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联合起来，进行政治斗争，夺取政权。《共同章程》规定第一国际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凡是属于这一组织的基层组织都要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按照这一原则，由各支部或联合组织选派的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由代表大会选出的总委员会行使权力，负责指导各支部的工作，对基层组织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

《共同章程》经过几次修改、补充，成为第一国际的行动准则。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初步确立的标志。它对于维护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具有重要的意义。

《法兰西内战》

是马克思于一八七一年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写的一篇宣言，是一部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名著。一八九一年，在纪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出版《法兰西内战》德文第三版时，恩格斯把马克思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收入该书，并写了导言。现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的巴黎公社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第一次伟大尝试，是十九世纪一次最伟大的革命。《法兰西内战》就是总结巴黎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经验的一部不朽著作。

《法兰西内战》正文共四章。第一章主要叙述普法战争所引起的法国政局的变化，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反动政府投降卖国挑动内战的罪恶活动及其阶级根源。第二章主要论述巴

黎工人阶级三月十八日武装起义的经过，分析他们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经验教训。第三章，是全书的重点。马克思分析了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发展的历史，并且根据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论证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2页）的基本原理，说明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论证了巴黎公社是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它不是议会式的而是立法和行政统一的工作机关，“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同上，第378页）马克思驳斥了各种歪曲和误解公社性质的错误观点，具体阐明了公社的任务和目的、阶级基础、组织原则、政策措施，以及它所取得的实际成就。最后一章，马克思愤怒地揭露了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勾结俾斯麦、玩弄反革命两面策略、残酷镇压巴黎公社革命的滔天罪行，热情地歌颂了巴黎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和自我牺牲精神，阐明了公社的伟大历史意义。

恩格斯对《法兰西内战》给予高度评价，在一八九一年写的导言中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把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用简短而有力的几笔描绘了出来，但是描绘得这样鲜明，尤其是描绘得这样真实，以致后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同上，第325—326页）《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重要文献，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必读经典著作之一。

《论权威》

是马克思主义反对巴枯宁主义斗争的重要文献。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巴枯宁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特别是巴黎公社失败后，巴枯宁主义者疯狂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集中制原则，竭力宣扬无政府主义，否定任何权威和集中，并召集所谓“反权威主义者”代表大会，公然与国际分庭抗礼，分裂国际工人运动。为了粉碎巴枯宁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批判其反动观点，恩格斯于一八七二年十月写了《论权威》这一战斗檄文。

在《论权威》一文中，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科学地分析了社会经济关系，阐明了权威产生的客观基础，揭示了权威的实质及作用。恩格斯指出，由于生产的社会化，没有一定的权威，生产就无法进行。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权威的作用也愈益重要。恩格斯认为，权威原则与自治原则都是相对的东西。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是十分荒谬的。针对巴枯宁主义者否定任何权威的反动观点，恩格斯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建立和加强革命的政治权威，对于夺取革命胜利和巩固胜利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无产阶级必须运用暴力革命这一权威手段，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威——无产阶级专政。否则，革命就会失败。他尖锐地指出，巴枯宁主义者鼓吹把反对一切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首要条件，实质上是要无产阶级解除自己的武装。这是对无产阶级运动的背叛，是为资产阶级效劳的。

《论权威》一文深刻地阐明了权威的实质和作用，有力

地批判了巴枯宁主义者否定一切权威的反动谬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潮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哥达纲领批判》

马克思为批判拉萨尔机会主义而写的一部重要著作，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写于一八七五年四——五月初。现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德国，工人运动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一八六三年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但由于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散布改良主义幻想，腐蚀工人意识，因此，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即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两派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一八七五年两派酝酿合并，马克思、恩格斯事先曾告诫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必须坚持在科学共产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合并，决不能作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决不能“拿原则作交易”。但威廉·李卜克内西等人不听马克思、恩格斯的告诫，醉心于无原则的和解，同拉萨尔派头目哈赛尔曼等一起起草了一个浸透拉萨尔主义观点的纲领草案，准备提交哥达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页）威廉·李卜克内西等人在两派合并问题上犯了背弃科学共产主义、向机会主义投降的严重错误。马克思出于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原则性和对德国党的特殊责任感，为了彻底清算拉萨尔主义，抱病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于同年五月五日寄给了爱森纳赫派领导人白拉克。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逐条剖析和批判了纲领草案的错误。全书共四章。第一章，马克思着重批判了纲领草案的种种“资产阶级的说法”，首先批判纲领草案避开创造财富的物质条件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空谈“劳动”和“社会”的错误，指出这实际上掩盖了资本家靠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工人的事实。接着马克思批判了纲领草案中的拉萨尔的小资产阶级的分配观点，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页）把所谓分配看作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是根本错误的。马克思在批判分配决定论的同时，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并且第一次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的理论，叙述了它们各自的特征。在这一章中，马克思还批判了纲领草案把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都看成“反动的一帮”的机会主义观点，以及狭隘民族主义倾向，论述了无产阶级同盟军问题和国际主义原则。第二章，马克思着重批判了纲领草案中所谓“铁的工资规律”的谬论，指出它的论据就是英国反动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铁的工资规律”把工资说成是劳动的价值和价格，从而掩盖了工资的实质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指出工人阶级为了求得彻底解放，必须消灭雇佣劳动制度。第三章，马克思批判了纲领草案中鼓吹拉萨尔的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指出这实质是取消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是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背叛，阐明了无产阶级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原理。第四章，马克思批判了纲领草案中拉萨尔的“自由国家”的机会主义谬论，剖析了纲领的政治要求的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性质，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的伟大理论。

《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著作，它是在和机会主义作斗争中产生的。当时，马克思恩格斯考虑到广大工人群众维护工人运动联合和统一的愿望以及社会各阶级不仅未能领悟纲领草案的实质，反而“做出了共产主义的解释”，因此他们决定暂不发表《哥达纲领批判》。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德国党内以及国际工人运动中右倾机会主义泛滥，为了痛击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恩格斯不顾考茨基等人的阻挠，于一八九一年在《新时代》上公开发表了《哥达纲领批判》。

《反杜林论》

恩格斯批判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杜林的巨著，原名《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写于一八七六——一八七八年。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一八七五年前后，柏林大学讲师杜林，以社会主义的“改革家”自诩，扬言要在科学中实行一次“全面改革”。他炮制大量著作，疯狂攻击马克思主义，鼓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反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散布庸俗经济学的反动观点，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抹煞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立；宣扬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对抗科学社会主义，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企图使德国工人运动和年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用小资产阶级思想来改造党。杜林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

攻击，在德国党内造成严重的危害。机会主义分子伯恩施坦和莫斯特等人，大肆吹捧杜林，并同他结成宗派小集团，妄图篡夺党的领导权。党的左派领袖倍倍尔等人由于对杜林的反动面目缺乏认识，并为杜林的假社会主义所迷惑，错误地认为杜林的“基本观点是卓越的”。鉴于这种情况，为了揭露杜林的反动思想及其实质，提高德国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加强党的建设，马克思认为，要不顾一切批判杜林。在马克思的积极赞助和密切配合下，恩格斯从一八七六年起，撰写《反杜林论》。

《反杜林论》总结了《共产党宣言》发表三十年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和自然科学的成就，围绕着科学共产主义这一核心问题，以百科全书的形式，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内在的联系，集中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当时所达到的成果。本书包括引论、第一编哲学、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第三编社会主义。在引论中，恩格斯论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阐明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本思想及其创立的意义，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密切联系，为全书提示了总纲；在哲学编中，恩格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清算了杜林反动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重要原理，捍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路线；在政治经济学编中，恩格斯从经济学方面批判了杜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和庸俗经济学观点以及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方法，给政治经济学下了广义与狭义的定义，简要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并驳斥了杜林的唯心主义的暴力决定论，论述了革命暴

力的历史作用；在社会主义编中，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反动的伦理社会主义，系统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概述了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意义，驳斥了杜林全盘否定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并预示了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为无产阶级指明了革命道路和远大目标。

《反杜林论》这一光辉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宝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的发表，彻底粉碎了杜林的猖狂进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大大提高了德国党的思想理论水平，有力地促进了德国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列宁指出，《反杜林论》“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十分有益的书”（《列宁全集》第1卷，第92页），它和《共产党宣言》一样，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重要文献，写于一八七九年九月十七——十八日。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德国反动政府对工人运动采取了高压政策，公布了所谓《镇压社会民主党人企图危害治安的

法令》，简称《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令》，疯狂迫害德国社会民主党，残酷镇压工人运动。面对敌人的高压政策，党内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惊慌失措，主张放弃斗争，向敌人屈膝投降。当时正在苏黎世的赫希伯格、施拉姆和伯恩施坦三人，在他们所控制的报纸上，抛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回顾》一文，系统地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纲领。而当时以倍倍尔、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党的领导核心，一时也动摇不定，未能及时辨别方向，致使党内思想混乱。为了帮助党的领导人克服动摇，粉碎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以保证德国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给倍倍尔等人发出了这一《通告信》。

《通告信》针对赫希伯格、施拉姆、伯恩施坦苏黎世三人团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首先批判了三人团鼓吹走合法的、和平的道路，放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谬论，指出他们迷恋于合法斗争，害怕流血革命，主张和平改良，实质上是要无产阶级放弃革命，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这是十足的叛徒哲学，无耻的变节行为。其次，驳斥了三人团鼓吹建立“全面的党”，妄图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荒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三人团要建立所谓“全面的党”，企图把无产阶级的政党变为“有教养和有财产”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改良主义政党，使广大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充当资产阶级的尾巴。这是“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是对无产阶级的可耻背叛。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指出，为了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必须对党内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加强教育和改造，使他们能掌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必须清除混入党内的“冒牌货”，维护党的纯洁性。再次，《通告信》揭露了三人团放弃党的纲领、

贩卖改良主义货色的谬论。三人团主张党在白色恐怖时期，应“延缓”实现党的纲领，全力以赴地去达到某些最近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是企图用眼前利益引诱无产阶级放弃根本利益，企图以争取微小的改良来代替革命，借以维护旧制度。苏黎世三人团的所谓“社会主义”，实质是德国“真正社会主义”的翻版。《通告信》不仅驳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种种反动谬论，而且也严肃地批评了党的领导人对右倾机会主义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告诫党的领导人要同右倾机会主义者彻底决裂，“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

《通告信》沉重地打击了当时德国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帮助党的领导人克服了动摇，端正了认识，坚持了正确路线，保证了党和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恩格斯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光辉著作。是恩格斯在一八八〇年应法国工人党领袖拉法格的请求，将《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和第三编的第一、二章）加了若干说明改编而成的。这一著作，首先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在法国出版发行，一八八三年的德文版改名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欧洲大部分的国家都成立了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这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于此同时，各种机会主义派别和假社会主义思潮也不断出现。法国工人党自一八七九

年成立以后，就存在着一个以马隆、布鲁斯为首的机会主义派别，妄图篡夺党的领导权，破坏工人运动。为了更加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击退法国工人党内和其他各国工人政党和组织内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恩格斯发表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

本书围绕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问题，考察了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根源，评述了它的历史作用和局限性，说明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阐述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论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本思想及其创立的伟大意义，说明这两大发现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到科学的理论前提，从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系统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论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本书着重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所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引起无产阶级革命，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为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指明了道路。

马克思曾把该书誉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3页），它的发表，在世界工人阶级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应，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成了无产阶级反对机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它不仅对于法国工人党走上正确的道路起了巨大作用，而且，也大大推动了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成长和壮大。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是恩格斯于一八八四年写成的一部叙述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历史的重要著作。一八八四年十月在苏黎世第一次出版，现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在书中，恩格斯根据美国学者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及其它许多材料，科学地分析了人类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研究了古代社会制度的基本历史特征。恩格斯首先说明了婚姻和家庭的形式如何随着那种和生产增长相联系的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先后经历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和一夫一妻制家庭这样四种形态，弄清了各个不同经济形态中家庭关系发展的特点。接着以希腊人、罗马人和日耳曼人这三个种族为例，分析了原始公社氏族制度瓦解的过程和经济原因，揭示了原始公社制度解体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形成的过程。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有了剩余产品，而且给个体经营提供了客观可能性。个体家庭的出现标志着私有制取代了原始公有制的地位，氏族制度终于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统治和压迫的机关，从而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最后恩格斯着重分析了国家产生的过程，指出由于私有制的出现，社会分裂为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对立面，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控制阶级斗争，就需要借助国家这种特殊的力量来建立一种秩序，使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内。恩格斯说，国家是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来排挤旧氏族制度机关而发展起来，并且以武装的

“公共权力”来代替氏族公社全体居民的“自动武装组织”，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是阶级压迫的机关，是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国家是一个暴力机构。论述了国家将随着阶级的消灭、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到来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

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是第一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探讨和研究人类社会早期发展历史的范例。它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出了规律性，在家庭、私有制、国家起源等问题上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唯心论，对上述问题给予了科学的阐述。列宁曾说这部著作是“现代社会主义基本著作之一”。随着科学的发展，日益证明恩格斯这一著作基本观点的正确性。

《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

恩格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重要著作。写于一八九一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爱尔福特纲领草案》（《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原系德国社会民主党委托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为该党起草的新纲领草案，因准备提交一八九一年十月将在爱尔福特召开的党代会讨论而得名。这个草案摈弃了拉萨尔主义的陈腐教条和庸俗的社会主义观点，更明确地表述了政治和经济的要求，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步。但由于起草人受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仍存在着原则性的政治错误。为使党的纲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并痛击日益滋长着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恩格斯接到纲领草案后，立即撰写了《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对其错误进行了严肃的

批判。

《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根本途径。指出企图通过“议会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严肃地批评了纲领草案回避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性错误。针对当时的德国情况，指出纲领草案没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是害怕反动政府恢复“非常法令”，实际上是向反动派讨好，并阐明了德国党争取民主共和国斗争的意义。恩格斯指出：“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他尖锐地批判了第二国际领导人在国家机构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组织原则和结构，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必须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统一共和国。并进一步阐明了国家统一和实行广泛自治的关系，提出解决民族问题与国家统一的原则。正如列宁指出：“恩格斯在这里作了三类特别宝贵的指示：第一类是关于共和国问题；第二类是关于民族问题同国家结构的联系；第三类是关于地方自治。”（《列宁选集》第3卷，第229页）

《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光辉文献。它不仅沉重打击了第二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而且也各国党制定革命纲领提供了典范。

《法德农民问题》

恩格斯于一八九四年为批判法德两党的机会主义土地纲领而写的重要论著。现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法德两党为了在议会中取得农民的支持，开始讨论农民问题。但在如何争取农民的问题和怎样解决土地问题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法国工人党在一八九四年南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纲领中，竟宣称在任何情况下保护私有制，甚至把农业资本家也视为保护对象。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八九四年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也通过类似南特纲领的机会主义纲领，而且机会主义头子福尔马尔还援引南特纲领为自己的机会主义观点辩护，主张联合包括富农在内的农村中的“一切成分”。他还造谣说，南特纲领是恩格斯支持和赞同的。为了批判法德两党在土地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恩格斯撰写了本书，全面、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农民问题上所持的根本立场和态度。

恩格斯在本书中首先阐明了无产阶级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同农民结成联盟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建立工农联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恩格斯指出，农民是重要的政治因素，农民政治态度的向背，是无产阶级革命成败的关键。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深入广大农村，把广大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为了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必须依靠农村中的无产者，把广大小农作为团结的“重心”。要对农村中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资产阶级冒充农民朋友的伪善面孔进行无情的揭露，要对农民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其次，恩格斯论述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方法和步骤。恩格斯针对机会主义以维护农村私有制来拯救农民破产的荒谬观点，指出，只有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才能使农民免于破产。为了改造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必须坚持自愿原则，通过示范的办

法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决不允许对劳动农民诉诸暴力，实行剥夺。工人阶级的国家要对农业合作化给予物力、财力上的支持和帮助，要逐步把他们从低级形式的公有制引向高级形式的公有制。

《法德农民问题》有力地批判了机会主义，全面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农民问题的根本观点，进一步丰富了工农联盟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经典文献。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是列宁于一八九四年为批判俄国民粹派的理论观点和政治纲领而写的一部重要著作。现收入《列宁选集》第一卷。

民粹派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代表俄国小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的政党。早期进行过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但到九十年代，民粹派鼓吹同沙皇妥协，成为富农利益的代言人。他们的理论体系即民粹主义也演变成为一种反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成为当时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开展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主要思想障碍。

列宁在著作中彻底揭露了以米海洛夫斯基、尤沙柯夫和克利文柯为代表的民粹派冒称“人民之友”而实际是人民之敌的真面目。首先批判了民粹派对社会发展进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民粹派认为，推进和创造历史的是个别杰出人物，人民群众只是盲目地跟着“英雄”们的“群氓”。列宁批驳了这种反动理论，指出，历史进程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而物质资料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

的主人，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力量。民粹派热衷于搞个人恐怖活动正是他们不相信群众的唯心史观的集中表现。列宁批判了民粹派否认资本主义已在俄国存在和发展的反动经济观点，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民粹派攻击马克思主义者希望农民破产，想“把每一个农民都拿到工厂锅炉里去受煎熬”，列宁驳斥说，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希望”，而在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真实进程，无产阶级的人数必然要在这个进程中增加起来。列宁批判了民粹派不要无产阶级，而由知识分子领导农民通过农民村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反动政治观点。列宁指出，九十年代的民粹派不同于七十年代的民粹派，它已经完全放弃了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主张同沙皇妥协，并且掩盖农民的破产和富农对贫苦农民的剥削，赞美富农经济，成为富农利益的代表者。列宁撕去了民粹派的社会主义的假面具，指出他们是企图在保持专制制度和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指望由沙皇政府来改善农民处境；愿意消灭沙皇制度的真正人民之友不是民粹派，而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的这部著作，不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和粉碎了九十年代的民粹主义思潮，揭露了民粹派冒充人民之友的真面目，而且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阐明了工人阶级是社会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的原理，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是推翻沙皇制度和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手段的光辉思想，并且阐明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任务。它为俄国革命者指明了正确道路和前进方向，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对于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形成与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是列宁为悼念恩格斯的逝世而写的重要著作。一八九五年秋脱稿，翌年刊载于《工作者》文集第一、二期合刊。见《列宁选集》第一卷。

恩格斯的逝世，使世界无产阶级失去了伟大的导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掉了伟大的领袖，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为了让无产阶级都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的生平与活动，以唤醒俄国无产阶级认识自己的地位及伟大历史作用，列宁写了此文。

文中指出，恩格斯在他的朋友马克思逝世之后，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他和马克思一起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在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功绩是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

列宁在论述恩格斯生平事迹时指出，他出生在普鲁士巴门市的一个工厂主的家庭里，少年时代就憎恶专制制度和官吏的专横，从事政治与哲学的研究。后来在曼彻斯特研究了英国工人的生活 and 斗争，写了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一次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它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从而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列宁高度评价了恩格斯同马克思合著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并高度颂扬了他与马克思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为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而努力的历史功绩，并为这个同盟

制定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列宁赞扬恩格斯参加了莱茵省和德国南部的武装起义，同敌人进行英勇斗争的献身精神，以及他积极参加和领导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工作，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在理论方面，他完成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整理出版工作。列宁十分重视恩格斯对俄国革命斗争的关注，并同俄国革命者保持着联系。列宁指出，俄国革命因恩格斯的逝世而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列宁这篇悼念文章，表达了无产阶级对革命导师恩格斯的怀念，传播了他的光辉思想，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必读著作。

《怎么办？》

是列宁在一九〇一年底至一九〇二年初为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变种——以马尔丁诺夫为代表的“经济派”，为扫除建党道路上的思想障碍而写的重要著作。现收入《列宁选集》第一卷。

“经济派”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出现的第一个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主要错误是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无视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反对把科学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力图把工人运动局限在经济斗争范围内，否认政治斗争对于工人阶级解放的决定作用；他们赞扬当时盛行的组织涣散、小组习气和手工业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经济派的错误，加剧了俄国工人运动中的思想混乱、政治动摇和组织涣散，成为当时建党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怎么办？》彻底批判了经济派的错误观点，指出了它的思想实质和对工人运动的严重危害。列宁首先揭穿了经济派所谓“反对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的口号的反动实质。指出国际修正主义者惯用“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号来篡改马克思主义，经济派抄袭国际修正主义者这一口号，是企图把伯恩斯坦主义移植到俄国来，从而把俄国工人运动推向工联主义的道路。所谓“批评自由”，无非是要求在社会民主党内有派别活动的自由，把资产阶级思想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列宁批判了经济派的自发论，阐明了革命理论对于工人运动和党的建设的重大意义。指出自发的工人运动不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列宁选集》第1卷，第247页）。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要将科学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使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在这里，列宁特别强调革命理论对于革命运动的重大意义，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同上，第241页）工人阶级政党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才能发挥先锋队的作用。列宁批判了经济派的改良主义谬论，阐明了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关系，特别是政治斗争对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决定作用，指出，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决不能从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的原理中作出经济斗争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宣扬经济斗争高于一切，必然使社会民主党降为一般的工联主义组织。列宁批判经济派反对建立革命家组织的谬论，论证了建立新型马克思主义

政党的重要性，指出，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宣扬和坚持革命运动采取手工业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革命家组织，这是当时“运动的真正的病症”。为使革命运动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有继承性的领导核心，为使越来越多自发地卷入斗争的群众有一个团结的核心，为了培养具有远见卓识的革命领袖，必须尽快结束小组习气和手工业方式，必须建立革命家组织。列宁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列宁选集》第1卷，第337页）。

《怎么办？》一书，不仅彻底粉碎了经济主义思潮，而且奠定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部关于党的思想建设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重要著作。

《进一步，退两步》

又名《我们党内的危机》，是一部全面阐述党的学说的著作。现收入《列宁全集》第七卷。

一九〇三年七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党内斗争更加尖锐。本来“二大”前夕由于《火星报》的努力，党在克服小组习气和组织涣散方面，已前进了一步，但在“二大”讨论党章第一条时，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机会主义条文，使党退了一步；“二大”闭幕后，孟什维克在普列汉诺夫的帮助下篡夺了党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的领导权，使该报成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工具，并且力图使党倒退到“二大”以前的组织涣散状态，这就使党又退了一步。为了回击孟什维克的猖狂进攻，列宁于一九〇四年二——五月间写了名著《进一步，退两步》。

在书中，列宁系统地批判了孟什维克修正主义的组织路

线，指出它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拥护无政府主义的自治制，反对集中制。书中第一次全面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遵循的组织原则，指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应当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要严格划清党与一般工人组织的界限，“绝对不能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列宁选集》第1卷，第457页）。批判了孟什维克主张每个罢工者都可以自行列名入党的错误观点，指出这是企图削弱党的先进性，必然导致取消党的后果。党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这是列宁在建党活动中极为重视和特别坚持的一个原则思想。党应当有严密的组织，有为党员必须遵守的纪律，党员一定要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指出孟什维克把党与组织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十分荒唐和危险的。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党的任务就在于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形式的斗争，领导无产阶级的其他一切组织。党成为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才能使工人阶级的各个组织有统一的战斗司令部。孟什维克力图降低党的领导作用，实质上就是要使无产阶级陷于解除武装的境地。党是工人阶级先进部队与工人阶级千百万群众相联系的纽带。列宁十分强调党本身应该具有群众性，党的组织不仅包括职业革命家组织，而且包括广泛的各级地方组织网，党通过地方组织和广大党员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党必须按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党要有统一的党章，统一的纪律，统一的领导机关；要有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只有这样的党才有战斗力，才能有节奏地行动。列宁严厉谴责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错误。党应当有全党必须遵守的铁的纪

律，不应当有可以不遵守纪律的“上等人”、特权人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组织的统一。

《进一步，退两步》不仅彻底粉碎了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而且奠定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基础，它的基本理论观点，至今仍然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遵循的准则。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是列宁在一九〇五年六——七月间撰写的一部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路线的重要著作。现收入《列宁选集》第一卷。

二十世纪初，俄国正面临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种形势面前，每个阶级都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并制定自己的策略路线。但是，自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内形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对立的派别。一九〇五年四月，两派分别在伦敦和日内瓦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同样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问题。列宁的著作题为《两种策略》，就是说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有自己的策略，执行根本不同的路线。

《两种策略》一书由一篇序言、十三章正文和一篇书后组成。在著作中，列宁彻底批判了孟什维克和国际机会主义的策略路线，同时又对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路线作了精辟的论述，完整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学说、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学说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列宁首先论述了无产阶级必须实现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问题，批判了孟什维克认为只

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谬论，指出，发生在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动力和领导权也完全不同于十七、十八世纪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现时，资产阶级已经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为反革命的阶级；而无产阶级不仅按照其阶级地位来说是最先进的和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而且已经作为强大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并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它应当在民主革命中担当起领导者的责任。建立工农联盟，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取得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书中驳斥了孟什维克认为不能同农民结成联盟的反动观点，指出，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的领导权，就必须把农民当做自己可靠的同盟军，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核心就是对农民的领导问题。要坚持不断革命，及时地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书中批判了孟什维克认为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必然有一个相当长停顿时期的“万里长城论”。列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不断革命的思想，深刻地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理。他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一个链条的两个环节，是俄国革命发展的完整过程，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指出：“现在这个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列宁选集》第1卷，第617页）

列宁的《两种策略》一书，粉碎了孟什维克及国际机会主义的策略路线，制定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原则，奠定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策略基础。党的策略路线是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列宁在该书中还没有作出社会主义能在一

国内胜利的明显结论，但它已包含了作出这一结论的基本要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是列宁在一九〇八年四月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二十五周年，批判国际的和俄国的修正主义思潮而写的著名论文。现收入《列宁选集》第二卷。

十九世纪初，在西欧资产阶级的哲学中，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经验批判主义极为流行。这一反动哲学思潮，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处于反动时期的俄国，也有人宣扬。曾一度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以及孟什维克尤什凯维奇、瓦连廷诺夫等人，就是以经验批判主义作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展开“批评”的理论武器。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哲学问题上的斗争日益尖锐，列宁决心要同波格丹诺夫等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就是列宁作为同他们斗争的正式宣战书送到刊物发表的，是在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过程中写的。

在文中，列宁首先叙述了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战斗历程，指出在头半个世纪中，先后取得了对青年黑格尔派、蒲鲁东派、巴枯宁主义和杜林假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的第二个五十年（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一开始就是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争，先前被马克思学说击溃了的那些社会主义流派，现在都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而实际上是修正主义来同马克思主义继续作斗争。这个派别叫做伯恩施坦派。

列宁在文中从三个方面来揭露修正主义，揭露和批判它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篡改。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者跟在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屁股后面跑。教授们要“回到康德那里去”，修正主义就跟在新康德主义后面蹒跚而行。他们宣称唯物主义已被“驳倒”，企图以唯心主义来代替唯物主义，用庸俗的进化论来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宣扬宗教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私人的事情”的滥调。在经济学方面，修正主义者竭力用一些肤浅的片面的所谓“新材料”来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可以防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有缓和的趋势，马克思论证的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是没有根据的，并且根本否定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学说。列宁指出，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危机，反而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况更加尖锐。在政治方面（科学社会主义），他们以阶级调和论代替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暴力革命，主张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列宁指出：“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列宁选集》第2卷，第7页）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是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全面揭露，沉重地打击了第二国际和俄国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武装了各国无产阶级的思想，推动了国际反修斗争的发展。

《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

是列宁于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写的一篇分析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策略分歧根源的重要论文。现收入《列宁选集》第二卷。

一九一〇年间，在欧洲正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猖獗之时，在俄国，取消派和召回派配合斯托雷平的反革命进攻，力图瓦解群众的革命斗志，取消无产阶级革命。为了揭露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阶级实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列宁写了这篇论文。

列宁在文中首先阐明，现代工人运动中的基本策略分歧的实质是同工人运动中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流派即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作斗争的问题。指出：产生这两大流派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性质。列宁具体分析了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产生的原因：首先，无产阶级队伍中的“新兵”的增加，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理论和策略方面的动摇；其次，资本主义在各国各经济部门发展速度的不同，必将影响工人阶级及其活动家对马克思主义作全面、完整的理解，这是引起策略分歧的重要经济原因；再次，能否掌握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辩证规律，透过现象从本质上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也是经常引起分歧的一种根源；最后，资产阶级统治策略上的改变同样是造成工人运动中策略分歧的原因之一。文章结尾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是真正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引导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行动路线。

列宁的这篇重要论文，是一篇具有高度科学水平和鲜明

战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文献，它科学地分析了工人运动中两种反动倾向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阶级根源和认识根源，给了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以有力的揭露，保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策略的原则性，巩固了俄国及欧美各国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

这是列宁于一九一三年三月十四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三十周年而写的一篇论文，现收入《列宁选集》第二卷。

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空前尖锐化；亚洲和欧洲都开始了新的革命高涨；在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而转入低潮的革命运动，又重新走向高涨。与此同时，俄国和国际的机会主义以新的形态发动对马克思主义的猖狂进攻。为了反击机会主义的进攻，捍卫马克思主义和武装革命群众，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就有必要根据历史发展进程从总的方面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揭露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欺骗性及其对工人运动的危害，为此，列宁写了这篇著名论文。

文中首先指出，马克思学说的主要之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历史作用。接着叙述了自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世界历史划分的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一八四八年革命到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马克思学说从开始时作为无数社会主义思潮之一，到这个时期结束它战胜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成为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第一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立是它在组织方面的巨大胜利。第二个时期，从一

八七一年——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属于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结束，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这个时期，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斗争的新特点，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内脏腐烂了的自由主义，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第三个时期从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开始，是风暴时期。这次世界风暴，发源于亚洲大陆，继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之后，在土耳其、波斯、中国相继爆发革命。列宁说，现在是亚洲的革命风暴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世界上任何反动势力都不可能重新在亚洲恢复农奴制度。

列宁的文章是一篇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它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了科学的划分和总结，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日益证明马克思学说的正确性及其无限生命力，热情歌颂了伟大的风暴时期，从而鼓舞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志，为各国工人阶级迎接新的革命高潮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是列宁在一九一三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三十周年而写的短文，发表在《启蒙》杂志第三期。见《列宁选集》第二卷。

列宁为适应日趋高涨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需要，为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特别是俄国的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篡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于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四年间，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写了许多重要著作，阐明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原理。本文就是其中的一篇。

文中，列宁首先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指出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它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的继承。其次，阐明马克思继承了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并把它推广到社会领域，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再次，指出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最后，叙述了空想社会主义出现的必然性和历史局限性，指出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它在斗争中不断地充实和发展。

列宁指出，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学，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指出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十分完备而严整的统一体，是无产阶级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本文概括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来源，它的三个组成部分，对于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论民族自决权》

是列宁为批驳机会主义分子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尤尔凯维奇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自决权纲领的攻击，于一九

一四年二——五月间写的一部关于民族问题的重要著作，现收入《列宁选集》第二卷。

一九一三年，俄国党内掀起了一场关于民族问题的大争论。党内机会主义分子在各种党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攻击党在一九〇三年制定的民族自决权纲领，他们一方面标榜“民族文化自治”，另一方面则援引卢森堡的一些论点，来反对民族自决权。因此，要批判俄国的机会主义者，必须首先批判第二国际在民族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也要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卢森堡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论民族自决权》一书主要是批判卢森堡从“左”的方面来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的错误观点。

卢森堡不懂得民族自决权的要求是历史经济发展的要求。他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从原则出发，从概念出发，在法权中寻找民族自决的答案，因而认为民族自决、民族独立在帝国主义时代是虚幻的，不能实现的。列宁详尽地研究了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条件，分析了在全世界范围的近代民族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论述了民族自决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列宁指出：“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列宁选集》第2卷，第509页）

卢森堡忽视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早已完成的国家和没有完成的国家之间的区别，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来谈民族自决。她拿历史和国情完全不同的奥地利同俄国类比，反对俄国党提出民族自决的原则。列宁指出，在这里卢森堡犯了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

针对卢森堡攻击民族自决权“没有包含一点实际的东

西”，从而反对民族自决原则的错误观点，列宁指出，卢森堡的所谓实际精神，就是要求或者支持一切民族要求，或者对每个民族分离作出是或否的具体回答，如果按卢森堡的实际精神办事，必然盲从了资产阶级的要求，陷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坑。无产阶级反对这种实际主义，拥护民族自决原则，承认各民族有成立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对于具体民族分离问题，分离与否，应主要看对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否有利。

针对卢森堡关于赞成民族自决就会助长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观点，列宁指出，卢森堡完全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提出问题，她完全没有考虑到压迫民族的党和被压迫民族的党对民族问题应有不同的提法。压迫民族的党，应当强调民族有分离自由；被压迫民族的党应当强调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卢森堡在这方面不自觉地站到了俄国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犯了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

《论民族自决权》一书批判了卢森堡从“左”的方面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从而也就从根本上批判了俄国党内机会主义反对民族自决原则的错误。本书以民族自决原则为中心，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学说，是研究民族问题必读的著作。

《卡尔·马克思》

是列宁介绍马克思的伟大生平和学说的概述性文章。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写成，一九一五年以弗·伊林的署名发表，一九一八年又写了序言。见《列宁选集》第二卷。

当时，帝国主义战争迫近，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日益猖獗。他们恶毒地攻击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反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列宁为了批判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观点，捍卫马克思主义，教育党的干部，写了这篇重要著作。

列宁首先简述了马克思的伟大革命实践活动，论述了他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由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历史过程；高度赞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无产阶级创立科学理论，并使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献身精神；正确地阐明了马克思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及其伟大历史作用，以及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卓越功勋。

其次，列宁介绍了马克思的学说。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是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组成的。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了他们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并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到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研究了劳动价值论，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从而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全部秘密，并通过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研究，科学地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的规律，从而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列宁还指出，马克思还十分重视策略问题的研究，他不仅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

原理，而且还制定了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所必须遵循的策略原则。

《卡尔·马克思》一文的发表，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的作用，为迎接革命高潮的来临作了理论准备。

《第二国际的破产》

列宁揭露和批判第二国际首领们歪曲战争性质并为自己沙文主义言行辩护的战斗论文，写于一九一五年五、六月间。现收入《列宁选集》第二卷。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是帝国主义强盗集团之间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霸权所进行的一场罪恶战争。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问题上，第二国际大多数党的领导集团，都可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他们煽动各国无产阶级为本国资产阶级利益互相残杀，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无前例的大分裂，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破产。为了揭露第二国际叛徒的丑恶嘴脸，总结历史教训，列宁写了《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

列宁在文中，首先指出第二国际破产的标志是大多数正式社会民主党完全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背叛自己在斯图加特和巴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上的宣言和决议中所作的最庄严的声明，倒向本国总参谋部、本国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接着批判了普列汉诺夫、考茨基之流的社会沙文主义的“祸首论”，“大家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卫自己的祖国”，和本国政府在战争中胜利“会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等谬论，着重批判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指出这一理论具有更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因为它是以科学性和国际性伪装起来的

一种社会沙文主义理论。列宁在揭露考茨基扮演牧师角色时，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列宁选集》第2卷，第638页）列宁在文中还分析了社会沙文主义思潮的历史根源、条件、意义和力量，指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同上，第654页）文章最后号召欧洲无产阶级同机会主义决裂，把它从工人政党内部分清除出去，并为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而斗争。

《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的发表，撕破了第二国际首领们的“革命”外衣，粉碎了他们的社会沙文主义谬论，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正确态度，指明了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胜利方向，并为第三国际的建立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社会主义与战争》

列宁阐述俄国党对战争态度和策略的著名文章，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写于一九一五年七——八月间。现收入《列宁选集》第二卷。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公开投向帝国主义怀抱，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从而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认为，在战争期间，无产阶级应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来领导革命运动。为了阐明无产阶级政党对战争问题的态度和策略，并揭露和批判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者的反动观点，列宁写作

了《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

本书共分四章。第一章，列宁通过对近代战争的历史类型的分析，阐述了“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的观点，指明了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批判了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者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荒谬观点，指出对“保卫祖国”应作阶级的历史的分析；揭露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者或者鼓吹“保卫祖国”，或者空谈“战争”、“和平”，实际上是在掩饰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是以“和平”为幌子来蒙蔽人民群众；阐明无产阶级政党对待战争的态度，应当是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并认为不消灭阶级，就不能最终消灭战争；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策略口号。第二章，通过分析俄国各阶级、政党对战争的态度，表明了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反战立场。第三章，批判了社会沙文主义者鼓吹要恢复已破了的第二国际的荒谬主张，号召无产阶级为建立第三国际而斗争。第四章，总结了俄国党内多年来的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指出了无产阶级今后的任务和方向。

《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对于从理论上指导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反战运动，并从思想上帮助他们和社会沙文主义、社会和平主义彻底决裂，肃清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流毒，从而为建立无产阶级新型国际组织——第三国际而斗争，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简称《帝国主义论》，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写的一

部划时代的光辉著作。一九一六年七月完成，一九一九年九月正式发表。现收入《列宁选集》第二卷。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伟大历史任务已经提到日程上来。这时，由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日益泛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怎样对待帝国主义、怎样对待战争与革命等一系列问题上，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同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考茨基抛出了臭名昭著的“超帝国主义论”，胡说资本主义会经历一个“超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各国金融资本将联合起来共同剥削世界，从而可以清除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出现“和平民主”的“新纪元”。列宁的著作，正是适应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历史时代的需要，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激烈斗争中写成的。

《帝国主义论》包括两篇序言和正文十章。在前六章中，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经济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溶合为金融资本，并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在第七章中，列宁表述了在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的本质，给帝国主义简明地下了一个定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列宁为了概括帝国主义五个基本经济特征，又下了一个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

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808页）列宁又从帝国主义所处的历史地位和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分裂为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方面给帝国主义下了如下的定义，这就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列宁在同年十二月发表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文中，对这个定义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这种特殊性分三个方面：（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同上，第883页）列宁指出，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是他的改良主义的理论基础，并以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各帝国主义国家存在疯狂斗争的现实，对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进行了批判。第八章，列宁阐述了帝国主义另一个重要方面——寄生性和腐朽性，分析了它的各种主要表现，并揭露了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第九章，列宁分析了社会各阶级对帝国主义政策所采取的态度，指出对帝国主义批评的根本问题是革命还是改良，着重揭露了考茨基对帝国主义批评的改良主义本质，指出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割裂帝国主义联盟和战争的内在联系，否认帝国主义战争的必然性，使人们对帝国主义产生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其实质是粉饰帝国主义，掩盖其深刻矛盾。在最后一章中，列宁论述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垄断决定资本主义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帝国主义论》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是列宁主义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它

总结了《资本论》出版以后半个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情况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经验。它为列宁于一九一五年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的新结论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列宁的这部著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

列宁批判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重要论著。一九一六年九月用德文写成，十二月经修改后以《论“废除武装”的口号》为题，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第二集，现收入《列宁选集》第二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从一九一六年下半年起，修正主义分子考茨基和屠拉梯之流，迎合帝国主义玩弄和平骗局的需要，披着社会主义者的外衣，大肆兜售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在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影响下，荷兰、瑞士、斯堪的那维亚的一些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也错误地主张“废除武装”，反对任何战争和任何军事制度。为批判资产阶级和平主义，阐明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根本立场和观点，列宁写了一系列著作，本文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篇。

在本文中，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区别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原理，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反对革命战争。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战争，殖民地附属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的自卫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提出“废除武装”的口号，就是拒绝阶级斗争，放弃革命。列宁还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掌握武装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学会掌握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家当作奴隶。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以战争剥夺资产阶级，解除这个阶级的武装。在资产阶级掌握武装的情况下，通过“废除武装”来实现持久和平，只是一种幻想。无产阶级只有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才能实现持久和平。列宁在文中还再一次论证了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原理。他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列宁选集》第2卷，第873页）

本文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理论，特别是进一步论证了“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原理，教育各国人民，用革命制止帝国主义战争，有力地推动了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国家与革命》

是列宁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夕撰写的一部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光辉著作，一九一八年出版。现收入《列宁选集》第三卷。

《国家与革命》一书，按原定计划有七章，最后一章的题目是《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由于十月革命的爆发而未能完成。第二章第三节是在一九一九年再

版时增加的，是为驳斥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书对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攻击而写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更加激化，广大群众革命情绪高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已提到议事日程。特别是俄国，已处在革命的前夕，迫切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无产阶级革命应当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可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以考茨基为首的修正主义分子，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极力歪曲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鼓吹通过“议会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因此，要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健康发展，必须揭露和批判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和篡改，坚持用革命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路线。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正是为了适应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而撰写的。正如作者在初版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这部光辉著作，在总结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全书共六章：第一章，列宁主要分析了国家的起源、特征、本质及其历史作用，揭示了国家发展和消亡的规律，阐明了国家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对立才产生的，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一切国家，都是少数剥削者对多数被剥削者实行统治的暴力机构。列宁批判了形形色色的超阶级的国家观。在二、三、四章中，列宁简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总结一八四八——一八

五一年的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科学结论。在总结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时，马克思更加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全面论述了巴黎公社是同资产阶级专政根本对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权、新型的无产阶级国家，“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列宁在简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任务、领导力量及其历史作用，阐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国家学说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批判了第二国际考茨基等人反对暴力革命，鼓吹议会道路的错误观点，以及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彻底背叛，指出，对待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在第五章中，列宁主要根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分析，论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消亡的联系，指出，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社会要经历低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第六章，列宁集中批判了歪曲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从理论上进一步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界限。

列宁的这一光辉著作，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粉碎了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进攻，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战斗的实践纲领。它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无产阶级，武装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广大劳动群众，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

尤其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作了理论准备。本书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文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是列宁在一九一八年三、四月间写的一篇论述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纲领性文献。手稿的题目是《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提纲》。现收入《列宁选集》第三卷。

一九一八年春，在同帝国主义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之后，苏维埃政权赢得了和平。为了利用短暂的喘息时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撰写了该文。

列宁在文中指出，在缔结了布列斯特和约，取得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时机之后，苏维埃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摆在俄国无产阶级面前的新的历史任务是学会管理俄国。要做好组织工作，要用新方式去组织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了有效地解决新时期的任务，首先要实现全民统计和监督，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战胜资本主义势力，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列宁认为，组织全民的统计和监督，意味着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列宁选集》第3卷，第498页）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苏维埃国家的第二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创造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任务。并分析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强调利用资产阶级专家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

用。并且指出：“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同上，第511页）列宁还指出，为了实现管理俄国的任务，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镇压破坏社会主义的敌人；同时要建立“严整的组织”，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自发势力作斗争。文中，列宁还论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指出，任何大机器工业，都要求无条件的最严格的统一意志，要求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但是，在加强集中的同时，要经常召开群众大会，发挥劳动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广大劳动群众真正参加对国家的管理。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是一篇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列宁论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方法步骤，着重论述了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战胜资本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它不仅在当时指引着俄国人民前进的方向，至今仍然是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指路明灯。本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占有重要位置。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是列宁继《国家与革命》之后写的又一部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光辉著作。见《列宁选集》第三卷。

本书是为批判叛徒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书而写的。叛徒考茨基为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于一九一八年八月炮制了一本名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恶毒地诽谤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疯狂地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列宁愤慨地指出：“如果要名副其实，考茨基的书就不应该叫做《无产阶级专政》，而应

该叫做《附和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攻击》。”为回击考茨基的猖狂进攻，列宁于一九一八年十——十一月间，抱病写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在本文中，列宁揭露了考茨基捏造“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偶然用过的一个词的谣言，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马克思全部学说的精髓；针对考茨基企图取消暴力革命，把无产阶级专政篡改所谓“统治状态”的诡辩，指出：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列宁选集》第3卷，第23页）并反复论证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针对考茨基鼓吹“超阶级”的所谓纯粹民主，阐明了民主的阶级性，揭示了无产阶级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的对立，指出无产阶级民主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并认为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是新型的民主制度，痛斥了考茨基为维护资产阶级议会制而诬蔑无产阶级专政“毁灭民主”的谰言，阐明无产阶级为了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必要性；针对考茨基把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和援助别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诬蔑为“革命输出”的谬论，阐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并指出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础和出发点；针对考茨基制造工农对立，破坏工农联盟的企图，阐明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论证了工农联盟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作用。

本书驳斥了考茨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种种诬蔑和诽谤，维护了十月革命道路，维护了苏维埃政权，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给予考茨基以毁灭性的打击。它是无

产阶级反对修正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伟大的创举》

全名《伟大的创举(论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六月撰写的一篇赞扬士兵和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精神，论述“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重大意义的文章。现收入《列宁选集》第四卷。

当时，十月革命虽已胜利，但年轻的苏维埃国家面临着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叛乱的严重困难。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鉴于国内外形势严重，为了克服困难，支援前线，自动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直到战胜高尔察克为止。列宁特别重视这种首创精神，撰文誉之为“伟大的创举”。

在本文中，列宁高度评价群众的首创精神，热情赞扬共产主义的新生事物，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缜密地研究这些新的幼芽，尽量帮助它们成长，细心地照管这些嫩弱的幼芽，绝不能对之采取轻浮的怀疑态度。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是在另一种环境中，采取了另一种形式。文中，列宁第一次给阶级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

集团的劳动。”（《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因此，要完全消灭阶级，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三大差别，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列宁在文中还发展了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理论。

列宁在本文中，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性质及其意义，而且在实践上鼓舞了广大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掀起了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热潮，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强了战胜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信心。文章还在阶级、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方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列宁关于战略与策略问题的名著。于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间写成，同年六月首次出版。见《列宁选集》第四卷。

本书主要是为批判第三国际初期工人运动中的“左”倾机会主义而写的。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者自称“左派”共产党人，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否认革命的曲折性，拒绝参加议会斗争，主张退出工会，反对任何妥协；否认党的纪律，否认集中制原则，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表现出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列宁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称其为“左派”幼稚病。这种“左”倾机会主义思潮，虽然刚刚露头，还未成为主要危险，但如果任其滋长，势必会给革命带来严重危害。为了帮助各国年轻的共产党克服“左”倾机会主义，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引上无产阶级革命轨道，列宁在坚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在本书中着重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

本书针对“左”派的错误观点，通过总结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三次革命和两年多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阐明了俄国革命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强调十月革命的基本特点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规律，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指出正确对待俄国革命经验，认真学习和研究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和策略，并把它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是西欧以至全世界各国党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从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出发，论证了坚持党的集中制原则和铁的纪律，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这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有力地批判了“左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的原理，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97页）驳斥了“左派”否定党的领导作用的荒谬观点，说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马克思主义领袖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保证；详尽地剖析了“左派”在策略问题上的错误，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策略思想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实践经验，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战略和策略的基本原则；分析了“左派”幼稚病的根源和实质，指明了克服的途径和方法，并向各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当时面临的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

本书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重要文献。它以新的革命实践经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关于战略与策略问题的理

论，为各国共产党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它对第三国际各国党的巩固和壮大，对于国际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都起了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这是列宁为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一份文件。于一九二〇年六月发表。见《列宁选集》第四卷。

民族殖民地问题，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十月革命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马列主义开始在这些国家中传播，许多国家正在酝酿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因此，如何正确估价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作用，指出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和前途，制定世界革命的正确路线，是摆在共产国际面前的迫切任务。列宁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以及在此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和大会通过的《补充提纲》等文件，正确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列宁在提纲中，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及民族平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尖锐地批判了第二国际各机会主义政党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谬论，精辟地阐述了民族解放运动同维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再一次强调，必须把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加以区别。并且认为，这是《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共产党人考察和解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列宁在《提纲》中，阐述了共产党人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三个重要原则：即它的全部政策是各

国共产党必须使各民族和各国无产者和劳动群众接近起来，为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而进行共同的革命斗争；各宗主国的共产党必须直接帮助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教育本国工人阶级以真正兄弟般的态度对待殖民地的劳动人民；在反帝和反封建的斗争中，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共产党可以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要绝对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提纲》还为各国共产党人规定了必须遵守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并强调共产党人应同歪曲国际主义概念和政策的机会主义及市侩民族主义进行斗争。

列宁在《提纲》中所阐明的重要思想，为无产阶级政党解决民族殖民地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论合作制》

列宁晚年的重要著作。一九二三年一月由列宁口授写成，见《列宁选集》第四卷。

从一九二一年起，苏维埃俄国进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和平建设时期。改造小生产者，把分散的个体经济引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轨道，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这是当时摆在苏维埃国家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为解决这一问题，列宁在病中口述了《论合作制》一文，拟定了著名的合作化计划，为苏维埃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列宁在文中，提出用合作社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并深刻地阐明了合作

社的重大意义。列宁认为，农业合作社是社会主义工业与分散的农业经济结合的最好形式，是工农联盟的纽带，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条件。他指出：“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条件，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站稳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687页）因此，改造小生产者，通过合作化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轨道，是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指出，合作制是农民最容易接受的形式，是改造小生产者最合适的途径。他指示党和苏维埃国家，要加强对合作社的领导，要为合作社培训干部和各种人材，要在物力和财力上提供优惠的帮助，甚至要给成绩卓著的合作社以物质奖励，等等。

《论合作制》是继《法德农民问题》之后，马列主义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文献。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思想，提出了俄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纲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起了理论指导的作用。

《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斯大林的早期著作。写于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收入《斯大林全集》第一卷。

这部著作，是为批判格鲁吉亚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而写的。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遭到各种反动思潮的攻击。格鲁吉亚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分子也乘机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猖狂进攻。为回击无政府主义的进攻，斯大林撰写了《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斯大林在本文中，通俗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

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以及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而阐明，马克思主义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是完整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和世界观，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歪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种种谬论，并论述了无政府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对立。他指出：“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基础，认为解放个人是解放群众、解放集体的主要条件。在无政府主义看来，个人没有解放以前，群众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个人’。而马克思主义则以群众为基础，认为解放群众是解放个人的主要条件。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群众没有解放以前，个人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群众’。”（《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3页）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观点，文中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解放全人类的根本道路，强调无产阶级必须组成独立的政党，通过阶级斗争，用暴力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本书深刻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反动观点，揭露了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本质，划清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是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是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末至一九一三年初在维也纳写成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巨著。现收入《斯大林全集》第二卷。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民族殖民地问题更加突出，已成为世界政治中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就俄国而言，

由于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失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没有完成，民族矛盾尖锐，狭隘民族主义思潮日益泛滥，使工人阶级团结涣散。俄国党内，由于在民族问题上发生原则分歧而展开了争论。斯大林认为，应当批判民族主义思潮，使群众摆脱它的影响，“用久经考验的国际主义武器，用统一而不可分的阶级斗争去对抗民族主义”。（《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0页）

斯大林在本书中，首先给民族下了一个确切的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同上，第294页）接着，斯大林对诸如民族的形成、东欧为什么会形成多民族国家、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运动的兴起及其性质等一系列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斯大林着重批判第二国际“理论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石普林格尔、鲍威尔反对民族自决原则，鼓吹民族文化自治的谬论，称它为精致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同时又批判了俄国崩得分子、高加索分离主义者和取消派在自己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民族文化自治纲领，在政治上采取民族主义立场，在组织上走向分离主义道路的错误行动和主张。最后，斯大林提出了解决俄国民族问题的五个必要条件，即：国家完全民主化；坚持民族自决原则；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工人的国际主义团结。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系统地提出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论证了列宁主义的民族问题纲领，捍卫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列宁曾给该书以很高的评价，称它是当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著作中“首屈一指”的论文，

它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解决民族问题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论列宁》

是斯大林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即列宁逝世后的第十天)在克里姆林宫军校学员晚会上的演说。收入《斯大林全集》第六卷。

当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病重期间和逝世之后，隐藏在苏共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托洛茨基纠集反列宁主义的集团和分子，疯狂地攻击列宁和列宁主义，妄图用托洛茨基主义代替列宁主义，阴谋篡党夺权。为了保卫列宁和列宁主义，高举和捍卫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驳斥托洛茨基主义的种种谬论，斯大林发表了《论列宁》这篇演说。

斯大林在演说中，以生动具体的事例，形象地描述了列宁的性格和优秀品质。斯大林说，列宁是党的山鹰，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引导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革命道路前进，是一个最高典型的领导者；他质朴谦虚，平易近人，是千百万群众热爱的新领袖；他不骄不馁，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敢于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他无限相信群众的创造力，无限热爱人民，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他最善于观察和掌握形势的变化，能及时为党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他真是才华毕露，洞察一切，预见到各阶级的行动和革命进程的可能曲折，他对这些东西简直是了如指掌。”(《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5页)斯大林称誉列宁是组织革命的天才，领导革命的伟大能手。

斯大林的这篇演说，深刻地刻画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

列宁的光辉形象，极大地教育了人民群众，同时，也有有力地回击了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对列宁的种种诬蔑诽谤，维护了领袖的崇高威望，捍卫了列宁主义的旗帜。

《论列宁主义基础》

为了回击托洛茨基等人对列宁主义的攻击，保卫列宁主义，为使全党和全体苏联人民正确理解列宁主义，斯大林继《论列宁》之后，于一九二四年四月初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作了题为《论列宁主义基础》的重要讲演。同年四月和五月间在《真理报》上发表。编入《斯大林全集》第六卷。

《论列宁主义基础》全书共分九章，各章的标题分别是：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方法、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农民问题、民族问题、战略与策略、党、工作作风等。斯大林就上述问题扼要地论述了列宁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所作的新贡献，说明列宁如何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激烈斗争中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在讲演中，斯大林首先给列宁主义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指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在谈到列宁主义的“方法”和“理论”问题时，斯大林揭露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方法和理论教条，深刻地说明列宁主义方法的基础和实质是理论和实践的一致，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批评精神。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认为，革命并不一定要在工业发展程度较高的地方发生，“资本战线将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86页），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一国或

数国取得胜利。在《无产阶级专政》一章中，斯大林阐述了列宁主义的三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在《农民问题》这章中，斯大林指出，列宁主义认为农民问题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的问题，应当使农民由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后备军，俄国三次革命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民族问题》这一章中，斯大林阐述列宁主义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联结起来，使民族问题由局部的国内问题，变成了一般的和国际的问题，变成了殖民地附属国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问题，是无产阶级总问题的一部分。在最后的几章中，斯大林对战略和策略问题、党的理论问题以及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等问题，也作了详尽的研究和阐述。

《论列宁主义基础》系统地阐明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力地捍卫了列宁主义，对于从思想上粉碎托洛茨基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以及一切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起了重大作用。同时，它从理论上和思想上武装了布尔什维克党，以便教育和团结各国共产党人，使之沿着列宁主义指引的方向前进。至今这一名著仍然是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

是斯大林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收入《斯大林全集》第六卷。

这篇演说，是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重要文献。托洛茨基乘列宁病逝之机发难，于一九二四年秋抛出《十月的教

训》等文章，打着总结历史经验的幌子，肆意歪曲历史，贪天功为己有，把自己打扮成十月革命的“鼓舞者”和“领导者”。同时极力丑化列宁，贬低和抹煞列宁对十月革命的领导作用，妄图用托洛茨基主义代替列宁主义。为了捍卫列宁主义旗帜，粉碎托洛茨基的反革命阴谋，斯大林发表了《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这篇演说，对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批判。

在这篇演说中，斯大林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托洛茨基歪曲历史，捏造事实，把自己美化成为十月革命的“鼓舞者”和“领导者”的奇谈，阐明了列宁在十月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指出十月革命的鼓舞者和领导者不是托洛茨基而是伟大的列宁；深刻剖析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及其反动本质，论述了托洛茨基主义同列宁主义的根本对立；戳穿了托洛茨基吹嘘自己比列宁“先知”的谎言，揭露了他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的阴谋。

斯大林的这篇演说，揭露了托洛茨基卑劣的反革命行径，剖析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动本质，划清了列宁主义同托洛茨基主义的界限，阐明了党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性质和意义，为彻底粉碎托洛茨基反党集团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

是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为《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写的序言。收入《斯大林全集》第六卷。

本书是批判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重要论著。一九二四年底，苏联的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将告完成，大规模的

社会主义建设行将开始。这时，托洛茨基又重弹其反动的“不断革命论”的老调，借口俄国经济技术落后，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可能性，胡说没有世界革命的“不断”胜利，“就休想革命的俄罗斯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从而否定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原理的正确性。为了批判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捍卫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学说，并以此在思想上武装苏联人民，以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斯大林撰写了本文。

斯大林在文中，总结了十月革命的经验，分析了十月革命的国内外条件，论述了十月革命的特点与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阐明了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论证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学说的正确性，揭露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反动性。针对托洛茨基否认一国可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谬论，斯大林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在苏联一国的胜利与世界革命的关系。斯大林指出，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开始和前提，苏维埃国家已成为世界革命的策源地，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将大大促进世界革命。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依靠自己同农民的巩固联盟，依靠本国的内部力量，能够独立地建成社会主义，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要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包围，才能根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此，必须依靠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援。但如果由此得出结论，否认一国可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就是把社会主义在一国的胜利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混为一谈，就是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内任务和国际任务混为一谈。这是打着世

界革命的旗号反对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学说，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

斯大林有力地驳斥了托洛茨基否认一国可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反动谬论，阐明并发挥了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学说的原理。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批判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而写的重要著作。一九二六年三月发表。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当时，国民党右派害怕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便加紧了背叛革命的活动。在我们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看不到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他们推行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不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反对国民党右派的背叛行为；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忽视了农民。他们都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革命的同盟军。他们从不同的方面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毛泽东同志在文章一开始，就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的经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第一次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作了全面的科学的分析，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贫农

和其他半无产阶级、中农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具有两面性的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的知识分子是我们的敌人。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分析了当时我国的阶级关系，确定了敌我友的界限，从而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前途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完整地提出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根本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严厉地批判了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著作，是我党成立以来，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篇伟大著作，是运用马列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中国社会，解决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杰出典范，是对马列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理论的卓越贡献。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是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为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为头目的新军阀在全国建立了极端黑暗的反动统治。革命暂时转入低潮。为了挽救革命，毛泽东同志坚决贯彻党的“八七”会议关于武装反抗国民党和进行土地革命的决议，高举秋收起义的火炬，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但

是，当时陈独秀却认为，蒋介石政权的建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取得胜利，党只能搞合法斗争，以便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条取消革命的路线。同时，有的同志则坚持举行城市暴动，攻打大城市的“左”倾盲动主义；在根据地内，也有人散布右倾悲观论调，怀疑红色政权是否能存在下去。为了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和悲观论调，教育全党认清革命的道路和坚定胜利的信心，毛泽东同志写了这个决议。

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和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深刻地分析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明确地指出，当时的革命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精辟地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政治、经济特点，论证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的根本原因和必要条件，第一次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思想，总结了开辟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工农武装割据地区的扩大应该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充分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明确地指出了解决经济问题对于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论证了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设根据地这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比较完整地提出了“红色政权”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在本文中，提出了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根本上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同时也丰富了马列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

《实践论》

是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三七年七月撰写的著名的哲学著作，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当时，我们党已先后经历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左”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使革命遭受极大的损失。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为了总结革命斗争以及党内的思想斗争、路线斗争的经验，肃清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加强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以便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同志以极大的精力从事理论工作，先后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两篇伟大哲学著作。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方面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毛泽东同志曾以本文的观点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过讲演。现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同志首先论述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阐明了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实践在认识论中的首要地位和作用，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认识的目的。毛泽东同志深刻分析了在实践基础上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提出了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的光辉思想，即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能动地上升到理性认识，又由理性认识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客观世界和

主观世界。毛泽东同志进一步论述客观过程是不断推移和发展的，人们的实践也在不断推移和发展，这就要求人们在实践中对于客观过程的认识也应当跟着不断推移和发展，坚持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最后，毛泽东同志高度概括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全部内容，科学地揭示了认识运动的总规律，为我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提供了锐利的武器。

《实践论》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中的重要著作。它的发表，使全党从思想上认清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认识论根源，为后来的延安整风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矛盾论》

毛泽东同志著名的哲学著作，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八月，是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曾在抗日军政大学作过讲演。后来，作者又对本书进行过部分的补充、删节和修改。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首先阐明了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指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承认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唯物辩证法教导人们，要善于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毛泽东同志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毛泽东同志阐述了矛盾的特殊性问题，指出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因此，要善于对具体事物作具体的分析。毛泽东同志还阐明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问题，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要善于抓主要矛盾，但同时对非主要矛盾也不能忽视。同时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在矛盾的两方面中，我们也不能把它们一律看待，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事物的性质，主要的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毛泽东同志还阐明了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指出，一切矛盾着的東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面的互相排斥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毛泽东同志还阐明了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指出，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最后，毛泽东同志结论说，事物矛盾的规律，即对立统一的规律，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规律。

《矛盾论》深刻阐明和发挥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核心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它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关系方面清算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批判了苏联德波林学派关于差异不是矛盾的谬论，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它和《实践论》一起，为我们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是论述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文章。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并虎视华北，国家存亡危在旦夕。为了拯救民族危亡，我党一方面派出大量的子弟兵分赴抗日战场，一方面通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但是，在对待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问题上，党内出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为了统一党内思想，团结抗战，我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彻底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这一重要结论。

文章阐明了我党关于统一战线中各党派之间积极互助互让的相互关系准则，总结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劳资合作论”及陈独秀、张国焘投降主义路线危害的历史教训；论述了大敌当前，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的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驳斥了在牺牲党和阶级利益前提下搞阶级调和的投降主义思想，强调了我党的独立自主，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确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谬论，指出它实际上就是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从而也将最终取消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

路线。

文章指出，只要坚持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我们就能达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和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伟大目标。在理论上，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战略与策略原理的丰富和发展。

《新民主主义论》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撰写的一篇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著作。一九四〇年一月发表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一九四〇年前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实现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阴谋，集中全力反共反人民，不仅发动反对我党的军事进攻，而且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对我党进行攻击和诬蔑。因此，要坚持抗日战争，就必须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在这一形势下，怎样继续抗战，在抗战胜利后要建立一个什么国家等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需要向全国人民解答。

为了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and 政策武装全党，指引全国人民在复杂的环境中认清胜利前进的方向，毛泽东同志在理论战线上进行了艰巨的斗争。

在本文中，毛泽东同志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的历史特点和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总结了近百年来，特别是二十年来中国革命的经验，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和转变等问题，作了科学的回答。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革命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

封建主义。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痛斥了各种要求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叫嚣；同时批驳了那种混淆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所谓“一次革命论”，指出，其目的是想消灭任何革命，而为投降日寇作舆论准备。在文中，毛泽东同志详尽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指出这三者的结合，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新民主主义论》是一部论述中国革命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科学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的理论和纲领，对指导中国革命起了巨大的作用。

《改造我们的学习》

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一年五月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这篇报告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篇著作同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基本文献。

为了从思想上彻底清算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的流毒和影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党中央决定在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的有利时机，发动全党开展一次整风运动，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就是毛泽东同志为这次整风运动所作的思想动员和理论准备。

《改造我们的学习》分析了党内的学习状况，揭露了党

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学风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风的对立，对于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只会生吞活剥地引用马克思主义词句，而不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主观主义学风，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并严肃地指出，这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对革命有极大的危害，务须纠正与克服。毛泽东同志提出对全党的学习方法要来一个改造，并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目的、方针和方法作了系统的论述。毛泽东同志指出，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去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找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把革命推向前进。

毛泽东同志在本文中倡导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风，不仅为我党克服主观主义学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也为我们完整、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识别和揭露形形色色假马克思主义骗子，提供了锐利武器。因此，今天认真学习这篇光辉著作，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 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这是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一九四九年春，我国正处在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前夕。夺取民主革命的全面胜利，及时地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作好思想准备，党中央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重要报告。

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分析了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提出了夺取全面胜利的战略方针和行动纲领；科学地剖析了当时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及阶级关系，为全党制定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将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党的工作重心将从乡村转向城市，恢复和发展生产，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他号召全党，要学会管理生产和组织生产，要把恢复和发展生产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如果我们不能很快学会组织和管理生产，不能使生产有所提高，人民生活有所改善，我们就不可能维持政权。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报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不断革命论同革命发展

阶段论相结合的典范。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我们党实现革命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作了思想准备。

《论人民民主专政》

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而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重要论文。现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一九四九年六月，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在全国范围内被推翻，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但是，在中国人民怎样巩固自己的胜利，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上，存在着激烈斗争。国内外阶级敌人，咒骂中国共产党实行“独裁”，是“极权主义者”；一些资产阶级右翼人物，否认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毛泽东同志为了驳斥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攻击和诽谤，纠正和批判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前进的方向，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

在文中，毛泽东同志回顾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的斗争历程，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来所取得的基本经验，提出了新中国政治的总方针和总政策，即对内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对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痛斥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对我党的种种诬蔑和攻击，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前途是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明确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和任务，划清了人民民主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界限；论证了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和强化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性。文章最后详细分析了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以及人民民主专政为什么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

《论人民民主专政》不仅提出了建设新中国的基本原则，并且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实践上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了锐利武器。

《论十大关系》

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一九五六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确立。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伟大历史任务。为调动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性，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这一重要讲话。

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分析了十个方面的关系：（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七）党和非党的关系；（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九）是非关系；（十）中国和外国关系。通过解决这十个方面的矛盾，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只

有实行这个方针，才有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实行这个方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兴旺发达；违背这个方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受到挫折。

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确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道路。这对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对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和缺点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驳斥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谬论，对斯大林的功过作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有力地回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论十大关系》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是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经修改，于同年六月十九日刊载于《人民日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一九五七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尤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历史提出的新课题。为了回答和解决这一新的

历史课题，毛泽东同志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作了报告。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全书分十二个部分：（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二）肃反问题；（三）农业合作化问题；（四）工商业者问题；（五）知识分子问题；（六）少数民族问题；（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十）坏事能否变成好事？（十一）关于节约；（十二）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通过对上述十二个问题的论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指明了解决基本矛盾的途径和方法；剖析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阶级关系，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提出了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本书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从理论上回答了历史提出的新课题，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和道路，制定了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并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

(二)

托马斯·莫尔

托马斯·莫尔(1478—1535)，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十六世纪初英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生于法官家庭。曾先后就学于牛津大学和新法学院，毕业后进入伦敦法律界，担任过议员、财政副大臣、下议院议长、大法官等职。后因在宗教政策上同国王有分歧而被迫辞去官职。一五三四年由于拒绝宣誓承认英王是教会的首领而被监禁。一五三五年被处死。

莫尔一五一六年出版了《关于更好社会生活组织及新岛乌托邦的金书》(简称《乌托邦》)，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在书中，他批判了当时英国和其它欧洲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痛斥了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指出了私有制是劳动人民贫困和不幸的根源，消灭私有制是保证人人过幸福生活的唯一途径；他虚构了一个乌托邦岛上的理想社会，在那里，废除了私有制，实行公有制，计划生产和消费，人人从事劳动，人人享受幸福和快乐。

莫尔虽然揭露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罪恶，但不能正确地说明资本主义剥削的特点和历史地位。他描绘了未来的理想社会，但不能指出理想社会代替现存制度的现实途径。他否认阶级斗争和用暴力推翻旧制度的必要性，寄希望于统治阶级，相信“理性”万能，这就决定了他的思想是唯心主义

的空想。但莫尔的《乌托邦》一书对以后的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康帕内拉

托马斯·康帕内拉(1568—1639),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十六至十七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思想家和爱国者。生于农民家庭,因家贫,年轻时就当了僧侣,以后在修道院里研究神学和哲学而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积极参加了意大利人民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解放斗争,过了二十多年的囚徒生活。在狱中,他顽强地从事写作。出狱后,流亡法国,在巴黎一个寺院中整理自己的全集直至逝世。

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年)一书,是叙述他的基本思想的代表作。书中对其虚构的理想国家——“太阳国”作了详细的描绘。在那里,人民过着绝对平均的生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没有贫,没有富,没有任何犯罪行为。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他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光荣的思想,主张每天劳动四小时,人人参加劳动。在对现存制度的批判上,他把利己主义和私有制联系起来,认为私有制是利己主义的根源,并对其进行鞭笞。

康帕内拉的思想,表达了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意大利城乡贫民和下层知识分子的主观愿望。但他对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和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缺乏科学的认识,没有提出改造现存社会制度的现实道路。因此,他的学说只是一种空想。

摩莱里

摩莱里(生卒年月不详),十八世纪法国的空想共产主义

者。主要著作有《巴齐里阿达》(1753年)和《自然法典》(1755年)。在这两部著作中,他详细地阐明了自己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认为私有制是造成贫穷、痛苦和一切罪恶的根源,主张建立公有制社会。他以法律条文形式规定了未来理想社会的三条基本原则:(1)财产公有,“什么东西都不属于单独个人的,或作为某人的财产”;(2)每个人都是“国家的公民”,应为国家工作,靠社会供养生活;(3)每个人要尽其所能,以促进社会公益的不断增长。按照这些原则,未来社会实行计划分配,民主推选各级公务人员。

摩莱里的思想,反映了不成熟的无产阶级要求摆脱剥削和奴役的愿望,对法国大革命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它具有绝对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特色。摩莱里没有找到实现社会改造的阶级力量,甚至把实现理想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这种思想对社会主义运动是极其有害的。

马布利

加布里埃尔·马布利(1709—1785),十八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空想共产主义者。生于贵族家庭。在里昂耶稣学院毕业,后到巴黎当外交大臣的秘书。几年后,他抛弃了官职,去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其主要著作有《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1758年)、《论法律和法律的原则》(1776年)等。

马布利同摩莱里处于同一时代,基本思想大体相同。他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所谓私有制是人们“天赋”权利,消灭私有制就是消灭人的积极性的荒谬观点;认为公有制是人类理性的要求,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人类只有在公有制下才能有幸福可言。但是,马布利错误地把原始社会视为人类

的“黄金时代”，认为由于私有制占统治地位，自私自利相沿成习，再也不能恢复到所谓的“黄金时代”。因此，他主张采取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性质的立法措施来防止私有制的发展，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可见，马布利的共产主义学说是“苦修苦练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8页）。

巴贝夫

格拉古·巴贝夫(1760—1797)，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家，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原名弗朗斯瓦·诺艾勒·巴贝夫。生于农民家庭。法国大革命期间，他站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边，坚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他目睹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开始转向空想共产主义。一七九四年他创办《自由新闻》(后改为《人民论坛》)，进行革命宣传。一七九五年又建立平等派密谋团体，准备进行武装起义，推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结果失败。一七九七年五月被处死刑。

巴贝夫学说的核心是原始共产主义的平均主义。他要求废除财产继承权和私有制，主张一切人之间除了年龄和性别外，不应有其它差别；主张用暴力革命来消灭私有制，铲除暴政的根源，建立劳动者的政权。这些思想使他的学说成为“超出整个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2页）。巴贝夫理想的社会是“平等共和国”，在共和国内建立以财产公有制为基础的“全民公社”，社员共同劳动，计划管理经济，平均分配产品；居民都住在农村，城市趋于消亡。

巴贝夫的学说基本上是一种农村社会主义，具有农民绝对平均主义的特征，带有很深的小农经济的烙印。他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没有把共产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企图通过少数革命者的密谋，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而是空想的。

卡贝

埃蒂耶纳·卡贝(1788—1856)，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生于贫民家庭。参加过一八三〇年法国七月革命，做过检察官和众议院议员，后因办报反对七月王朝被判处徒刑，一八三五年逃亡英国。

一八四〇年，卡贝发表了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提出了他的共产主义思想。他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的人人平等和幸福的社会。“伊加利亚”就是他的理想社会。但他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反对暴力革命，企图用和平改良的办法，通过建立小规模“共产主义新村”来实现他的理想社会。一八四七年，他移居美国，进行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实验，结果遭到失败。

卡贝的思想，曾一度在工人中有较大的影响。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伊加利亚派共产主义者在法国有五十万人(不包括妇女)。马克思说，卡贝是“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页)。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和日益成熟，卡贝的立场日益显露其反动性，并逐步失去对工人运动的影响。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生于官僚家庭。早年在提宾根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一八一八年受普鲁士政府聘请，主持柏林大学哲学讲座。一八三〇年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校长，是公认的官方哲学家。著有许多著作，其中《逻辑学》(1812——1816年)、《自然哲学》(1817年)、《精神哲学》(1817年)等构成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黑格尔在哲学上的巨大功绩，是进一步批判了形而上学，恢复和发展了辩证法，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不断运动和发展变化的辩证过程，并试图揭示出这个过程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但是，他的整个哲学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他把现实世界说成是某种永恒的、超物质的“绝对精神”的体现。在他看来，运动、发展着的不是物质自然界，而是所谓作为上帝化身的“绝对精神”。黑格尔只承认过去发展到现在，不承认现在向未来还继续发展。他用“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个哲学命题，来说明普鲁士专制制度是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因此，他的唯心辩证法是神秘的、不彻底的，他的历史观是反动的。黑格尔哲学的不彻底性，是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表现。

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加以革命的改造，批判地吸取了其中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抛弃了它的唯心主义，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费尔巴哈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德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生于律师家庭。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在德国宣扬并捍卫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临终前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主要著作有《黑格尔哲学批判》(1842年)、《基督教的本质》(1842年)和《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等。

费尔巴哈早年倾向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后来在同宗教的斗争中发现了宗教同唯心主义的本质联系，促使他转到唯物主义方面。他的主要功绩是在唯心主义长期统治德国哲学界之后，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他肯定自然界不依赖观念、意识而独立存在，空间、时间与机械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体；因此，人能认识客观世界和客观规律。但是，费尔巴哈的认识论带有形而上学的性质。他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同时，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在否定了过去的宗教以后，却企图建立一种无神的“宗教”。他宣扬超阶级的“爱”，即人性论，并把人看作是一种脱离历史和社会关系而存在的抽象的单纯的生物学上的人。因此，他对社会现象的理解上，始终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马克思、恩格斯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中吸取了它的“基本内核”，把它向前发展成为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

的创立者。生于海关官员的家庭。肄业于牛津大学，曾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伦理学和道德哲学教授。一七六四年游历欧洲，结识了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杜尔哥等。一七七六年，他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本书不仅用新的研究成果丰富了经济学，而且第一次把当时一切经济学知识归纳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马克思指出：“在亚·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181页）。

亚当·斯密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最大贡献，就是首先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和价值的尺度。但他的劳动价值论具有不少的缺陷和错误，如他认为价值是为工资、利润和地租所构成的。在分配论上，他也同时并存着科学的成就和错误的见解，如他既说利润是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又说利润是企业主服务或资本职能的报酬。

亚当·斯密代表产业革命开始时期资产阶级的利益，抨击重商主义，主张自由竞争，对英国经济政策的改革曾起过重大作用。他与大卫·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

李嘉图

大卫·李嘉图(1772—1823)，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生于一个交易所经纪人的家庭。早年跟父亲在证卷交易所从事投机活动。一七九九年他接触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书，引起了对经济学的兴趣，

从一八〇九年开始，发表了一系列的经济学著作，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作是一八一七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八一九年，他当选为英国国会议员。在政治上，他属于资产阶级激进派。

李嘉图的主要科学功绩就是进一步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进行了一定的分析，认识到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的对立，探讨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阶级对立的经济表现。但是，他没有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也不可能了解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

在工资理论方面，李嘉图正确地断定工资额的大小是由工人及其家属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工资和利润是互相对立的。但是，他又信奉马尔萨斯的反动人口论，把工资的变动当作与资本主义制度无关，而是由自然原因自动调节的自然规律。

李嘉图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的理论体系的基本思想，就是鼓吹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他与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

圣西门

昂利·圣西门(1760—1825)，十九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生于法国贵族家庭。参加过美国的独立战争，曾对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表示同情。这场革命在他的思想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恩格斯称他是“法国大革命产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9页）。其主要著作有《论

实业制度》(1821年)、《实业家问答》(1823—1824年)、《新基督教》(1825年)等。

圣西门认为，历史是一个统一的、进步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法国革命是贵族、市民等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他抨击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灾难的“是非颠倒的世界”。他幻想建立一个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参加劳动，人人平等；有统一的科学计划来组织大工业生产；对人的政治管理将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的指导；国家变为生产管理机关。

但是，圣西门的哲学思想从根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教育、道德和科学进步，社会是随着人类理性的进步而发展的。所以，他不可能揭露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不了解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不要求剥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主张通过和平宣传来改造社会，这表明了他的社会主义的空想性质。圣西门和傅立叶、欧文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

傅立叶

沙尔·傅立叶(1772—1837)，十九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生于法国富商家庭。中学毕业后学商，做过中间商人和经纪人。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末，他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竞争、投机、欺诈等黑暗内幕，写了许多论文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探求社会主义改革的途径并拟定未来理想社会的计划，成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其主要著作有《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08年)、《新的工业世界和社会世界》(1828—1830年)等。

傅立叶把经济因素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志，并认为资本主义不过是历史运动的一个暂时阶段，它必将为更高一级的社会制度所代替。恩格斯说：“傅立叶最伟大的地方是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0页）。傅立叶猛烈地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指出雇佣劳动制度是“复活了的奴隶制度”，资本主义工厂是“温和的监狱”和“贫困的温床”；断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散性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生产竞争和无政府状态，最后导致经济危机。他还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资本主义商业的三十六条罪状。恩格斯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对资本主义社会“能够进行这种批评的只有傅立叶一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59页）。

傅立叶主张建立以“法朗吉”为基层单位的理想社会。在“法朗吉”里，有富人和穷人，有资本家和工人；大家共同劳动，按个人的劳动、资本和技能来分配收入；普及义务教育，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傅立叶还第一次提出了妇女解放的程度，是每一个社会一般解放的“天然尺度”的著名思想。

傅立叶否认阶级斗争，抛弃一切政治行动，忽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主张通过和平宣传，以实例示范来改造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这种空想社会主义不能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但是，他的学说中的合理成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对启发当时工人的觉悟有积极的意义。

欧文

罗伯特·欧文(1771—1858)，十九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

主义者之一。生于英国手工业者家庭，当过商店学徒和纺织厂职员。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成为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晚年在英国组织过“社会主义研究会”，并积极参加了工会和合作社运动。其主要著作有《新社会观》（1813—1814年）、《社会制度》（1821年）等。

欧文以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为依据，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私有制、宗教和资产阶级的婚姻制度是“三位一体的祸害”，其中私有制是一切灾难的根源；他抨击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两极的尖锐对立，第一次提出了工人有权享有自己全部劳动产品的思想；他肯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并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和“力量无限的新的生产力”不相适应，必须进行变革。

欧文初步提出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思想。他的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是农、工、商、学相结合的“合作公社”。公社采用大机器集体生产，产品按需分配。一八二四年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购置了三万英亩土地，创办了一个所谓共产主义新村——“新和谐村”，进行示范性试验，但很快就失败了。

欧文在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描绘新社会的图景方面，对工人起了教育和启蒙的作用。他学说中的合理成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但他不懂得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把改变社会制度的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慈善”上，这些观点对工人产生了有害的影响。

梯叶里

雅克·尼古拉·奥古斯丹·梯叶里(1795—1856)，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承认社会划分为阶级，曾指出十七世纪英国长老会派和天主教派之间的宗教斗争是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但是，他同基佐、米涅等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一样，在承认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斗争时，却否认资产阶级内部以及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否认资产阶级统治下阶级斗争的必然性。梯叶里一生写过许多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三等级起源与成功史》(1853年)。

米涅

弗朗斯瓦·奥古斯特·玛丽·米涅(1796—188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生于小手工业者家庭。青年时期当过中学教师。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前夕，他同梯也尔等人一起创办《民族》报，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八年任外交部档案局局长。米涅一生写过许多历史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是一八二四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史》。他在这部著作里，竭力论证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合理性。他同基佐、梯叶里等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一样，看到了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但是却把这种斗争仅仅局限在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斗争的范围内，否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他是资产阶级利益的忠实代表者。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基佐(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反动的政治活动家。生于资产阶级家庭。从帝国时代开始，从事学术和政治活动。七月王朝时期，曾先后任内政部长、国民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和总理职务。他操纵法国的内政和外交，代表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实行一套反动的对内对外政策。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他成为屠杀工人的刽子手。

基佐作为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曾写过许多著作。在这些著作里，他从分析法国的历史出发，提出和论证了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法国的历史就是第三等级反对另外两个特权等级的斗争史，而十八世纪末期资产阶级革命是“这场斗争的结局”。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时，他抛弃了以往这些理论，显露出资产阶级政客的狰狞面目。

布鲁诺·鲍威尔

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领袖之一。生于埃森堡，曾任柏林大学和波恩大学神学讲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因所著《约翰福音史批判》和《对观福音书作者的福音史批判》两部书获得声誉。但从六十年代起，就向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妥协，成为民族自由党人。

鲍威尔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虽然他在批判德国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施特劳斯时，证明了福音的传说是虚构的，

是个别人蓄意创作的成果。但他认为，“伟大人物”的“自我意识”，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从而把“伟大人物”看成是精神的代表，把人民视为“呆滞的物质”。他用理论上的、纯粹口头上的对普鲁士现实的“否定”，来代替对普鲁士封建现实的实际斗争。鲍威尔的这些唯心主义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受到了无情的批判。

克利盖

海尔曼·克利盖(1820—1850)，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原是德国新闻工作者。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侨住美国后，在纽约领导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集团，并主编《人民论坛报》。他大肆鼓吹伤感主义的“爱”的梦呓，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引诱当地的德国侨民脱离革命运动。克利盖的活动，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无情批判。一八四六年五月，马克思、恩格斯召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会议，对克利盖的有害活动进行了斗争，并主持通过了《反克利盖通告》。克利盖从此在政治舞台上消失。

格律恩

卡尔·格律恩(1817—1887)，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当过记者。一八四八年曾当选为普鲁士国民会议员。他鼓吹“博爱”，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主张用工人的小额储蓄来开办工厂和作坊，进而购买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以至废除资本，消除贫困。格律恩的这些谬论在巴黎的正义者同盟成员中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一八四八年八月，

恩格斯受马克思和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的委托，前往巴黎对格律恩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巴黎正义者同盟组织不久就同格律恩之流断绝了关系，并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一八四八年革命后，格律恩及其“真正的社会主义”失去了对工人运动的影响。

魏特林

威廉·魏特林(1808—1871)，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平均共产主义者。早年当过裁缝工人。一八三五年在巴黎参加流亡者同盟，后转入正义者同盟，并成为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曾长期在法国、瑞士等国著书立说，从事宣传活动。其主要著作有《现实人类和理想人类》(1838年)、《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贫苦罪人的福音》(1843年)等。

魏特林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指出“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主张建立一个人人参加劳动，产品平均分配，待遇平等的和谐与自由的社会。他和圣西门、傅立叶等人不同，不把希望寄托在上层阶级的同情上，而承认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主张用群众的盲目暴动实现社会革命。魏特林反对教育和宣传工作，反对有组织的群众政治斗争，认为只要有英明果断的领袖出来，革命就可以在任何时机完成；他认为流氓无产者是争取新社会的先进战士；他不懂得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认为当时封建君主制的德国立即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在正义者同盟里有很大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曾耐心帮助他，希望他改正错误。但他拒绝这种帮助。一八四八年魏特林回德国参加革命。一八四九

年流亡美国，不久即脱离了工人运动。

约瑟夫·莫尔

约瑟夫·莫尔(1813—1849)，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奠基人之一。生于德国科伦。曾当过钟表修理工人。一八三四年参加了“青年德意志”组织。一八三六年在巴黎参加了德国侨民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一八四〇年他与沙佩尔等人在伦敦创立了德国工人教育协会。一八四七年莫尔为把正义者同盟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了积极努力。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爆发后，莫尔立即回国参加革命，担任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同年九月，德国政府下令逮捕莫尔。莫尔被迫流亡伦敦。他改名后很快又回到德国，在各地进行宣传活动。一八四九年，莫尔参加了巴登——普德尔茨起义，在牟尔克城战役中阵亡。恩格斯曾给予莫尔很高的评价。

沃尔弗

威廉·沃尔弗(1809—1864)，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生于德国农奴家庭。曾当过中学教师，早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捕过。一八四六年，他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后在布鲁塞尔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和区部的建设工作。任过《新莱茵报》编辑。参加过法兰克福议会。

一八四八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他被捕入狱，在狱中惨遭毒打，但他英勇不屈。出狱后，又积极参加了马克思建立的新的“同盟”中央委员会，并且坚决地支持了马克思反

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太德的斗争。德国三月革命爆发后，他回到德国，按照马克思的策略路线——站在民主运动的左翼，帮助了马克思对庸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福格特进行斗争。

一八四九年七月，沃尔弗来到瑞士，开始了流亡生活。于一八六四年九月去世。他逝世后，马克思、恩格斯给予他很高的评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扉页上写道：“献给我的不能忘记的朋友，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威廉·沃尔弗”。

亨利希·鲍威尔

亨利希·鲍威尔(生卒年月不详)，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曾当过皮鞋匠，后加入正义者同盟，并成为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一八三九年五月，他在法国参加了布朗基的“四季社”起义。起义失败后，被路易-菲利浦政府逮捕，驱出法国。此后在伦敦与莫尔等人一起从事革命活动。一八四七年，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他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爆发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他积极投身于革命之中。革命失败后，于一八五一年流亡澳大利亚，后失踪。

魏德迈

约瑟夫·魏德迈(1818—1866)，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生于普鲁士官吏家庭。毕业于柏林陆军大学，当过炮兵军官。后从事新闻工作，并参加了革命民主运动。他是最早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老盟员之一，曾任“同盟”法兰克

福区部委员会主席。一八四八年德国三月革命爆发后，他积极领导了威斯特伐利亚的民主运动。在同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斗争中，他支持马克思，拥护“同盟”将该集团开除的决定。

一八五〇年，魏德迈流亡美国。他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曾站在北方进步力量一边，参加了美国南北战争。他是美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无产者同盟的创造者。一八六四年第一国际成立时，他是第一国际美国支部的组织者之一。他一生与马克思、恩格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曾帮助马克思、恩格斯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一八六六年病逝。

沙佩尔

卡尔·沙佩尔(1812—1870)，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生于牧师家庭。中学毕业后进入吉森大学研究林业。他参加过青年德意志、正义者同盟等组织，曾几次被捕，流亡瑞士、法国、英国等地。一八四五年，他参加民主派兄弟协会，担任书记职务，开始与马克思接近。一八四六年，他又参加并领导了正义者同盟。一八四七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后，他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沙佩尔积极参加了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但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他与维利希等人反对进行艰苦的积聚革命力量的工作，不顾革命形势的暂时低落，企图采用冒险主义的办法，在德国举行新的起义。一八五〇年九月，在“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恩格斯严肃地批评了沙佩尔等人的错误倾向。但是他们不仅毫无悔改之意，反而非法另立中央，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结果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

盟。沙佩尔后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于一八五六年起重新和马克思接近，并担任了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哥特沙克

安德烈亚斯·哥特沙克(1815—1849)，德国工人运动中最早出现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当过医生。曾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委员、科伦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他从“左”的方面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制定的无产阶级在德国革命中的策略路线，不顾历史条件，提出建立“工人共和国”，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纲领的冒险主义口号，拒绝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联合行动。在斗争手段上，他反对暴力革命，主张用和平的、合法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同时又耐心地教育他，但他顽固地坚持其错误，并进行宗派分裂活动，最后于一八四八年十月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工人联合会也完全摆脱了他的影响而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策略路线上来。

波尔恩

斯蒂凡·波尔恩(1824—1898)，真名是西蒙·布特尔米尔希，德国工人运动中最早的改良主义代表之一。当过排字工人，曾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柏林工人中央委员会和工人兄弟会的主席。一八四八年革命中，他从右的方面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德国革命的策略路线。在政治上，他竭力宣扬改良主义的经济斗争，把争得眼前利益的细微改善，作为工人阶级的基本目标；反对无产阶级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

进行政治斗争；并甘愿把革命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在组织上，他急于想成为政治领袖，不惜和各式各样的坏分子纠合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同波尔恩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波尔恩很快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最后堕落为瑞士的一个资产阶级教授。

路易·勃朗

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生于没落贵族家庭。当过新闻记者。一八四〇年写成《劳动组织》一书，系统地表明了他的机会主义观点。他主张依靠资产阶级国家帮助，组织“社会工场”，以消灭竞争，逐渐消除私营企业，使社会生产成为社会的普遍的生产组织形式。因此，他认为工人阶级的任务不在于通过革命斗争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争取普选权和确立社会共和国，以此来建立劳动组织。

一八四八年法国二月革命后，他以工人代表的名义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任劳动委员会主席。他鼓吹劳资合作，麻痹和欺骗工人。六月起义爆发时，他充当资产阶级屠杀工人的帮凶。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建立以后，他站在凡尔赛反动政府方面，反对巴黎公社，攻击第一国际。列宁指出，路易·勃朗是“资产阶级的尾巴，资产阶级手中的玩具”（《列宁全集》第25卷，第45页）。

阿尔伯

阿尔伯(1815—1895)，真名亚历山大·马丁，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法国工人。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

的领导人之一。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后，他与路易·勃朗作为工人的代表选入临时政府，任专门研究工人问题的常设委员会——劳动委员会的副主席。但该委员会是个徒有其名的虚设机构，是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的两个祭司长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所负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乐土，宣告新福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1页）而无产阶级却依然处于被奴役的状况。同年五月十五日，工人示威游行时，资产阶级调动军队进行镇压，逮捕了阿尔伯等人，取消了劳动委员会。

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生于官僚家庭。早年攻读法律和医学，但对政治很感兴趣，积极参加了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组织过“四季社”等秘密团体，领导过多次秘密起义，但都由于不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而失败。巴黎公社革命前夕，他组织了旨在推翻“国防政府”的一八七〇年十月三十一日起义，被捕入狱。巴黎公社成立时，缺席当选为公社委员。他在从事革命活动的五十年间，有三十余年是在狱中度过的。一八七九年出狱后，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布朗基主张进行政治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但他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组织工人革命政党的必要性。所以，“布朗基主义不是想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想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阴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列宁全集》第10卷，第361页）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赞扬布朗基是大无畏的革命家 and 社

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同时又尖锐地批评了他的宗派主义和密谋活动的方法。

马志尼

朱泽培·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之一。生于热那亚。一八二七年参加烧炭党人运动，一八三〇年被捕，被逐出热那亚。一八三一年，他在马赛成立了秘密的共和派团体青年意大利党。他热烈拥护资产阶级民主、民族独立和自主的原则，提出了“自下而上”地建立统一的意大利的革命纲领，并在三十至四十年代发动了多次密谋起义。但由于没有依靠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力量，结果失败。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马志尼建立了意大利民族协会，并且支持和参加了米兰的起义和托斯卡那地区的斗争。罗马共和国成立后，他任临时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他流亡伦敦，在伦敦先后建立了意大利民族委员会和行动党。在反对奥地利的战争时期，以及战后的爱国高潮时期，马志尼在热那亚，为争取意大利的统一进行了斗争。六十年代，马志尼宣传在“劳资合作”和“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解决工人问题。他对第一国际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持敌视态度。

加里波第

朱泽培·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之一。早年当过水手，受马志尼的思想影响，一八三三年加入青年意大利党，次年被捕，被判处死刑。后越狱出走南美，先后参加了巴西的起义运动和乌

拉圭争取独立、反对阿根廷的斗争。一八四八年组织义勇军对奥作战，曾英勇地保卫了马志尼建立的罗马共和国。一八五九至一八六〇年意大利解放战争时期，他率领红衫军远征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七十年代，他为收复罗马，完成意大利的统一，又一次发动起义，结果遭到失败。普法战争期间，他指挥法、意志愿军再度对奥作战，取得重大胜利。意大利统一后，他以残年致力于改进社会的生活，公开同情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拯救社会的运动。加里波第为意大利的统一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事业曾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支持和称颂。

施蒂纳

麦克斯·施蒂纳(1806—1856)，真名是卡斯巴尔·施米特，无政府主义的早期代表，德国主观唯心论者。青年时期当过教师，参加过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一八四五年，他在《唯一者及其所在物》一书中，大肆宣扬极端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他把自我看成是超越客观物质世界的唯一实在，认为决定历史发展的力量正是至高无上的“我”。从这种反动的“唯我论”出发，他狂热地鼓吹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强调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国家、组织和纪律，反对共产主义；主张未来的社会应该是无政府的、独立的小私有者的自由联盟。他的这种观点，反映了妄图使小私有制永世长存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他的反动观点。后来，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为蒲鲁东、巴枯宁所继承和发展。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生于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当过雇工、排字工人，后来和友人合伙开办过小印刷所。一八三七年，他开始从事理论著作活动。其主要著作有《什么是财产？》(1840年)、《贫困的哲学》(1846年)等。

蒲鲁东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批评资本主义，幻想使小私有制永世长存。他认为通过和平的经济改良，就可以摆脱资本主义剥削，主张建立“交换银行”，发放无息贷款，来帮助工人筹集生产资料，使他们成为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保证对小生产者的产品实行直接的无货币的交换。他曾根据自己拟定的方案进行实验，结果交换银行仅仅开办了三个月就垮台了。

蒲鲁东反对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法律、政府和国家，反对组织工会和政党，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主张建立“无政府”社会。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对蒲鲁东的反动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一八四八年革命期间，蒲鲁东曾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担任过《人民代表·劳动者日报》主编。蒲鲁东死后，他的信徒在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中继续进行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1876)，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第一国际中的阴谋家、叛徒。

生于俄国封建贵族家庭。青年时期开始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发生联系。一八四七年，在巴黎与蒲鲁东结识，深受蒲鲁东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参加过一八四八年布拉格起义和一八四九年德累斯顿起义，失败后，他被捕入狱，后被引渡到俄国。在监禁期间，他曾多次向沙皇写忏悔信，乞求沙皇特赦。一八六一年，他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出逃，经日本、美国，流亡欧洲。在流亡期间，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社会革命”观念。巴枯宁认为，国家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祸害，消灭国家是个人解放的必要条件。因此，主张立即消灭“一切国家”，废除“一切权力”和“一切法律”，而以各种“自由社团”自上而下的联合来代替国家组织。在他看来，实现“社会革命”的主力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农民和流氓无产者。这种思想，是发展了的蒲鲁东主义。

一八六四年第一国际成立不久，巴枯宁采取欺骗手段，混入第一国际，阴谋篡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妄想把第一国际变为他私人的工具。他背着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秘密地保留“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阴谋团体，企图破坏第一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和组织上的统一。当他的阴谋败露后，就不择手段地施展造谣、诬蔑、恫吓、暗杀等一切伎俩，从事分裂第一国际，攻击马克思。鉴于巴枯宁的罪恶活动，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他和他的追随者开除出第一国际。以后，他们打着反权威的旗号，继续进行无政府主义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系列著作里揭露和批判了巴枯宁的反革命罪行和他鼓吹的无政府主义谬论。

拉萨尔

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始祖。生于犹太富商家庭。早在学生时代，就妄想成为“伟大人物”。大学毕业后，怀着个人野心，参加了一八四八年革命。革命失败后，从事商业投机活动。六十年代又进行政治活动，混进工人阶级队伍，曾于一八六三年五月至八月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他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但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拉萨尔用剽窃来的各种哲学、政治和经济观点，炮制了一套右倾机会主义理论。他从超阶级的国家观出发，认为国家是“教育和推动人类社会走向自由的工具”，无产阶级只要进行议会斗争，争取普选权，就可以把普鲁士君主国变为所谓“自由的人民国家”。他主张在地主资产阶级国家的帮助下，建立生产合作社，以逐渐排挤掉私人企业，使工人成为自己企业的主人。他宣扬“铁的工资规律”等谬论，歪曲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要求“公平分配”和“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他诬蔑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为“反动的一帮”，反对工农联盟。马克思、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和其它著作中彻底批判了拉萨尔的反动观点。

拉萨尔是德国俾斯麦反动政府安插在工人队伍中的坐探。在他窃取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职务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不仅多次与俾斯麦密谈，并且多次给俾斯麦写信，通过出卖德国工人运动来换取大量的个人津贴。后来，他与别人争夺一个女子，在决斗中被打死。

施韦泽

约翰·巴普提斯特·施韦泽(1833—1875)，德国工人运动中拉萨尔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生于贵族家庭，本人是律师。曾经作为自由派分子参加过争取德国统一的斗争。后来，同拉萨尔相识，成为拉萨尔的忠实信徒。一八六四至一八六七年，施韦泽主编拉萨尔派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一八六七至一八七一年，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

施韦泽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支持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不仅如此，他还企图通过普鲁士国家帮助，实现“社会主义”。他极力反对一八六九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人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极力阻挠德国工人加入第一国际。普法战争期间，他是一个公开的沙文主义者。一八七二年，施韦泽和普鲁士当局的勾结关系被揭露，因而被开除出全德工人联合会，不久即脱离了政治活动。

莫斯特

约翰·莫斯特(1846—1906)，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当过工人，六十年代参加工人运动。一八七四至一八七八年间当选为国会议员。他曾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竭力为杜林辩护，反对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他流亡英国，在伦敦创办无政府主义刊物《自由》周刊。他在周刊上发表大量的文章，鼓吹个人恐怖是进行革命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的正确策略，宣扬不要无产阶级领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提出

另组新党的建议。鉴于莫斯特一贯坚持其错误立场和观点，一八八〇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维登秘密代表大会开除了他的党籍。一八八二年，他侨居美国，继续出版《自由》周刊，宣扬无政府主义。后来，他脱离了政治活动。

哈赛尔曼

威廉·哈赛尔曼(1844—?)，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领导人之一，无政府主义者。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五年，主编拉萨尔派的报纸《新社会民主党人》。他在报上撰文攻击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在德国的拥护者，大肆吹捧拉萨尔，极力讨好俾斯麦政府。一八七五年，他是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合并的倡导者和《哥达纲领》的炮制者之一。但两派合并后，他又拒绝在党的新机关报《前进报》编辑部工作，自行出版《红旗报》，恶毒攻击党的政策。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他和莫斯特共同领导无政府主义小集团，反对革命领袖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企图以个人恐怖代替有组织的阶级斗争。一八八〇年，在维登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秘密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此后，他侨居美国，脱离了工人运动。

杜林

欧根·杜林(1833—1921)，德国折衷主义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生于官僚家庭，早年曾任普鲁士见习法官。一八六三至一八七七年，任柏林大学讲师。任教期间，常为普鲁士国家官方报《国家通报》撰稿，充当俾斯麦政府的御用文人。杜林从一八六七年起，开始攻

击马克思主义。一八七五年，他一方面纠集伯恩施坦、莫斯特等人进行宗派活动，妄图分裂刚刚统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另一方面，以社会主义“改革家”的面貌出现，扬言要在科学中实行一次完全的“变革”。

杜林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经济学的反动观点来诋毁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并且编造了一个以“普遍的公平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用来对抗和篡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八七六至一八七八年，恩格斯写了《反杜林论》一书，对杜林的反动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清算。

杜林晚年猖狂反对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积极为德国资产阶级的侵略扩张政策效劳。

杜林著有《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年)、《国民经济学和经济学讲义》(1873年)和《哲学教程》(1875年)等著作。

俾斯麦

奥托·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和德国的反动政客，顽固的保皇党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生于容克地主家庭。一八四七年担任联邦议会的议员，后来，因主张通过王朝战争，将德意志各邦统一在普鲁士王权之下，而受到普鲁士国王的赏识。一八六二至一八七一年，任普鲁士王国首相。在此期间，他先后发动了对丹麦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并采取“铁血政策”，自上而下地统一了德国。一八七一至一八九〇年，俾斯麦任德意志帝国首相。他对内制定和颁布了旨在镇压工人运动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对外

力图确定德国在欧洲的霸权，武装干涉巴黎公社。一八九〇年，他因与继位不久的德皇威廉二世不和，被迫去职，退居费里德里士鲁。

威廉·李卜克内西

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的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早年参加过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认识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影响下，成为社会主义者。一八六二年，李卜克内西回国。次年加入全德工人联合会。第一国际成立后，他主持第一国际德国分部的工作。一八六五年在来比锡加入倍倍尔组织的萨克森工人协会。一八六九年参加创建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工作，成为该党的领导人之一。在此前后，他曾以国会议员的合法身份，在议会讲坛上揭露俾斯麦反动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问题上，他采取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

一八七五年，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时，李卜克内西放弃革命原则，和拉萨尔派头目哈赛尔曼共同炮制了机会主义的哥达纲领草案，因此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严厉批评。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他坚持斗争，为创建第二国际，反对军国主义，做了大量的工作。一八九〇至一九〇〇年，他任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的总编辑。列宁给威廉·李卜克内西以很高的评价，说他虽然犯了一些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他的名字始终是和德国工人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的历史功绩是为“真正的社会民主工党奠定牢固的基础”(《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3页)。

倍倍尔

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的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生于士官家庭，本人当过旋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参加工人运动，先后领导萨克森工人协会、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一八六五年加入第一国际。一八六七年以工人代表的资格当选为德意志联邦议会议员。一八六九年与威廉·李卜克内西等人一起创建德国社会民主党。普法战争期间，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并积极支持巴黎公社的革命斗争。一八七二年，他被捕入狱。

一八七五年四月，倍倍尔出狱，五月参加了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合并大会。他错误地容忍了对拉萨尔派所作的原则性的让步。一八七八年，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他曾一度站在解散党的立场上，后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很快纠正了错误，依靠广大党员，反对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把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结合起来，从而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倍倍尔参加了创建第二国际的工作，在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斗争中，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但是，他在战争和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犯有机会主义的错误。列宁一方面批判了他的错误，另一方面又指出他是“最受工人群众爱戴的党的领袖”（《列宁选集》第19卷，第295页）。

左尔格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28—1906），第一

国际和美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生于德国。青年时期当过音乐教师，参加过德国一八四九年巴登起义。一八五一年迁居美国后，与马克思、恩格斯保持着经常的通讯联系。一八六九年，组织并领导第一国际北美支部，成为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的联合委员会书记。一八七二年第一国际总部迁往纽约，左尔格任总委员会总书记。他支持马克思、恩格斯对巴枯宁分子进行的斗争。一八七六年，左尔格遵照马克思、恩格斯解散第一国际的主张，起草了第一国际解散宣言。以后，左尔格积极参加美国劳工人民党的建党工作，是该党的创始人之一。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他同党内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晚年，他整理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集。

白拉克

威廉·白拉克(1842—1880)，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青年时期接近马克思、恩格斯，曾在不伦瑞克出版过不少的社会主义书籍。一八七一年因反对普法战争被捕入狱。一八七三年写《拉萨尔的建议》一书，批判拉萨尔的所谓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的机会主义主张。一八七五年支持马克思、恩格斯对《哥达纲领草案》的批判。一八七七至一八七九年，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国会党团的成员。白拉克虽进行了反对拉萨尔派、反对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但不够彻底。

燕妮·马克思

燕妮·马克思(1814—1881)，马克思的夫人和战友。生

于德国贵族家庭。一八三六年与正在波恩大学读书的马克思订婚。一八四三年结婚。她背叛了贵族家庭，无比忠实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她不仅跟马克思共患难、同辛劳，而且以满腔的热情投身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她的一生表现了极其明确的批判智能、卓越的政治才干、充沛的精力和伟大的忘我精神。当她的生命被贫困和疾病夺去后，恩格斯在她墓前发表了演说，称她是一位“品德崇高的女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2页）。

埃卡留斯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1818—1889)，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曾当过裁缝。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侨居英国伦敦，从事工人运动，参加过共产主义者同盟。一八五〇年，“同盟”发生分裂，埃卡留斯站在以马克思、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一边，同以维利希——沙佩尔为首的少数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六十年代，他参加了建立第一国际的工作。一八六七至一八七一年期间，任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书记。海牙大会后，他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英国工联主义运动。

库格曼

路德维希·库格曼(1830—1902)，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第一国际会员。原是德国外科医生。他读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深为马克思的智慧和才干所感动。一八六二

年，他与马克思开始通信，经常向侨居在国外的马克思报告德国的一些情况，并协助了《资本论》的出版和发行工作。他还参加了第一国际洛桑代表大会和海牙代表大会。

库格曼敬仰马克思，把马克思与他的通信看作是“一生中最大的骄傲”。但是他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没有使自己的观点同马克思的学说一致起来。他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主张用纯粹的改良主义方法实现他的“社会主义”理想。因此，他始终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八四七年，马克思同他断绝了关系。

龙格

沙尔·龙格(1839—1903)，法国的机会主义者。当过记者。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编过许多民主性的报纸。一八六五年，侨居比利时。从一八六六年起任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比利时通讯书记。他出席了第一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和一八七一年的伦敦代表会议，参加了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革命。巴黎公社建立后，当选为公社委员，主持劳动和交换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过公社机关刊物《法兰西共和国官报》的编辑。

龙格在政治上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曾作为蒲鲁东主义者少数派代表之一，在无产阶级解放道路、民族解放运动和废除私有制问题上散布了一些错误观点，受到了马克思的严厉批判。后来，他附和改良主义的可能派，多次被聘为巴黎市政府的顾问。

沙尔·龙格的儿子让·龙格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是法国的考

茨基派。一九二〇年反对法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并另组织法国社会党，从事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的活动。

拉法格

保尔·拉法格(1842—1911)，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生于葡萄商家庭。曾就学于巴黎医学院。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参加了第一国际，任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西班牙通讯书记。

拉法格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期间，揭露了资产阶级“国防”政府的叛卖行为，领导了波尔多无产阶级保卫公社的斗争。公社失败后，他侨居西班牙，与西班牙的巴枯宁分子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一八七二年九月，他作为西班牙的代表参加了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助会》这一声讨巴枯宁的战斗檄文就是在拉法格的协助下写成的。以后，拉法格参加创立了法国第一个工人政党，并同党内以布鲁斯、马龙为首的可能派和以米勒兰、饶勒斯为首的入阁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国际舞台上，他对伯恩斯坦之流鼓吹的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进行过猛烈的抨击。拉法格写了许多文章和著作，宣传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批判了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

拉法格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是一位冲锋陷阵的战士。但是，他在理论问题上则表现了不彻底性，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农民问题上犯有错误。一九一一年他在法国逝世。在他的妻子劳拉(马克思女儿)的葬礼上，列宁代表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发表了演说，称拉法格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列宁全集》第17卷，第286页）。

赛拉叶

奥古斯特·赛拉叶(1840—1873)，国际工人运动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活动家。生于法国。早年在伦敦受过初等教育，以后当过制鞋植工人。二十四岁加入第一国际，一八七〇年初担任总委员会比利时书记，九月被选为总委员会委员。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后，他受总委员会的委托，来到巴黎，被选为公社委员，并具体负责公社的劳动和交换委员会的工作。在整个巴黎公社革命期间，他同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和马克思保持着联系，经常报道巴黎的情况。巴黎公社失败后，他回到了伦敦，继续参加第一国际的工作。一八七一年九月，由于马克思的坚持，他被选为法国通讯书记。他还积极参加了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同巴枯宁分子进行了斗争。

东布罗夫斯基

雅罗斯拉夫·东布罗夫斯基(1836—1871)，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者，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杰出将领，生于波兰小贵族家庭。早年参加了波兰的革命运动。一八六三年因参加反对沙皇的起义而被捕。一八六四年逃出监狱后，与妻子来到巴黎定居。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革命爆发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无产阶级的这一伟大斗争。他曾建议国民自卫军直捣凡尔赛反革命巢穴，但这一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四月二日，凡尔赛反动势力开始向革命的巴黎反扑，他被任命为

第十二军团长官。在领导国民自卫军战士为保卫公社进行的斗争中，他显示了非凡的指挥才能。到五月，他实际上成为公社武装力量的总司令。五月二十三日，他在蒙马特尔的街垒附近指挥战斗时，不幸中弹牺牲。国民自卫军战士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贝尔——拉雪兹墓地的墓穴里。

马克思称东布罗夫斯基和符卢勃列夫斯基是“波兰的英雄儿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2页）。列宁写道：

“东布罗夫斯基和符卢勃列夫斯基的英名，同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同巴黎工人最后一次失败的——我们相信是最后一次失败的——起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列宁全集》第6卷，第417页）

符卢勃列夫斯基

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1836—1908），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者，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杰出将领。生于波兰的小贵族家庭。早年在彼得堡林业学院受高等教育时，接受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曾参加和领导了一八六七年的波兰起义。后来在巴黎参加了波兰侨民民主左翼活动，被选入波兰侨民民主同盟第一届代表委员会。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革命爆发后，任国民自卫军第二军司令员、骑兵队司令员等要职。他率领公社战士同梯也尔反动军队进行过多次殊死的战斗。公社失败后，他逃往英国伦敦。法国的反动法院缺席判处他死刑。在伦敦，他同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们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并参加了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一八七二年，他参加了第一国际海牙会议，同巴枯宁主义者进行了斗争。

符卢勃列夫斯基一生忠实地为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而斗

争。特别是他在保卫巴黎公社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是可敬可佩的。马克思和列宁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见前条)。

德米特利耶娃

伊丽莎白·德米特利耶娃(1851—1898)，原名卢基尼奇娜，俄国女革命家，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活动家。青年时代曾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影响。一八六八年在瑞士日内瓦定居后，加入了由俄国侨民建立的第一国际俄国支部，不久见到了马克思。在马克思的指导下，她与俄国支部的成员对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的无政府主义活动进行了斗争。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后，她来到了巴黎，参加了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的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在梯也尔反动军队进攻巴黎的时候，她组织和领导巴黎妇女成立了前线卫生队，到阵地上救护伤员。她还直接参加了街垒的战斗，并在战斗中负伤。巴黎公社失败后，她又回到了俄国，不久脱离了政治活动。

米歇尔

克列门斯·路易丝·米歇尔(1830—1905)，法国的女革命家，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活动家。早年在巴黎当过教师，同布朗基有过密切的联系，参加过反对第二帝国及其后继者“国防政府”的革命斗争。她参加了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革命。巴黎公社成立后，参加了国民自卫军，为了保卫公社，曾同最后守卫蒙马特尔公墓的公社社员并肩战斗。公社失败后，被捕入狱。在法庭上，她勇敢地宣称自己因参

加创立公社感到骄傲，她说公社致力于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则是她朝夕思慕的志向。后来被放逐到大西洋中的新卡列多尼亚岛服苦役。一八八〇年大赦后，她又参加了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工人运动。一八八三年因参加了失业工人的示威，又被法国法院判处六年徒刑，于一八八六年再次获得释放。一八九〇年她迁居英国，在那里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亲近助手。米歇尔著有《回忆录》（1866年）等一些政治与社会性的小册子。

弗兰克尔

列奥·弗兰克尔（1844—1896），国际工人运动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活动家。生于匈牙利一个医生家庭，当过首饰匠。一八七〇年在法国组织第一国际法国支部。同年因被控告组织秘密集团受审。在法庭上，他义正辞严地驳斥了反动当局对第一国际的诽谤和责难，为此，被判处徒刑。出狱后，他积极参加了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革命，任巴黎公社委员，负责劳动和交换委员会的工作。公社失败后，开始流亡生活。先在奥匈帝国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后来到英国。曾以匈牙利、奥地利通讯书记的身份当选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在英国期间，他与马克思一直保持着联系。一八八〇年回国参加创建匈牙利工人党。一八八九年迁居巴黎，与恩格斯一起，为建立第二国际进行了斗争。

费烈

泰奥菲尔·沙尔·费烈（1845—1871），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活动家，布朗基主义者，法国人。当过新闻记者，早年

参加工人运动，曾多次被捕受审。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革命后，被选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一八七一年三月，是巴黎公社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三月二十六日当选为公社委员，负责领导公社的公安委员会和巴黎警察局。在此期间，他维护公社的革命专政，无情地揭露和打击了凡尔赛间谍和各种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并主张进攻凡尔赛。在五月“流血周”里，他领导公社社员为保卫公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后被捕入狱。在法庭上，他把审判变成了对反动资产阶级的审判。同年十一月被敌人杀害。

瓦尔兰

路易·欧仁·瓦尔兰（1839—1871），国际工人运动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活动家。生于法国贫农家庭。当过装订工人，曾参加过装订工人的大罢工活动。一八六五年加入第一国际，是巴黎支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多次出席第一国际召开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虽然他曾受到过蒲鲁东思想的影响，但很快从蒲鲁东派分裂出来，拥护积极的政治斗争和武装夺取政权，大力支持法国各地的工人罢工，并为建立统一的工会组织做了不少的工作。由于反动政府的迫害，瓦尔兰曾两次被捕入狱，一次缺席审判，后被迫流亡国外。第二帝国垮台后，他从流亡地归来，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全力投入反对卖国的“国防政府”的斗争。瓦尔兰是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巴黎公社选举时，他被选进公社委员会，先后担任财政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军事代表等职务。公社失败后，瓦尔兰惨遭敌人杀害。

瓦扬

爱德华·瓦扬(1840—1915)，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活动家，布朗基主义者，生于法国。当过工程师和医生，曾参加第一国际一八六七年洛桑代表大会。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革命后，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一八七一年三月，巴黎公社起义后，任公社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教育委员会委员。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伦敦，参加第一国际的活动，被选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海牙大会后，他和其它布朗基主义者一起退出第一国际。一八八六年回国，建立布朗基主义者组织——中央委员会。一九〇一年，他又组织了法国社会主义党。一九〇五年该党与法国社会民主党合并，他是合并后的社会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在领导社会党期间，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向机会主义者让步，做了“饶勒斯派的俘虏”(《列宁全集》第21卷，第215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瓦扬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鲍狄埃

欧仁·鲍狄埃(1816—1887)，无产阶级诗人，《国际歌》歌词作者，生于巴黎工人家庭。十三岁开始做工，十四岁参加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写过不少战斗诗歌，号召法国工人向资产阶级作斗争。一八四八年积极参加法国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后来加入第一国际。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成立时，当选为公社委员，曾为保卫公社英勇作战。一八七一年六月，巴黎公社失败后几天，他怀着对资产阶级的血海深仇写下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歌——《国际歌》歌词。以后一直坚

持革命斗争。列宁称他是“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列宁全集》第36卷，第210—211页）。

狄盖特

比尔·狄盖特(1848—1932)，工人作曲家，《国际歌》谱曲者。生于侨居比利时的一个法国工人家庭，七岁随父母回法国做工，青年时期积极参加工人运动，积极支持巴黎公社的革命斗争。一八八八年六月为鲍狄埃的诗篇《国际歌》谱了曲，七月领导工人合唱团首次演出。从此，《国际歌》就迅速成为响彻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战歌。他的作品还有《巴黎公社社员之歌》、《武装起义者》等革命歌曲。

梯也尔

阿道夫·梯也尔(1797—1877)，法国资产阶级反动政客和卖国贼，镇压巴黎公社的罪魁祸首。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作为自由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活动家出现于政治舞台。在路易-菲力浦当朝期间，梯也尔历任财政副大臣、内务大臣、政府首相兼外交大臣。第二帝国垮台后，他先后担任第三共和国内阁总理和共和国总统。一八七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梯也尔与德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和约。为了保证这一和约得以顺利的实施，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向革命民主力量发动猖狂的进攻。三月十八日革命后，他逃往凡尔赛，在德国俾斯麦政府的支持下，发动内战，进攻革命的巴黎，成为屠杀公社社员的血腥刽子手。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梯也尔进行了无情的抨击，说他“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

节的老手……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42页)。

卡尔·李卜克内西

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受其父亲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影响,早年就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期间,他号召德国工人“站在俄国革命的旗帜下行动起来”。一九〇七年,他倡议召开了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第一次国际会议,并作为会议的主席,在会上作了反对军国主义斗争的报告。一九一二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二日在国会进行第二次战争拨款表决时,独自投反对票,并在国会讲台上号召工人和士兵掉转枪口,对准本国反动政府,树立了“以真正的革命精神利用反动议会的榜样”(《列宁全集》第31卷,第46页)。

一九一六年初,他同卢森堡等人一起建立德国党的左派革命组织“斯巴达克”小组。同年领导群众举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示威,被军事法庭判处苦役徒刑。一八一八年十月出狱后,参加并领导了德国十一月革命和德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次年一月和卢森堡一起被反动政府杀害。列宁说,李卜克内西的“名字象征着一个领袖对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革命无限忠诚,象征着真诚地不惜一切牺牲地去同资本主义作无情的斗争,象征着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同帝国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列宁全集》第28卷,第410页)

卢森堡

罗莎·卢森堡（1871—1919），女，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生于波兰犹太商家庭。一八九三年参加创立波兰社会民主党。一八九七年移居德国，积极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活动，同伯恩斯坦主义、米勒兰主义和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影响下，她回到波兰，亲自参加和领导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一九〇七年，她以德国党代表的身份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她支持列宁，反对孟什维克。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卢森堡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团结各国左派，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沙文主义，曾三次被捕入狱，但她始终坚持革命斗争，她参与创建了党的左派组织“斯巴达克”小组，著书歌颂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参加并指导了德国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同李卜克内西等人一起创建了德国共产党。一九一九年一月柏林工人起义失败后，她同卡尔·李卜克内西一起惨遭反动政府杀害。

卢森堡在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和其它一些重大的理论和政策上犯有错误。列宁在指出她的错误的同时，高度评价了她的一生，称她是“世界无产阶级国际的优秀人物”、“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永垂不朽的领袖”（《列宁全集》第28卷，第412页）。

蔡特金

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女，德国社会民主党

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著名领导人。生于一个乡村教师家庭。青年时期参加工人运动，一八八一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曾参加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的出版发行工作，以及第二国际的创建活动。在流亡法国期间，同马克思的女儿劳拉一起创办了《社会主义者》报。

蔡特金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一八九二至一九一七年，她一直是党的妇女刊物《平等》杂志的主编。一九〇七年，她被选为国际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书记。根据她的提议，一九一〇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三月八日定为国际劳动妇女节。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蔡特金同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沙文主义，曾被捕入狱。她是德国左派组织“斯巴达克小组”的创始人之一。一九一九年起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一九二一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兼妇女局书记。一九三三年病逝于莫斯科。

梅林

弗兰茨·梅林（1846—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和理论家，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早年做过新闻工作。一八九一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后，成为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的编辑和党的左翼机关报《来比锡人民报》主编。他和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

西和蔡特金一起领导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出笼后，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反击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爆发后，他热烈拥护这一革命，并主张在德国也采取“俄国的办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著文谴责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叛卖行为。梅林是“斯巴达克小组”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十月革命后，他著文歌颂了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

梅林不仅是个革命家，而且是个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他曾为编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和整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遗著，做了很多工作。其主要著作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897—1898)、《马克思传》(1919)等等。他在理论上的主要错误是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之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对拉萨尔机会主义本质也认识不足。但是，他的名字始终是和国际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

辛格尔

保尔·辛格尔(1844—1911)，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生于商人家庭，做过厂主。早年作为一个热情的民主主义者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受工人运动的影响，转向了社会主义。普法战争期间，他坚决反对俾斯麦政府对法国领土亚尔萨斯和洛林的侵吞。一八七八年，他加入了处于“地下”状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八八七年被选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一八九〇年为执行委员会主席。一八八四年起为国会议员，一八八五年起为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主席。并担任过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大会的主席。

他曾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以及后来出现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策略原则。列宁说，辛格尔“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财富、全部杰出的组织才能、全部从事实际工作和领导工作的才干都献给了党”（《列宁全集》第17卷，第75页）。

伯恩施坦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翼首领之一，修正主义的始祖。生于一个火车司机家庭，当过银行职员。一八七二年混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早期活动中，就表现了机会主义倾向。一八七五年，德国两派合并时，他鼓吹向拉萨尔派妥协，随后又成为杜林主义的信徒。俾斯麦施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初期，他逃往瑞士，与机会主义者赫希伯尔格、施拉姆组成反党的“苏黎士三人团”，共同署名发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等文章，提出取消革命、取消党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严厉批判。一八八〇年开始，他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一八八八年他随报迁往伦敦，深受工联主义和费边主义的影响。一八九〇年他与党内右派福尔马尔相互配合，鼓吹向资产阶级妥协，反对暴力革命。恩格斯逝世不久，他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上，连续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等一系列黑文，全面地、系统地攻击和“修正”马克思主义。

伯恩施坦在哲学上以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进化论代替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认为“卡特尔”和“托拉斯”能够消除经济危机，否认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在政治学

方面，主张阶级合作，提出“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修正主义公式，鼓吹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和各国党内的左派领袖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

一九〇二年，伯恩施坦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充当帝国主义的帮凶。十月革命后，他疯狂反对列宁主义和苏维埃政权，一九一八年，他参加了谢德曼反动政府，任国家财政部助理职务。

考茨基

卡尔·考茨基（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之一，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生于布拉格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早年随父母迁居维也纳，一八七四年加入社会民主党。一八八一年与马克思、恩格斯相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写过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杂志《新时代》的编辑。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考茨基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最著名的思想家和理论“权威”。但是，这个曾博得“正统”马克思主义声誉的考茨基，从来也没有真正理解革命的、战斗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说他是一个“平庸而目光短浅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71页），恩格斯说他是“一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同上，第211页）。即使在他还没有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时，就已经多次在原则问题上（如对待拉萨尔主义问题上、在对待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在对待无产阶级民主的态度问题上

等等),坚持错误立场,表现动摇和变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他一贯采取暧昧、迁就和调和的态度;在对待米勒兰入阁的问题上,他玩弄折衷主义,替叛卖行为打掩护。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考茨基鼓吹“超帝国主义论”,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垄断组织能消除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和战争根源,否认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大战期间,他采取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为右派辩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效劳,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可耻叛徒。十月革命后,他疯狂反对苏维埃政权,煽动武装干涉苏联,并于一九一八年发表了臭名远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恶毒攻击列宁,诬蔑布尔什维主义,诽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民主”,鼓吹所谓“纯粹民主”,并胡说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可以通过“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一系列著作中彻底批判了考茨基的一系列反动谬论。

一九一九年以后,考茨基公开投敌,任谢德曼反动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社会化委员会主席等职,并参与第二国际的反革命活动。一九三八年春死于荷兰。

福尔马尔

格奥尔格·亨利希·福尔马尔(1850—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之一。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一八七五年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担任过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社会民

主党人报》编辑，当选过德国国会和巴伐利亚议会的议员。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他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提出把改良活动作为党的主要活动的口号，妄图用争取议会多数的办法，夺取政权，实现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并公开为米勒兰的叛卖行为唱赞歌。一八九四年，福尔马尔以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的名义，出席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法兰克福召开的代表大会，向大会提出了右倾的土地纲领、社会民主党的阶级成分问题等决议案。在一九〇七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福尔马尔公开为军国主义辩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从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出发，鼓吹“保卫祖国”。大战结束后，他脱离了政治活动。

谢德曼

菲利浦·谢德曼（1865—1939），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之一。生于一个家具商家庭，曾当过印刷工人、新闻记者、报纸编辑。一九〇三年，作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当选为国会议员。一九一一年起，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国会党主席团委员、国会副议长。一九一三年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谢德曼堕落为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用“保卫祖国”的口号欺骗无产阶级，投票赞成政府的军事预算，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并受德国政府的指使，劝说瑞士、瑞典和丹麦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赞助德国帝国主义战争。十月革命后，他支持德国帝国主义侵略苏维埃俄国。一九一八年德国发生革命危机时，他参加了德皇内阁政府，任内务大臣。德国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后，他担任反

动的资产阶级政府的财政部长。一九一九年二月至六月，任临时政府内阁总理。他是杀害德国共产党的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主谋。一九三三年开始侨居国外，后死于丹麦。

休特古姆

阿尔伯特·休特古姆（1871—1944），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之一，极端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一九〇〇至一九一八年是德国国会议员。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任德国财政部长。后因不得民心，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休特古姆曾在殖民地等问题上，宣扬帝国主义观点，疯狂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打着“保卫祖国”的旗号，狂热地支持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成了傲慢的、无耻的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典型”（《列宁全集》第21卷，第98页）。他的名字成为说明社会沙文主义的通用语。

列金

卡尔·列金（1861—1920），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德国工会的机会主义首领之一。当过工人。从一八九〇年开始，担任德国工会总委员会主席，以后曾任国际工会书记处书记。一八九二至一九二〇年为国会议员。列金积极投靠帝国主义。一九一三年，他以国际工会领导者的身份访问美国后，大肆吹捧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物质文明和资产阶级民主，极力驱使工人为资产阶级卖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在“保卫祖国”的虚伪口号下，宣扬劳资合作，禁止工人罢工，阻挠革命运动，并煽动中立

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他还疯狂地反对和诬蔑十月革命。列宁指出，列金是“工人出身的替君主制和反革命资产阶级效劳的最可恶的刽子手”（《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7页）。

大卫

爱德华·大卫（1863—1930），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之一。受过高等教育，曾任大学教师。一八九三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八九七年参加《社会主义月刊》的创刊工作。一九〇三年起，任德国国会议员。同年，在其所著的《社会主义和农业》一书中，大肆宣扬小农经济的“优越性”和“稳固性”。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曾受到列宁、斯大林的严厉批判。

大卫在一九〇七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公开维护帝国主义利益。德意志帝国崩溃前夕，他出任政府外交大臣。魏玛共和国时期，历任国民议会议长、内务部长、不管部长，是德帝国主义的复仇主义政策和反苏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列宁说，“大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是“毕生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工人运动的分子”（《列宁全集》第21卷，第248页）。

希法亭

鲁道夫·希法亭（1877—1941），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之一。生于维也纳，一九〇六年旅居德国，后加入德国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党校和该党理论刊物

《新时代》编辑部工作，并编辑《前进报》。一九一〇年，他发表《财政资本》一书，鼓吹垄断资本主义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一九一七年他又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考茨基的战友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主要代表人之一”（《列宁全集》第22卷，第185页）。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他任政府“社会主义文化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七年出任资产阶级联合内阁财政部长。

英克平

阿尔伯特·英克平（1884—1944），英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一九〇四年参加社会民主联盟，一九一三年被选为英国社会党总书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英国社会党内国际主义派，同以海德门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曾担任过党的机关报《号召》的编辑。十月革命后，在“不干涉俄国”的口号下，坚决反对武装干涉苏维埃。一九二〇年参与英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任该党总书记。一九二二年被捕入狱。一九二五年与其他十一名党的领袖一起被英国政府迫害判刑。一九三〇年起任“苏联之友运动”的国际书记。

海德门

亨利·迈尔斯·海德门（1842—1921），英国社会党右翼首领之一。生于一个律师家庭。大学毕业后在伦敦、纽约和巴黎的交易所活动。一八八一年创立民主联盟，一八八四

年，民主联盟改称社会民主联盟，他任该联盟的机关刊物《正义》周刊的编辑。在此期间，他站在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否认罢工斗争和工会组织的作用，实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路线。一九〇〇至一九一〇年，他是第二国际执行局成员。一九一一年，海德门把社会民主联盟改组为英国社会党。不久，他要求扩大英帝国主义海军，遭到广大党员反对，被迫退出该党中央委员会。一九一六年，他被开除出党。此后，他与其他党羽组建国家社会党，自称该党领袖。海德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一个极端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十月革命之后，他竭力支持帝国主义各国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成为帝国主义者的可耻帮凶。

麦克唐纳

詹姆斯·拉姆赛·麦克唐纳(1866—1937)，英国独立工党和第二国际右翼首领之一。生于农业工人家庭，当过店堂伙计。一八八六年参加费边社，一八九四年加入独立工党，一九〇〇年当选为劳工代表委员会总书记。劳工代表委员会改名为工党后，他是该党的首领。麦克唐纳在工党和第二国际内，极力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大肆鼓吹“阶级合作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先是站在和平主义立场上，反对战争，后来又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支持战争。十月革命后，他和工党其他右翼首领，竭力破坏英国工人运动，支持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充当帝国主义的帮凶。一九二四年以后，他任第一、二届工党政府首相，在执政期间，对内实行反劳工政策，反对英国共产党，对外残酷镇压英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敌视共产国际。

盖得

茹尔·盖得（1845—1922），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后来成为法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之一。出生于教员家庭。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开始从事政治活动，一八七一年，因支持巴黎公社，遭到政府迫害，被迫流亡国外。在国外，他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一八七六年回国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基本上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一八七七年，他创办了《平等报》。法国工人党建立后，他同拉法格一起制定了党纲，一起开展了反对党内机会主义可能派的斗争。这期间，盖得为在法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运动做了许多工作，为在国际舞台上对无政府工团主义、伯恩斯坦主义、米勒兰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但是，他从来不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制定党纲和反对右翼社会党人等问题上犯有理论上和策略上的错误。

在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条件下，盖得滚进了机会主义的泥坑。他过高地估计了议会斗争的作用和意义，把工人的罢工运动诬蔑为“无政府主义”；他不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放弃领导法国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在“保卫祖国”的口号下，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米勒兰

亚历山大·米勒兰（1859—1943），法国社会党右翼首领之一。原属资产阶级激进分子。一八八五年起为国会议员，九十年代加入法国社会党。一八九九年，他借口挽救共

和国和维护社会主义利益，第一次以社会主义者的名义加入资产阶级内阁。入阁后，他完全背弃了社会主义，帮助资产阶级政府破坏工人运动。列宁把他的这种叛卖行为斥之为“实践的伯恩斯坦主义”。由于盖得等人的坚决斗争，一九〇四年米勒兰被法国社会民主党开除。不久，他和布里安·维维安尼等叛徒合伙建立独立社会党。后历任法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公共工程部长、国防部长、总理和总统。米勒兰在执政期间，推行反共反民主政策，镇压工人运动，支持波兰地主对苏维埃俄国的军事进攻，维护法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反动统治。

饶勒斯

让·饶勒斯(1859—1914)，法国社会党右翼首领之一。生于商人家庭。曾任大学哲学教授。一八八五年起为议会议员。九十年代混进工人运动，自称“独立的社会主义者”，米勒兰事件发生后，饶勒斯竭力为米勒兰的叛卖行为辩护，成为入阁派的头子。一九〇二年，饶勒斯网罗亲信，建立法国社会主义党。后来该党与盖得领导的社会党合并，他任社会党的领袖和党中央机关报《人道报》的主编。在党内，他利用职权，极力推行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机会主义路线，妄图把党变成单纯的选举机关。饶勒斯曾站在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上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战争，一九一四年七月被沙文主义者暗杀。

龚帕斯

赛米尔·龚帕斯(1850—1924)，美国工会运动的反动

首领之一。生于英国，一八六三年移居美国。当过工人。曾同马克思、恩格斯有过长时期的联系，参加了第一国际，是国际雪茄工人工会第一四四号分会的负责人。一八八六年，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后，他任主席，一直到死。龚帕斯代表工人贵族的利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极力推行阶级合作的方针，阻挠工人政党的建立，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实施反劳工法令，破坏工人的罢工斗争。大战期间，他先是“非战主义者”，美国参战后，则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拥护者。战后，他疯狂攻击十月革命，支持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一九一九年参加巴黎和平议会，任国际劳工立法委员会主席。一九二二年任华盛顿会议美国代表团团员。

屠拉梯

菲力浦·屠拉梯(1857—1932)，意大利社会党创始人和右翼首领之一。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从事政治活动，一八九二年参加创建意大利社会党。一八九六年为国会议员。一九〇一年被邀参加资产阶级内阁。列宁称他为“意大利的米歇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屠拉梯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上，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仇视十月革命。共产国际建立后，他竭力阻挠社会党同共产国际接近。一九二一年，社会党分裂为意大利共产党和意大利统一社会党，他是改良主义的统一社会党领袖。同年，当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向人民发起疯狂进攻，意大利政权面临危险时，他公然要工人“善良”、“贤明”、“懦弱”，放弃斗争。屠拉梯一生推行改良主义路线，他的“整个理论立场和全部宣传鼓动工作都是同资产阶级合作的”(《列宁全集》第32卷，第453页)。

万·科尔

万·科尔(1851—1925)，荷兰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之一。一九〇四年和一九〇七年，先后代表荷兰社会民主党出席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曾任第二国际执行局委员。他是“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炮制者，公然宣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具有传播文明的作用；竭力支持本国殖民主义者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奴役和压迫。他的叛卖行径受到列宁的严厉批判。十月革命后，他仇视苏维埃政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阿德勒

维克多·阿德勒(1852—191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之一。生于布拉格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当过医生。早年作为激进的资产阶级分子投身政治活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恩格斯和倍倍尔的影响下，加入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先后创办了《平等》周刊和《工人报》。阿德勒口头上赞同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则使党的活动服从于资产阶级的利益。他破坏奥匈帝国工人的团结，支持奥地利反动政府的大国主义政策，鼓吹反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文化自治论”。一九〇五年，阿德勒被选入议会下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站在“中派”的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是暗藏的社会帝国主义分子。一九一八年，他参加奥地利资产阶级政府，担任过短时期的外交部长。

阿德勒死后，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阿德勒(1879—1960)继承他的衣钵，从事机会主义活动。

奥托·鲍威尔

奥托·鲍威尔(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翼首领之一。早年当过记者。一九〇四年起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秘书。一九〇九年，他提出了“民族文化自治”这一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纲领，受到了列宁、斯大林的严厉批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入伍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曾被俄国俘虏。奥地利共和国成立后，他在联合政府里先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部长，社会化委员会主席职务。鲍威尔极端仇视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俄国，极力阻挠各国工人转向共产国际，并积极参与了建立第二半国际的活动。他多次参与镇压奥地利工人的起义，积极为希特勒德国吞并奥地利制造舆论，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凶恶敌人。

布兰亭

卡尔·亚尔马·布兰亭(1860—1925)，瑞典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右翼首领之一。生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早年曾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一八八九年参加创建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时期担任该党的主席和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的主编，以及国会议员。他在党内一贯推行改良主义、议会主义的方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社会沙文主义者。他敌视十月革命，积极支持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并且多次试图恢复业已破产的第二国际。国际联盟成立后，他曾作为瑞典的代表出席国联大会。一九二二年，他当选为国联理事会的理事。他在一生的最后五年，先后三次组织和领导社会民主党内阁。

格里姆

罗伯特·格里姆(1881—1958)，瑞士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之一。早年当过印刷工人，任过劳工组织的书记。一九〇九至一九一八年，任瑞士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伯尔尼哨兵报》的总编辑。一九一一年当选为国民议会的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瑞士社会民主党“中派”的首领。他极力宣扬和平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第二国际破产后，曾任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和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主席。一九一七年，他和其他沙文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一九二一年积极参与组织第二半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支持美帝国主义奴役世界人民的“马歇尔计划”。

王德威尔得

艾米尔·王德威尔得(1866—1938)，比利时工人党和第二国际的右翼首领之一。一八八五年加入比利时工人党。一九〇〇年，被选为第二国际执行局主席。一九一四年参加比利时政府，先后任国务大臣、司法部长、外交部长、不管部长、公共卫生部长等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十月革命后，他积极支持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一九一九年，他参与了伯尔尼国际的创建工作。一九三〇年，他窜到中国，在北京大学等处发表演说，诬蔑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胡说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国际联盟是保障世界和平的机关。以后他一直反对建立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王德威尔得著有許多书。他的思想是以“市侩折衷主义

反对马克思主义，诡辩术反对辩证法，庸俗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列宁全集》第28卷，第306页）。他所提出的“劳动人民国家”的概念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所标榜的“自由人民国家”的旧调重弹。他和考茨基一样，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他们两人都反映了第二国际的完全破产”。（同上，第300页）

胡斯曼

卡米尔·胡斯曼(1871—1968)，比利时社会党右翼首领之一。早年学习日耳曼语言学，曾先后在伊珀尔自由学院和布鲁塞尔大学任教。在此期间，他常在《人民报》和其他社会主义报刊上发表文章。一九一〇年被选为比利时下院议员。一九〇四至一九一九年担任第二国际常设执行机关——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书记，是考茨基的追随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十月革命后，他支持帝国主义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加入伯尔尼国际。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历任比利时资产阶级政府的科学与艺术部长、下院议长和首相职务。

赫尔岑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早年因从事革命活动两次被流放。一八四七年后一直侨居国外。一八五七年在伦敦创办了《钟声》杂志，动员俄国民众同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支持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一八六九年他迁居巴黎，与曾经同他保持过联系的巴枯宁决

裂，逐渐转向了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

赫尔岑在哲学上批判唯心主义，反对形而上学，主张把唯物主义与发展观念结合起来。但他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憎恨农奴制度，把农民连同土地的解放，把村社土地所有制和农民的“地权”思想看作社会主义，这完全是农民空想社会主义。赫尔岑著有《自然研究通讯》、《法国和意大利的来信》、《致老友书》等著作。

别林斯基

维萨里昂·格里哥里也维奇·别林斯基(1811—184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出生于一个军医家庭。读大学时因创作反对农奴制度的剧本被学校当局开除。以后曾在《莫斯科观察家》、《祖国记事》和《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工作，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文艺批评活动，反对沙皇制度。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别林斯基由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他断言，外界的物质环境决定人的意识，并认为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是确定不移的生活规律。但其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虽然承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起着决定作用，并希望用暴力革命摧毁农奴制度，但是他不了解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不懂得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因此，不能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加以科学的论证。他的社会主义带有空想的性质。主要著作有《论普希金的作品》(1843—1840)、《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1848)、《1847年7月3日给果戈里的信》等等。

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生于神甫家庭。早年，受赫尔岑和特森斯基思想的影响，走上了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革命道路。一八五三年起在彼得堡编辑《同时代人》杂志。一八六一年他尖锐地揭露了沙皇政府废除农奴制的欺骗性，号召广大农民起义，推翻沙皇制度。一八六二年被捕。一八六四年开始流放西伯利亚，在流放和被监禁的二十年中，他始终拒绝请求赦免。

在哲学观点上，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个唯物主义者。但他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在政治思想上，他承认阶级斗争，号召农民群众进行革命，推翻农奴制和沙皇政权。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依然带有空想的性质。他没有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才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只有经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消灭一切剥削和贫困，而幻想通过旧的“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去。

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他的一生贡献给了革命事业。他给了俄国当时的先进人物以巨大的影响。列宁称他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242页)他除著有《怎么办?》等杰出的文艺作品外，还著有《对反公社所有权的哲学偏见的批判》(1858年)、《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则》(1860年)等哲学著作。

普列汉诺夫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1918)，

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后来成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之一。出生于一个小地主家庭。曾就读于沙俄军校和彼得堡矿业学院。一八七六年参加民粹派组织，曾两次被捕。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三年流亡日内瓦期间，开始接触西欧的工人运动，并同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联系，逐步抛弃了民粹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一八八三至一九〇三年，普列汉诺夫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此期间，他在日内瓦建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并撰写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如《社会主义革命与政治斗争》(1883年)、《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1895年)、《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1898年)等等。他的著作对于批判民粹主义、俄国经济主义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对农民的革命性估计不足，坚持同自由资产阶级妥协，忽视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这些错误，是他后来孟什维克观点的萌芽。

一九〇三年七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普列汉诺夫很快堕落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分子。他帮助马尔托夫等人夺取了《火星报》编辑部的领导权。同年十一月，发表了机会主义黑文《不该这么办?》。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他反对列宁的革命路线，否定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权，反对暴力革命。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他曾一度同取消派作过斗争，但不愿同取消派决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拥护帝国主义战争，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后，他借口俄国经济落后，主张发展资本主义，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反对十月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克鲁泡特金

彼得·阿列克谢也维奇·克鲁泡特金(1842—1921)，无政府主义的著名代表。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早年当过军官。一八七二年在瑞士加入第一国际，同巴枯宁分子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次年回国后，以无政府主义者的姿态参加了民粹派活动，一八七四年被捕。一八七六年越狱逃往国外，在瑞士、法国、英国著书立说，从事无政府主义的宣传。他企图以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建立一套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体系。他用斯宾塞的把社会现象归结为生物学上的规律方法，来说明社会现象，把所谓“互助的规律”当作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克鲁泡特金看来，“互助”是人类的“本能”，而任何强权是违反人类的“本能”的。因此，只有反对国家，反对政府，人类才可以“自由”，人类“互助”的“本能”才可以实现。克鲁泡特金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用各种团体的自由联合代替国家。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俄国工人运动中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对十九世纪末期的国际工人运动造成极大的危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他回到俄国，积极支持克伦斯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米海洛夫斯基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米海洛夫斯基（1842—

1904),俄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主要代表。生于贵族官吏家庭。一八六〇年开始文学活动,七十年代初接近民粹派,曾任《祖国记事》和《俄国财富》两杂志的编辑。他激烈攻击马克思主义,用唯心主义的主观方法论论证社会学,否认社会的发展是由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决定的。他宣扬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认为个人及其思想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视群众为“群氓”,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具有根除社会灾难使命的“超阶级”力量。这些反动理论阻挠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发挥,妨碍了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米海洛夫斯基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和“人民之友”,以此来掩盖其反革命的真面目。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等著作中,揭穿了米海洛夫斯基的民粹派社会主义的实质,从思想上粉碎了民粹主义。

查苏利奇

维拉·伊凡诺夫娜·查苏利奇(1849—1919),女,俄国孟什维克首领之一。出身在封建小贵族家庭。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参加民粹派,因进行革命活动被捕流放,不久便与民粹派断绝了联系。一八八三年她与普列汉诺夫等人一起在日内瓦创立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在该社工作期间,她翻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一九〇〇年,她参加了列宁领导的《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

查苏利奇是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观点的积极支持者。她攻击列宁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否定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列

宁同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她反对列宁的建党原则，成为可耻的孟什维克。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她是取消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

阿克雪里罗得

巴维尔·波利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得(1850—1928)，俄国孟什维克首领之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巴枯宁主义者，曾参加民粹派运动。一八八三年成为普列汉诺夫创建的“劳动解放社”的社员。一九〇〇年加入《火星报》编辑部。在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支持马尔托夫反对列宁的建党原则，会后成为孟什维克头子。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他反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主张把工人阶级的先进队伍溶化在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革命失败后，他成为取消派的首领。一九一二年参加反党的“八月联盟”，领导孟什维克的指挥中心“组织委员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打着“中派”的旗号，实际上是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一九一七年，他流亡国外，后成为伯尔尼国际的国际社会主义局委员。十月革命后，他反对苏维埃政权，赞成外国的武装干涉，是苏维埃国家的凶恶敌人。

波特列索夫

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波特列索夫(1869—1934)，笔名斯培罗维尔，俄国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出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军官家庭。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一个“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曾接近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

斗争协会”，一九〇〇年在国外参加《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创办工作。一九〇三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同马尔托夫一起，反对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堕落为孟什维克。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波特列索夫主张与自由资产阶级妥协，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革命失败后，成为取消派头目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反对列宁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革命口号，鼓吹护国主义，是露骨的沙文主义者。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他赞成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成为孟什维克极右派集团“积极派”的代表人物，主张用武装干涉的“积极手段”消灭布尔什维克，后逃往国外，继续从事反对苏维埃国家的活动。

马尔托夫

马尔托夫，真名是尤利·奥西波维奇·策杰尔包姆（1873—1923），俄国孟什维克的主要头目。生于君士坦丁堡，就学于彼得堡大学。一八九五年参加组织“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一九〇〇年在国外加入《火星报》编辑部，对经济派进行过批判。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反对把无产阶级专政列入党纲，反对列宁的建党原则，并以自己的机会主义条文同列宁提出的党章第一条相对抗，主张任何人均可自行列名入党，企图使党成为一个成分复杂、组织涣散、没有严格纪律、没有战斗性的不定型的组织。会后，他背着党成立了孟什维克派别组织，进行反党活动，造成党的分裂。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他主编《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是取消派

的思想领导人之一。一九一二年成为托洛茨基反党“八月联盟”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打着“左派孟什维克”旗号，是个隐藏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他鼓吹一切社会党人组成联合政府，企图用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同布尔什维克分掌政权。一九二〇年逃往国外，在柏林与唐恩等编辑孟什维克反革命杂志《社会主义通报》。一九二一年伙同考茨基等拼凑修正主义的第二半国际。列宁称他是“以市侩改良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的骑士”。（《列宁选集》第4卷，第533页）

波格丹诺夫

波格丹诺夫(1873—1928)，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马林诺夫斯基的笔名，俄国马赫主义的一个主要代表，职业是医生。一八九六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小组。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归附布尔什维克，曾任《无产者报》编辑部委员。波格丹诺夫在哲学上，原是个自发的唯物主义者，后来受奥斯特瓦尔德“唯能论”影响而转向马赫主义。一九〇四至一九〇六年先后发表了《经验一元论》一、二、三卷，提出了唯心主义的“经验一元论”和“普遍代换说”，系统宣传马赫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彻底清算了他的马赫主义观点。一九〇八年，在对待沙皇政府的斗争策略上，他直接反对列宁，充当了召回派的头目。一九〇九年布尔什维克《无产者报》编委会宣布同他断绝关系。十月革命后，他纠集一帮人组织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反对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主

张抛弃过去的全部文化，并继续散布马赫主义哲学观点和“未来主义”的反动文艺观点，企图使苏维埃文化的发展，离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摆脱党对文化事业的领导，受到列宁的严厉斥责。晚年任苏联国立输血研究所所长。一九二八年在一次输血实验中死亡。

卢那察尔斯基

安那托里·瓦西里也维奇·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是著名的苏维埃社会活动家。一八九二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一九〇三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曾担任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无产者报》和《新生活报》的编辑出版工作。在列宁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四、五次代表大会。一九〇七年代表布尔什维克出席了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他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在政治上成为“召回派”，在哲学上宣扬马赫主义，企图将马克思主义和宗教调和起来，成为“造神派”的一个头目。一九〇九年，卢那察尔斯基参加了波格丹诺夫等组成的“前进派”反党集团。一九一一年退出“前进派”，成立“无产阶级文学”集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归附于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在布尔什维克党“六大”上，他以“区联派”成员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的十二年里，他一直担任教育人民委员。一九二三年起任苏联学术委员会主席。一九三〇年起是科学院院士。一九三三年是苏联驻西班牙全权代表。他写有不少有关俄国文学、音乐、戏剧等方面的论文，

并著有历史剧《奥里维·克伦威尔》(1920年)和《托马斯·康帕内拉》(1922年)。

司徒卢威

彼得·别隆加尔道维奇·司徒卢威(1870—1944)，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加入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成为“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有名代表人物。一八九四年他所著《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批评意见》一书，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著作。他剽窃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词句，阉割这一学说的革命实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公开宣扬马尔萨斯主义。二十世纪初，他完全与社会民主党断绝关系，投到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反动营垒，成为资产阶级“解放同盟”的理论家和组织者之一，并担任《解放》杂志的主编。以后成为立宪民主党的首领，担任该党中央委员。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他滚进了“黑色百人团”的反革命泥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俄国帝国主义最富有侵略性的沙文主义思想家之一。十月革命后，他先后参加了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反动政府。后又逃至国外编辑出版保皇报刊《复活日报》，他是苏维埃政权的凶恶敌人。列宁指出，司徒卢威“是从机会主义开始，从‘批评马克思’开始，在几年内滚到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立场上去的”。(《列宁全集》第20卷，第104页)

克伦斯基

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克伦斯基(1881—1970)，俄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客。早年就学于彼得堡大学，获法律学

位后，开业当律师。一九一二年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成为杜马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的首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狂热拥护帝国主义战争，是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三月加入社会革命党，并以“社会主义者”的身份进入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历任司法部长、陆海军部长、总理、总司令等要职。他执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政策，对外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对内血腥镇压工人革命运动，并勾结反动将军科尔尼洛夫，发动反革命叛乱。列宁称他是“一个专用空话欺骗工农的丑角”（《列宁选集》第3卷，第8页）。十月革命后，他逃往巴黎，亡命于美国，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直到死。

策烈铁里

伊拉克利·格奥尔基也维奇·策烈铁里(1882—1959)，俄国孟什维克的首领之一，社会沙文主义者。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他作为孟什维克的代表参加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任邮电部长职务，后改任内务部长。在任期内，曾策划反动军队镇压和屠杀革命工人和革命士兵，还多次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大肆逮捕各地土地委员会的委员。十月革命后，他成为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反革命政府的首领，残酷地杀害布尔什维克党员，疯狂地反对苏维埃政权。一九二一年，逃往国外，继续进行反苏活动。列宁指出，策烈铁里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革命的工具”。（《列宁选集》第3卷，第123页）

巴布什金

伊万·瓦西里也维奇·巴布什金(1873—1906)，俄国工人革命家。出生在贫农家庭，十岁当商店学徒，后在彼得堡谢勉尼柯夫工厂做工。一八九三年参加革命活动，成为列宁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成员。一八九四年在列宁的领导下，他与小组的同志们掀起罢工。这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小组进行政治鼓动的开始。一八九五年他成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最积极的成员之一，为此被捕流放。一九〇二年，他受党的派遣到工人团体中进行革命工作，使工人摆脱了祖巴托夫“警察社会主义”的影响。列宁的《火星报》创刊后，他是报纸的第一批代办员和通讯员。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伊尔库茨克和赤塔委员会委员。一九〇六年在西伯利亚执行运送武器的任务时，被反革命讨伐队杀害。列宁在悼念文章中称他是“人民英雄”、“党可引以自豪的人物”。

克鲁普斯卡娅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1869—1939)，苏维埃国务活动家和教育家，列宁夫人。生于彼得堡。一八九〇年加入马克思主义小组。一八九五年加入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一八九六年被捕后流放西伯利亚三年，并在流放地与列宁结婚(1898)。从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五年，她跟随列宁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先后担任《火星报》和《前进报》编辑部秘书。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革命期间，在彼得堡进行党的组织工作。一九一二年，她在克拉

柯夫和波罗宁，协助列宁同俄国国内各地党组织建立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积极地参加了国外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活动。她是一九一五年伯尔尼国际妇女代表大会俄国代表团团员。一九一七年四月，随列宁回到彼得堡后，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书记处工作。

十月革命后，她先后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委员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副教育人民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她曾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了一系列关于共产主义教育问题。在儿童的学前教育和成人教育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写了一系列有关教育问题的著作，对苏维埃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荣获列宁勋章和劳动红旗勋章。主要著作有《国民教育与民主》、《列宁回忆录》和《苏联妇女》等。

阿尔曼德

印·费·阿尔曼德(1875—1920)，女，俄国人，共产党和国际妇女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好友。一九〇四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并在莫斯科党组织工作。一九〇九年流亡国外，积极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巴黎协助小组”的工作。一九一一年又参加了龙寿姆(靠近巴黎)党校的工作。一九一二年秘密回到俄国，不久被捕。一九一三年出狱后，到克拉柯夫，参加了《女工》杂志国外编辑部的工作，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六年，她为建立各国国际主义者之间的联系做了很多工作，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的国际主义者代表会议。十月革命后做经济工作和党的工作。最后几年在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女工部工作；她积极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在去高加索的途中，由于患霍乱而去世。

捷尔任斯基

费里克斯·埃特蒙塔维奇·捷尔任斯基(1877—1926)，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之一。生于立陶宛的一个波兰小贵族家庭。一八九五年参加社会民主党，积极投身于波兰和俄国的革命运动，一九〇五年他领导了工人革命斗争。一九〇六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中央委员。同年被捕，流放达十一年之久，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他才恢复自由。他参加十月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胜利后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坚决镇压了反革命分子和投机商人的破坏活动，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国家。为了表彰他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方面的卓越贡献，一九二〇年党和政府授予他红旗勋章。一九二一年任交通人民委员。一九二四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日在党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表了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演说后，因心脏病发而逝世。

斯维尔德洛夫

雅柯夫·米哈依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1885—1919)，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杰出领导人。生于俄国下诺甫戈罗德(今高尔基城)一个雕刻工匠家庭。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担任乌拉尔党组织的领导工

作。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党的第六次代表会议上缺席当选为党中央委员，并与斯大林一起领导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和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工作。一九〇二至一九一二年先后九次被沙皇政府逮捕，过了十年的监禁和流放生活。一九一七年四月在党的第七次代表会议上当选为党中央书记。参加了十月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当选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任主席。他始终坚持列宁的革命路线，为创立、巩固和建设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终因积劳成疾，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病逝。列宁高度评价斯维尔德洛夫的一生，称他为：“忠心耿耿的革命家”，“非凡的天才组织家”。（《列宁全集》第29卷，第71页）

托洛茨基

列甫·达威多维奇·托洛茨基(1879—1940)，联共(布)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列宁主义的凶恶敌人。生于俄国埃利萨弗特格勒(后改为基洛夫格勒)市郊的一个富农家庭。早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九〇二年流亡伦敦，在列宁创办的《火星报》工作。一九〇三年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拥护马尔托夫的机会主义观点，反对列宁的建党原则。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他公开树起反对列宁的黑旗，开始贩卖所谓“不断革命”论。革命失败后，他完全滚进了取消主义的泥潭。一九一二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会议决定把孟什维克开除出党，他又起来攻击党的决议，并组织“八月联盟”进行反党派别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站在考茨基的“中派”立场上，反对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策略。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托洛茨基由国外回到俄国，在党的六大上，他同“区联派”一起被吸收入党。但他暗地里却利用窃取的职权，大肆进行反党活动。十月武装起义准备时期，他反对列宁的武装起义方针，并在苏维埃会议上叛卖性地泄露了起义的日程。在布列斯特停战谈判期间，他反对列宁关于签署和约的方针，主张不战不和，并利用外交人民委员和首席代表的身份破坏谈判，使苏维埃国家曾一度面临极大的危险。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多次违背列宁的作战命令，使红军在战场上几次受挫。在苏维埃国家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时期，他又挑起关于职工会问题的争论，猖狂进行反党派别活动，妄图破坏党的经济恢复工作，瓦解党和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二三年秋至一九二四年初，他趁列宁病重和逝世时机，接连抛出了给党中央的《公开信》和《四十六人声明》，在全国散发，要求撤换党的领导，改变党的路线和策略，再次在全党挑起争论。不久又抛出了《新方针》、《论列宁》、《十月的教训》等黑文，诽谤列宁，贬低和歪曲列宁主义，继续兜售其“不断革命”论，妄图用托洛茨基主义取代列宁主义。在党的工业化时期，他伙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组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反对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鼓吹“超工业化”的荒谬计划，妄图把苏联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的农业附庸。他们自立中央，自成体系，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一九二七年五月，他又抛出了向党进攻的《八十三人政纲》，强迫全党进行争论。同年十一月

七日，他组织反苏维埃的游行示威，公开滚入反革命营垒。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四日，联共(布)中央将其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他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境。此后，他专门从事反革命活动。一九三八年九月在巴黎拼凑国际托派组织——世界社会主义政党，即“第四国际”。一九四〇年八月死于墨西哥。

季诺维也夫

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季诺维也夫(1883—1936)，联共(布)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生于俄国厄利萨格勒。曾在瑞士伯尔尼学习化学和法律。一九〇一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九〇七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〇八年后一直流亡国外。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他对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采取调和态度。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随同列宁回国。十月革命前夕，他反对列宁关于武装起义的方针，主张等待立宪会议的召开获得稳定的多数后，来实现社会主义，并叛卖性地泄露了武装起义计划，被列宁痛斥为“卑鄙的叛卖行为”，“可耻的工贼行为”。十月革命后，在同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谈判时，他同意成立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反革命政党参加的“社会主义政府”，反对由布尔什维克独掌政权。以后曾担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一九二四年列宁逝世后，他伙同加米涅夫组织“新反对派”，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一九二六年，他公开与托洛茨基结成托季反党联盟，反对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反对

党的列宁主义路线，因此被开除出政治局。共产国际也解除了他的职务。一九二七年被开除出党。一九三四年以叛国罪被捕，一九三六年被处决。

李可夫

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李可夫（1881—1938），联共（布）党内机会主义者。生于萨拉托夫一个农民家庭。一八九九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后多次被捕流放。一九一七年十月武装起义后担任内政人民委员。一九一八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一九二三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一九二四年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九二七年同布哈林勾结组成布哈林——李可夫反党集团，反对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农业集体化的方针。一九三〇年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一九三七年因参加阴谋反党活动被开除出党。一九三八年以叛国罪被处死。

加米涅夫

列甫·波利索维奇·加米涅夫（1883—1936），联共（布）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生于一个工程师家庭。一九〇一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九〇三年“二大”后是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二年任党中央委员。一九一五被沙皇政府流放西伯利亚。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由流放地归来任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十月革命前夕，他反对列宁的武装起义的方针，贩卖性地泄露了武装起义的计划。十月革命后，在同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谈判时，同意成立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

命党等政党参加的“社会主义政府”，反对由布尔什维克独掌政权。为此他被解除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自动退出了中央委员会。以后他又担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和国防会议主席。任职期间，一再进行反党活动，特别是在列宁逝世以后，他伙同季诺维也夫纠集所谓“新反对派”，反对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并进一步同托派勾结，组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猖狂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七年因进行反党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后两次恢复党籍，又两次被开除出党。一九三四年因反党叛国案被捕。一九三六年被处决。

布哈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888—1938），联共（布）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生于莫斯科的一个教师家庭。一九〇六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九〇七年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曾几次被捕，一九一一年从流放地逃往国外。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在维也纳协助列宁出版《真理报》，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回到俄国，进入党中央委员会。十月革命后长期担任《真理报》主编。一九一九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一九二三年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二六年任共产国际主席。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哈林在瑞士组织“鲍日”小集团，反对党的纲领，攻击列宁的“民族自决权”口号。十月武装起义时期，他附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反对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针。一九一八年初，他纠集“左派

共产主义者”反党集团，竭力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主张继续战争。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当托洛茨基挑起工会问题争论时，他打着“缓冲”的旗号，大搞折衷主义，袒护托洛茨基，妄图从内部动摇和推翻列宁的领导。

列宁逝世后，布哈林曾一度支持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以后，于一九二七年与李可夫勾结，拼凑布哈林——李可夫反党集团，反对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农业集体化方针，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消灭富农经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布哈林等人暗中和加米涅夫密谈，阴谋同托洛茨基分子进一步勾结。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联共(布)中央撤销了布哈林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共产国际中所担任的职务。一九三八年，布哈林因叛国案被处死。

拉狄克

卡尔·拉狄克(1885—1939)，波兰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托季反党联盟成员，生于波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曾先后在波兰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工作，大战爆发后，因从事反对军国主义的活动，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在流亡瑞士期间，他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会议，并在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理论刊物《先驱》杂志编辑部工作。但是，拉狄克在左派组织内部制造分裂，在民族问题上坚持错误观点。对此，列宁曾著文予以批判。

一九一七年，拉狄克到俄国，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在人民外交委员会工作。一九一八年，他与布哈林一起，打着“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旗号，反对苏维埃俄国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一九二三年起，他成为托洛茨基反

对派的骨干分子。一九二六年，又参加托季联盟的反党活动，被开除出党。一九三七年以叛国罪被判处十年徒刑。

潘涅库克

安东尼·潘涅库克(1873—1960)，荷兰社会民主党人。一九〇七年参加创办荷兰社会民主党左派机关报《论坛报》，从而使党内形成了左派集团“论坛派”。一九〇九年因反对党的改良主义路线而被开除党籍。以后，他又组织了独立的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属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主义。一九一七年加入荷兰共产党，不久又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但他后来转向极“左”的机会主义立场，反对共产国际纲领。列宁对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他拒不改正，反而诬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纲领是机会主义的纲领。一九二一年，他退出荷兰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任阿姆斯特丹大学天文学教授，停止了政治活动。

片山潜

片山潜(1859—1933)，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出生于农民家庭。早年参加社会主义宣传活动，一八九七年组织五金工人工会，担任工会书记和《劳动世界》杂志的总编辑。次年创办“社会主义研究会”。一九〇一年，他参加日本社会民主党的创建工作。该党解散后，他继续从事工人运动。一九〇四年以日本社会民主党代表身份，参加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当选为大会副主席。一九〇六年，日本社会党重新建立，他是该党的领袖之一。一九一一年，他

因参加和领导东京电车工人的罢工，遭到反动当局逮捕并被判处有期徒刑。出狱后流亡国外，建立日侨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创建日本共产党，同年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一直在共产国际工作。他支持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积极领导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主要著作有《日本的劳动运动》、《日本和日益迫近的社会主义革命》。

贝拉·库恩

贝拉·库恩(1886—1939)，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生于匈牙利一个中等阶级家庭。一九〇二年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征入伍，一九一六年在俄国被俘。在战俘营中，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前，他在布尔什维克党托姆斯克省委员会和《西伯利亚工人》杂志编辑部工作。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一九一八年三月，贝拉·库恩发起成立匈牙利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年底回国创建匈牙利共产党。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存在时期，他任外交和军事委员，是苏维埃政权的实际领导者。苏维埃政权失败后，他前往苏联，继续从事军事和党务工作，并积极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创立活动。从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起，他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一直到逝世。

贝拉·库恩写有大量的文章和小册子，国际工人的报刊曾用多种文字予以刊登。他一生曾多次被捕入狱，但从来没有

有放弃对敌人的斗争。一九二七年，在苏联之友大会上，他荣获红旗勋章。

台尔曼

恩斯特·台尔曼(1886—1944)，德国工人阶级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生于汉堡，曾当过码头工人。一九〇四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叛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他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热烈拥护者。他坚决反对外国武装干涉苏俄，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九二〇年，他加入德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领导了著名的汉堡工人武装起义。一九二五年当选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在他的领导下，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建立起来的德国共产党，终于发展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政党。一九二四至一九三三年，他当选为国会议员，曾多次被提名为德国共产党的总统候选人。在法西斯威胁日益严重的时期，台尔曼为德国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他被法西斯逮捕入狱，关押十一年后惨遭杀害。

季米特洛夫

格奥尔基·米海依诺维奇·季米特洛夫(1882—1949)，保加利亚人民的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出生于一个革命工人家庭，十二岁在索菲亚当印刷工人，十五岁开始革命活动，十八岁当选为印刷工会书记。一九〇二年

参加保加利亚社会党。他与革命的“紧密派”一起开展了反对机会主义的“广泛派”的斗争。后任社会党索菲亚组织书记。一九〇九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此后，他一直担任党的领导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季米特洛夫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保加利亚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利用议员身份在国会投票反对军事拨款，曾两次被捕入狱。一九二一年，他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三年九月，他领导保加利亚人民举行了反法西斯武装起义，失败后被迫流亡国外。一九三三年德国希特勒制造“国会纵火案”时，他被逮捕。在来比锡法庭上，他勇敢地揭露了法西斯的罪行，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捍卫了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荣誉，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树立了英勇斗争的光辉榜样。一九三五年，他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行了巨大的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领导保加利亚人民进行了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斗争，组织了游击队，创立了祖国阵线，一九四四年九月发动了武装起义，建立了人民政权。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他担任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一九四六年被选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病逝于莫斯科。

福斯特

威廉·福斯特(1881—1961)，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前美国共产党创始人和名誉主席。出生于美国波士

顿的一个工人家庭，十岁就当童工，先后在木材、农场、铁路、建筑等部门工作达二十六年之久。一九〇一年加入美国社会党，一九〇九年被该党右翼集团开除。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五年担任芝加哥“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全国书记，一九一五年起又担任圣路易“国际工会教育同盟”书记，曾多次领导工人罢工和组织工会斗争。一九二一年加入美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主席、名誉主席，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福斯特从一九二一年参加创建美国共产党时起，就成为美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他在党内开展了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一九二八年，美共党内出现了以坎农和谢赫曼为首的托派集团。一九二九年又出现了以党的总书记洛夫斯顿为头子的鼓吹“美国资本主义例外论”的机会主义路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出现了以白劳德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又出现了以盖茨为首的修正主义。对于美共党内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福斯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福斯特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他满怀热情地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坚决反对美国敌视中国的反动政策，并为沟通和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一九六一年四月，福斯特病逝于莫斯科，享年八十一岁。他的主要著作有《美洲政治史纲》（1951年）、《美国共产党史》（1952年）、《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年）等。

(三)

雅各宾派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政治代表。一七八九年，巴黎雅各宾俱乐部(因会址设在雅各宾修道院而得名)开始活动，原来其成员比较复杂，当裴扬派和吉伦特派相继退出后，雅各宾俱乐部就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中心，其成员称雅各宾派，代表人物有马拉、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等。

雅各宾派在人民的支持下，于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革命中，推翻了大资产阶级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了雅各宾专政。在此期间，雅各宾派领导人民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颁布了资产阶级最民主的宪法之一——一七九三年宪法；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为保卫新成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推到了高峰。

雅各宾派在尖锐的革命斗争中，采取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措施，得到人民的支持。但是，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已经削弱，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已经巩固的情况下，他们就不能再把革命推向前进了，再也不能提出足以团结广大劳动群众的政策了。因此，就逐渐引起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不满，从而动摇了雅各宾专政的基础。一七九四年，被大资产阶级热月政变所推翻。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雅各宾派随之瓦解。

吉伦特派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集团。因其著名代表多数出身于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郡而得名，其首领为布里索等，故也称“布里索派”。

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吉伦特派曾参加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斗争，主张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在君主立宪派统治时期，曾受国王路易十六之命组织过内阁。一七九二年革命后，窃取国家政权，建立吉伦特派统治。该派执政后，逐渐被人民的革命风暴所吓倒，因此竭力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阻止革命向前发展，结果引起人民的不满，与激进派的矛盾以及与人民的矛盾愈来愈尖锐。一七九三年，被雅各宾派领导的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革命所推翻。

雅各宾专政初期，逃亡的吉伦特派分子在全国各地组织反革命叛乱，妄图颠覆雅各宾专政，最后被镇压。一七九四年七月反革命政变后，与热月党合流。

青年黑格尔派

又称“黑格尔左派”，是代表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派要求的哲学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是布鲁诺·鲍威尔、大卫·施特劳斯、阿尔诺得·卢格、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等。

十九世纪三十一——四十年代，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死后，其哲学派别发生了分化。部分要求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主张进行某些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分子，组成了青年黑格尔派，同坚持反动政治立场的老年黑格尔派进行了激烈斗争。这一斗争是德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

级斗争的反映。

青年黑格尔派特别强调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中，都存在着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该派主张对德国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批判，实行某些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反对老黑格尔派把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看成是理想的化身，是永恒不变的最合理的国家制度等说教。它在德国历史上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这一派别的多数人始终没有摆脱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们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反对用革命手段对现存社会制度进行斗争，终于一个个背叛了民主革命运动，走上同封建势力妥协的道路。这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极端软弱性和妥协性。

马克思早年曾一度是该派成员，通过实际斗争和理论研究，彻底清算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克服了“青年黑格尔派”的缺点和错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终于成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

流亡者同盟

一八三四年在巴黎建立的具有共和民主倾向的秘密团体。它是从“德国人民同盟”分裂出来的，大部分成员是政治流亡者和手工业工匠，成员有几百人，分两派：小资产阶级派，其代表人是泰奥多尔·舒斯泰尔、雅科布·费奈迭；无产阶级派，其代表人是威·贝仓哈尔特、格·阿仓茨、威·魏特林等。

该同盟提出将德国从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建立一个政治上平等、自由的社会；主张推翻德国君主制度，建立统一

的德意志共和国。同盟内部等级森严，完全是建立在盟员对上级绝对服从的基础上。最高领导机构称“民族茅舍”或“主要基地”，下设“区营地”、“茅舍”或“帐篷”。有两个章程：一个适用于基层组织称“流亡者同盟一般章程”，一个适用于“营”以上组织称“流亡者同盟章程”。

该同盟只搞密谋活动，脱离广大工人群众，长期没有什么发展。一八三六年内部分裂，其中一部分革命无产阶级分子退出该组织，另外建立了新的秘密团体——“正义者同盟”。

正义者同盟

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一八三六年由“德国流亡者同盟”中分裂出来的部分成员在巴黎建立的秘密团体。大部分成员是流亡在巴黎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主要领导人 有卡尔·沙佩尔、亨利希·鲍威尔、约瑟夫·莫尔等。

该组织的纲领和章程有浓厚的空想和密谋性质：主张以少数英雄人物的起义来推翻反动统治，直接在德国建立“共产主义”；口号是超阶级的“人人皆兄弟”。由于其理论和路线的错误，多次起义均遭失败，因此，迫切要求改造组织。一八四七年春，同盟派莫尔正式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参加组织，并授权让他们领导同盟的改组工作。同盟声明：确信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同意将这一理论作为同盟的指导思想。一八四七年六月，同盟在伦敦召开改组大会。恩格斯和沃尔弗参加了大会，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提议，把“正义者同盟”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新口号，代替“人人皆兄

弟”的口号。大会决定由恩格斯和沃尔弗等人起草新的章程，明确规定：“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无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从此，该同盟正式叫“共产主义者同盟”。

四季社

布朗基领导的法国秘密革命团体，成立于一八三七年，因其成员是按“星期”、“月”、“季”组织起来的，四个“季”组成一“年”，所以叫“四季社”。

该组织的成员主要是工人和手工业者。它主张依靠密谋暴动的策略，达到革命的目的，因而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二日，四季社在巴黎突然举行武装起义，因没有发动群众，群众也不了解起义的目的，结果被镇压，该组织随之瓦解。

一八四〇年，一些密谋家又重新组织“新四季社”，不久，又被迫停止活动。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一八四〇年二月由沙佩尔、莫尔等人在伦敦建立的德国工人公开组织，其宗旨是向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在该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先是“正义者同盟”的盟员，后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四十年代后期，教育协会才具有了国际性。

马克思、恩格斯自一八四七年和一八四九——一八五〇年间，积极参加协会工作。他们利用这个阵地，大力宣传科

学共产主义思想，培养和造就工人运动骨干。“共产主义者同盟”从该协会中不断吸收优秀工人参加组织，壮大自己的队伍；而许多盟员又在该协会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逐渐成长为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人。一八四八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同盟内部发生分裂，以维利希——沙佩尔为首的宗派主义集团控制了教育协会，推行冒险主义路线，公开反对马克思的正确路线。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于一八五〇年九月十七日退出了该协会。直到五十年代末才又重新参加协会的活动。

该协会对早期欧洲工人运动起了一定进步作用。一九一八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

全国宪章协会

又名“全国宪章联合会”，英国宪章派领导宪章运动的全国性组织，一八四〇年七月在曼彻斯特建立。主要领导人 有奥康诺、哈尼、琼斯等。协会的中央委员会由会员选举产生，各地建立有分会，曾发展到五万会员，有四百个地方分会。

宪章协会曾领导了一八四二年和一八四六年两次宪章运动高潮，但因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作指导，又没有明确的战斗纲领和斗争策略，结果被反动派所镇压。一八四八年最后一次斗争失败后，宪章协会已基本停止活动，一八五八年左右结束。

马克思、恩格斯曾给宪章派的左翼革命分子以热情、巨大的支持，哈尼和琼斯都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帮助。

北美土地改革派

即美国“全国改革协会”，又称“民族改良派”或“青年美国”。它是美国手工业者和工人的群众政治团体，创立于一八四五年。

该协会宣称：土地是人类的公共财产。它主张无偿地分给每一个劳动者一块土地。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曾宣传发动土地改革运动，反对种植场奴隶主及土地投机分子，并提出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废除奴隶制和取消常备军等许多民主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对该组织和它所发动的土地改革运动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指出土地改革运动的实现，会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同时也指出，土地改革运动只具有民主运动的性质，无产阶级还必须看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

全国职工联合会（英国）

一八四五年在伦敦成立的全国性工联组织。该组织只联合合同行业的地方工联，会员全部是熟练工人，最多达十万人。

该组织代表了熟练技工的利益和观点。其地方组织称工会或俱乐部，其活动只限于争取出卖劳动力的优惠条件和改善工人立法的经济斗争，反对工人用罢工手段争取自身的政治权利。由于推行这条改良主义路线，该联合会对英国工人运动没有起多大作用。六十年代初即行解散。

民主派兄弟协会

一八四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性的民主团

体。主要参加者有英国宪章派左翼代表哈尼、琼斯和各国革命流亡者(其中主要是“正义者同盟”成员)。该协会宗旨是为了加强各国民主运动之间的联系。

马克思、恩格斯参与筹建并同协会始终保持经常的联系。他们努力用科学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去教育协会成员，团结该协会中的无产阶级核心力量，并希望通过他们去影响英国宪章运动，促进工人阶级的觉悟，提高运动的水平。它在欧洲工人运动史上起了一定进步作用。

一八四八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各国反动势力猖狂一时，协会活动削弱了。一八五三年终于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马克思、恩格斯于一八四六年初在布鲁塞尔创建的共产主义组织。目的是通过书面讨论和定期通讯来促进各国工人运动在科学共产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为建立工人阶级政党作好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该会团结了英国宪章派的左翼领导人，伦敦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领导人沙佩尔、莫尔等，西里西亚的工人领袖威廉·沃尔弗，威斯特伐利亚的约瑟夫·魏德迈等。尤其是同科伦的共产主义者丹尼尔斯、毕尔格尔斯等人经常保持通讯联系。在讨论和通讯中，该组织批判了当时流行于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传播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促进了各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对欧洲早期工人运动起了重大作用。一八四七年底该委员会整个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成为布鲁塞尔同盟支部的核心。

共产主义者同盟

一八四七年六月在伦敦创建的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是在彻底改造原“正义者同盟”的基础上建立的。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八日，同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加和领导了这次会议，并接受大会委托起草了该同盟的纲领，即一八四八年二月公布的《共产党宣言》。

该同盟建立后，立即投身于欧洲一八四八年革命运动。当法国二月革命刚一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立即把领导权交给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不久，马克思被驱逐并迁居巴黎，三月初巴黎便成了同盟的新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在马克思的领导下，组织和发动各同盟支部和盟员，积极地投身于当时的革命运动。四月初，马克思、恩格斯亲自率领数百名流亡的德国工人，分散地返回德国参加革命斗争。他们多数是同盟的会员，到德国后大部分成了各地革命的领导和组织者。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为这次革命制定了正确的政治纲领和路线；积极创办和主编“新莱茵报”作为指导这场革命的领导中心；广泛参加德国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

革命失败后，该同盟惨遭迫害。马克思、恩格斯又为改组和恢复同盟的工作进行了不倦的斗争。一八五〇年三月写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总结了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任务。一八五〇年夏，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发生了原

则性的分歧和激烈的斗争。以马克思、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抵制和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宗派主义冒险策略。九月中旬，同盟内部发生了分裂。马克思提议把中央委员会职权移交给科伦区部委员会。

一八五一年五月，反动的德国普鲁士政府一手导演了骇人听闻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残酷镇压各地同盟组织，迫使同盟停止了活动。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彻底揭露了普鲁士警察国家对国际工人运动所采取的卑鄙手段，另一方面于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七日提议解散同盟组织。此建议被一致通过。

恩格斯指出：“同盟却是一个极好的革命活动学校”。它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次伟大实践；它为第一国际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

一八四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国际性的民主派联合组织。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者（主要是德国流亡者）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先进分子之间的联系。

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参加了该协会的创立和领导工作。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马克思被选为该协会副主席。法国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二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积极领导该协会投身于革命激流中，发动民主协会成员投入革命运动，并号召他们去动员和领导广大工人群众以及各界人士，为争取建立比利时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布鲁塞尔一度成了国际民

主运动的中心之一。一八四八年三月，马克思被比利时反动政府驱逐出布鲁塞尔，协会多数骨干也惨遭迫害。从此，协会活动就限于比较狭隘的地方性范围了。一八四九年后协会活动基本停止。

德意志工人协会

马克思、恩格斯于一八四七年八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德国工人组织。其目的是将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政治教育，并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

该协会团结了侨居比利时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者，建立了合法的公开活动中心，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经常参加该协会的各种活动并发表演说，宣传科学共产主义，培养和吸收优秀的会员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支部。该组织也为后来创建的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作出重大的贡献。

一八四八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爆发，反动的比利时政府逮捕并驱逐马克思及工人协会主要成员。从此，协会的活动宣告结束。

德国工人俱乐部

一八四八年三月八——九日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决定建立的公开工人团体。马克思受委托起草了俱乐部的章程草案。

以马克思为首的同盟巴黎支部，直接领导该组织进行工作。它团结和组织了流亡巴黎的德国工人阶级，经常向他们宣传无产阶级在这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动员流亡

工人积极投入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揭露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海尔维格、伯恩施太德、德克尔等人所鼓吹的冒险行动，即建立德国流亡者军团公开进攻德国，制造革命，建立共和国的错误路线。马克思积极动员和组织了几百个流亡的德国工人（主要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分散地返回德国参加革命运动。这些人多数成了德国各地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对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革命失败后，该组织也就停止了活动。

科伦工人联合会

一八四八年四月十三日由“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科伦建立的工人组织。初期受哥特沙克的“左”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影响较深。它反对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立即建立工人共和国。

一八四八年四月，马克思、恩格斯返回德国，参加并领导革命运动，立即派沙佩尔、约瑟夫·莫尔等人去加强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并同哥特沙克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撤换了哥特沙克，巩固了联合会，纠正了原先的错误路线。六月二十五日哥特沙克等退出了联合会，莫尔被选为该会主席。在他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一八四八年十月，马克思被选为联合会主席后，立即改组了该联合会并制定了新的章程，把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和政治水平作为联合会的主要任务。

一八四八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工人运动遭受镇压，联合会逐渐变成一个普通的工人教育协会。

科伦民主协会

一八四八年四月在科伦成立的民主派团体。由小资产阶级、工人、手工业者组成。主要领导人有马克思、施奈德尔第二、里廷豪森等。

马克思、恩格斯于一八四八年四月初返回德国参加革命。他们深刻地分析了德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并根据当时“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各地力量均十分薄弱的状况，决定积极参加民主运动，组成运动的左翼，来推动德国革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遂于五月底加入该协会。

在马克思等人领导下，该协会批判了魏特林的宗派主义错误，广泛宣传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同时，不断地揭露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卖国政策；谴责柏林议会和法兰克福议会向普鲁士专制制度妥协、投降，出卖人民群众利益的罪行。该组织多次主持召开了有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参加的民主大会，鼓吹革命，以促进民主运动的发展。它对德国民主革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一八四九年四月，马克思根据革命的需要，着手在德国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决定从组织上同民主派脱离关系。于是，他们退出了民主协会。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又名“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是一八四九年九月建立的工人救济团体，隶属于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参加了该团体的活动。

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欧洲各国反动政府残酷镇压了

革命运动，共产主义者同盟各国支部多数被打散，大量革命者流亡各地。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收容和救济流亡于伦敦的各国革命者，创立了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该组织在帮助流亡伦敦的革命者寻找工作、安排居住、救济生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以此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之间的联系，将他们团结在马克思、恩格斯周围，并且组织和领导他们在一八四九——一八五〇年间改组了同盟。这对于保存革命力量，开展以后的革命斗争，都起了重大作用。后来，维利希——沙佩尔宗派主义集团控制了该委员会，并公开反对马克思的正确路线。一八五〇年九月，马克思及其支持者退出了该组织。从此，它就名存实亡了。

芬尼亚社

又名“芬尼亚兄弟会”、“芬尼亚共和主义兄弟会”、“爱尔兰革命同志会”。它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先后在美国侨居的爱尔兰流亡者中间和爱尔兰本土成立的秘密革命组织，以爱尔兰历史上一个英勇的部落“芬尼亚”命名，主要成员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平民知识分子。

该社主张推翻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废除大土地所有制，建立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这在客观上反映了农民的利益。芬尼亚社曾在欧、美、澳的爱尔兰移民中进行宣传活动，一八六七年在爱尔兰城市中发动起义，但始终以密谋方式进行，没有吸收广大群众参加，起义被镇压。一八七〇年以后，活动逐渐停止。

芬尼亚社的革命活动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大大推动了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

全德工人联合会

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在来比锡建立的德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拉萨尔窃取了第一任联合会主席。从此，该组织就处于拉萨尔机会主义集团的控制下。

该联合会把工人运动局限在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与和平的议会斗争方面，反对工人阶级进行日常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同时主张由反动的普鲁士国家资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反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对外政策上，鼓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支持普鲁士政府对外侵略和扩张，赞成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反对马克思提出的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自下而上统一德国的正确路线。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给德国革命运动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妨碍了德国工人运动的团结和统一，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抵制和反对。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中的广泛传播，工人阶级的觉悟不断提高，同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斗争日益深入。一部分先进的德国工人终于抛弃了拉萨尔主义，信仰了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并于一八六九年建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爱森纳赫派。又过了六年，由于拉萨尔派所控制的联合会始终坚持错误路线，违背历史发展的要求，丧失人心，陷于崩溃状况，被迫于一八七五年与爱森纳赫派合并，建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从此，实现了德国工人运动的团结和统一。

第一国际

即“国际工人协会”，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在伦敦建立的第一个国际性的工人协会。它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伟大成果；马克思始终是第一国际的灵魂。

该国际是在工人运动日趋高涨，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欧洲各国工人阶级迫切要求加强团结，共同对敌的大好形势下建立的。一八六三年波兰人民英勇奋起反对沙皇俄国殖民统治的起义斗争，获得了各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声援，直接促进了国际的诞生。马克思亲自替国际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两个历史性文件，规定了第一国际的行动纲领和无产阶级的基本路线。它从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建立至一八七六年七月十五日在费城宣布解散，先后召开了五次代表大会和三次代表会议。在历次会议上，围绕着坚持还是反对国际的纲领和路线，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通过斗争，马克思主义终于战胜了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取得了在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地位。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反动势力猖獗一时，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第一国际各国支部大多数遭受严重破坏，完全丧失了活动的自由；另外，随着工人运动向广度发展，队伍不断扩大，各国具体情况参差不齐，难于统一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的存在已不适应形势的要求。马克思建议解散国际组织。一八七六年七月十五日第一国际在费城召开了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马克思的这一建议。

列宁高度评价了第一国际的历史功绩，指出：“第一国

际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它在工人解放斗争史中是万古长青的”。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一八六八年十月在日内瓦建立的，以反对第一国际为宗旨的半秘密团体。该组织的核心是巴枯宁直接控制的秘密团体“国际兄弟会”。该同盟宣布把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作为自己的活动纲领。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得到意大利、瑞士和其他当时工业不发达国家的部分工人的支持。参加该同盟领导的除巴枯宁外，还有布罗塞、杜瓦尔等人。

该同盟混入第一国际后，大肆进行破坏和分裂国际的阴谋活动，妄图篡夺领导权。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国际对它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马克思写了《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同盟》一文，揭露了该同盟的阴谋活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败后，巴枯宁及该组织的破坏活动更加猖狂。他们密切配合各国反动派，疯狂诋毁国际的声誉，分裂国际组织，妄图篡夺国际最高领导权。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国际粉碎了他们的阴谋；并在一八七二年九月召开的海牙代表大会上，经过激烈的斗争，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把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从而宣告了巴枯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彻底破产。

爱森纳赫派

又称“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是一八六九年八月七——九日在爱森纳赫市建立的第一个德国工人阶级政党。主要领导

人有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等人。

该党的纲领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制定的，但也反映了拉萨尔主义的某些影响。它公开声明支持国际的纲领和领导，参加第一国际组织，支持巴黎公社的斗争，反对普鲁士军队对法国的侵略和掠夺；坚持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斗争，自下而上统一德国，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主义推行的王朝战争等。这些正确主张获得了德国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使党日益巩固和发展，影响日趋深远。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怀该党及其领导人的成长，不断给予教育和指导。

一八七五年五月二十二——二十七日，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主义者领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哥达城召开了合并大会，建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通过了“哥达纲领”。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工人阶级队伍的统统一给予肯定，同时对爱森纳赫派某些领导人在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向拉萨尔派作原则性让步的错误，作了严肃的批判。

劳动骑士团

一八六九年由斯蒂芬斯等七个裁缝工会会员在费拉特尔弗亚城建立的美国工人组织。在一八七八年以前，是一个带有秘密性的团体。它主要联合了非熟练工人，其中包括许多黑人。其宗旨是通过建立合作社和互助组织，改善工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偶尔也参加一些工人阶级的斗争。

恩格斯一度关注该团的活动，并寄予希望。但是，由于后期领导人拒绝参加政治斗争，主张阶级合作，特别是一八八六年竟公开禁止该团成员参加罢工斗争，更加脱离广大工

人群众。此后，就完全丧失了对工人群众的影响，于九十年代末瓦解。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一八七五年五月二十二——二十七日在哥达城建立的统一的德国工人政党。它是由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而成的。

该党的建立，结束了德国工人运动长期分裂的局面，客观上符合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和广大工人群众的愿望，对争取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和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起了进步作用。但是，爱森纳赫派主要领导人威·李卜克内西等人，在制定纲领草案和选举党的领导核心等问题上，拿原则作交易，向拉萨尔主义者妥协投降，也给党带来了严重后果。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斗争。

一八七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俾斯麦反动政府强行通过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宣布“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为非法组织，疯狂镇压工人运动。在党处于极端困难时刻，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公开配合反动势力，妄图毁灭党。马克思、恩格斯又挺身而出，先后写了《反杜林论》、《致苏黎世三人团的通告信》等著作，迎头痛击了党内猖狂一时的杜林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和苏黎世三人团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拯救了党，保证了党在“非常法”时期能继续巩固和发展。通过白色恐怖的严峻考验，大大提高了党的领导 and 广大党员进行秘密斗争和合法斗争的水平。由于斗争的胜利，党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扩大了，终于迫使俾斯麦反动政府于一八九〇年十一月一日宣布废除“非常

法”。

一八九〇年十月十二——十八日，党在哈雷举行代表大会，决定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

该党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早期对德国工人运动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一小撮机会主义者篡夺了领导权，把该党引向邪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终于背叛了无产阶级利益，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工具。

美国社会劳工党

一八七六年七月十九至二十二日在费拉特尔弗亚城建立的第一个美国工人阶级政党。原称“美国劳工人民党”，第二年改为“美国社会劳工党”。它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左尔格与拉萨尔分子阿迈尔·斯特纳赛等人创建的，其成员绝大多数是德国侨民。

该党建立后，一度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到一八七九年已在二十五个州里发展了一万多党员；在一八七六——一八七八年间先后创办了二十四家报纸，有较大的影响。恩格斯一直很关心该党的建立和发展，并通过书信给予具体的指导，对其领导人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进行了耐心的批评教育。但是，由于拉萨尔分子占居领导地位和宗派主义者德里昂的长期统治，使党日益脱离工人运动和广大群众。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它已失去了作为工人政党的性质，变成一般性的工人团体。

苏黎世三人团

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赫希伯尔格、施拉姆、伯恩施坦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小宗派。

一八七八年十月，俾斯麦的“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即“非常法”）颁布后，流亡在瑞士苏黎世负责编辑党刊《社会民主党人》的赫希伯尔格等三人，屈服于敌人的压力，宣扬投降路线，乞求统治阶级的饶恕，主张把党改变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改良党。一八七九年，他们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里，鼓吹社会民主党应该成为“一切实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无产阶级不能靠自身的力量取得解放，而应当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不应当以暴力吓跑了资产者，而应当声明“走合作的，即改良的道路”；为了争取更多的资产者合作，社会民主党还应当把“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于最近目标，用于议会活动上。他们还无耻地宣称“非常法”是无产阶级招来的，党应当向政府忏悔，乞求俾斯麦取消这个法令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对“苏黎世三人团”的极端右倾机会主义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深刻的揭露，指出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想把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工具，并建议把他们开除出党，以保持党的纯洁。一八八〇年八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瑞士符登召开的秘密代表会议上，撤销了“苏黎世三人团”所担任的党报《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职务。

可能派

十九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法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因主张把无产阶级的活动局限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范围内，故称“可能派”。其代表人物为马隆、布鲁斯等。

一八七九年建立了法国工人党。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帮助该党领导人拟定党纲。但当党纲通过不久，以马隆、布鲁斯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就起来反对新党纲，并进行分裂党的派别活动。他们要求取消党纲上规定的最终目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认为只要提出一些在当前情况下可能争取到的要求就够了。他们主张把工人的注意力放在争取城市议会之类的地方自治机关方面，并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求党的每个地方组织拥有可以根据当地情况随意修改党纲和“自治”的权力，妄想把法国工人党改变为机会主义的党。

马克思、恩格斯支持法国工人党内以盖得、拉法格为首的革命派同可能派的斗争。一八八二年，革命派退出了可能派控制的圣亚田代表大会，法国工人党分裂为以盖得、拉法格为首的革命派和以马隆、布鲁斯为头子的可能派。可能派把自己的分裂组织叫“社会主义工人同盟”。后来，可能派又纠集英国的机会主义者妄图篡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恩格斯领导各国革命派粉碎了他们的阴谋。

劳动解放社

普列汉诺夫一八八三年在日内瓦创立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一直存在到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第二次代表大会。

该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做过很多工作。它把马克思、恩格斯的《雇佣劳动和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刊行并秘密散发到俄国各地。普列汉诺夫、查苏里奇、阿克雪里罗得及该社中的其他成员，还写过许多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学说，解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普列汉诺夫及“劳动解放社”还开展了反对民粹派的斗争，指出民粹派学说及其斗争方式对于工人运动的严重危害。该社在一八八四年和一八八七年先后拟定了两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这对于准备在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是一个重要的步骤。

该社也有严重的错误，如存在着民粹主义观点的残余，对农民的革命性估计不足，对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又估计过高，以及没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等。这些错误是普列汉诺夫及该社其他一些成员后来发展成为孟什维克的萌芽。

社会主义同盟

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在伦敦建立的英国社会主义团体。它是由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分裂出来的左翼分子所组成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威廉·莫利斯等。

该同盟初建时期，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组织和领导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后来，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占居同盟领导地位，推行机会主义路线，破坏工人运动，日益脱离广大工人群众。许多早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小女

儿爱·马克思——艾威林等人先后退出该组织。一八八九年该同盟终于瓦解。

美国劳工联合会

简称“劳联”，是美国的一个工人贵族组织，成立于一八八六年。它的前身和骨干是一八八一年建立的“美国与加拿大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创始人有赛米尔·龚帕斯等。

劳联是按行业组成的，只吸收熟练工人参加。它在成立初期，虽也曾为争取实现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组织过多次罢工，但其领导权一开始就被以龚帕斯为首的反动工会活动家所把持。他们在劳联中推行放弃革命斗争，实行阶级合作的方针，提出工人应得“公平的工资”，资本家应得“公平的利润”等口号，积极支持政府的反动内外政策，并力图破坏国际和国内的进步工人运动，千方百计地阻挠美国工人政党的建立，从而使劳联成为资产阶级的御用工具。

劳联的领导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积极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战后为破坏国际进步工人运动，于一九一八年成立“泛美劳工联合会”，一九一九年又发起建立黄色的工会中心——“阿姆斯特丹国际”。一九三五年，劳联中的反对派建立了“产业工会委员会”（一九三八年改为“产业工会联合会”，简称“产联”）。一九五五年，两个组织又合并为“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简称“劳联——产联”。

第二国际

是继第一国际后第二个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它是在十

九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工人运动的新高涨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普遍建立，以及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情况下，于一八八九年在巴黎建立的。

国际创立初期，在恩格斯的指导下，在各国党内和国际内积极开展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组织各国的无产阶级队伍，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取得了不朽的成果。但与此同时，第二国际的一些领导人却对右倾机会主义丧失了警惕，而他们本身的右倾情绪也不断滋长。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在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代表“青年派”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放在反对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上面。为此，恩格斯不顾第二国际领导人的阻拦，坚持在一八九一年初公开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接着又再版了《法兰西内战》，并为这本书写了“导言”，六月写成了《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这三本著作集中阐明了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给右倾机会主义以有力的打击。

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后，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分子猖狂地向马克思主义进攻。修正主义在各国党和第二国际内形成了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逆流。在德国党内以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克拉拉·蔡特金等为首的左派对伯恩斯坦之流进行了回击。但是，把持第二国际领导权的考茨基一伙，打出“中派”的旗帜，而实际上包庇伯恩斯坦，暗地支持他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第二国际的领导权逐渐被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所篡夺，从而使第二国际蜕化变质。后来，列宁举起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在国际和俄国国内

领导马克思主义者向修正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参加第二国际的大多数党公开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拥护帝国主义战争，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政党，导致第二国际彻底破产。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一八九三年三月在明斯克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由于被流放西伯利亚而没有参加。大会虽然宣告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但没有把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统一起来，没有规定党纲和党章，也没有统一的中央领导，因此在实际上，当时俄国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一九〇三年七月，先在布鲁塞尔后在伦敦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列宁的领导下，经过斗争通过的党纲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当时第二国际各国党中，这是唯一把无产阶级专政目标列入党纲的革命纲领，是列宁创建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标志，也是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一个重大胜利。在大会上，党内出现了两个政治派别即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一九〇五年四月，全党的大多数组织毅然排除了孟什维克的阻挠，派出代表在伦敦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列宁领导下，大会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路线。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在日内瓦召开了自己的代表会议，制定了机会主义

的策略路线。

一九〇六年四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形式上统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仍然各自保持着原有的观点。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布拉格召开了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在思想上、组织上击溃了孟什维克，并将他们驱逐出党。从此，布尔什维克由一个政治集团正式形成独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

十月革命胜利后，于一九一八年三月在彼得堡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大会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召开的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苏联共产党(布)”。一九五二年十月召开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又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苏联共产党”。

英国独立工党

英国工人运动中一个机会主义政党，一八九三年成立。参加者为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其首领为凯尔·哈第、拉·麦克唐纳等。一九〇〇年英国劳工代表委员会(一九〇六年取名为“工党”)成立后，“独立工党”以团体身份加入。

“独立工党”一成立，就执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路线，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特别是加入工党以后，和工党的其他成分一起，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搞阶级调和，竭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充当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独立工党”以和平主义词句作掩护，推行社会沙文主义。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成立后，在左派党

员的压力下，独立工党的首领通过了退出第二国际的决议。一九二一年加入维也纳国际（第二半国际），在第二半国际瓦解后，又重新加入伯尔尼国际。一九三二年，由于工党内部矛盾，独立工党通过决议，脱离工党，以后日趋衰落，变成了英国克莱河畔地区的一个地方小团体。

列宁曾指出，独立工党“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列宁全集》第29卷，第450页；第18卷，第354页）。

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又名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列宁在一八九五年联合了彼得堡约二十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创立起来的革命组织。它实行集中制原则，并且有严格的纪律。以列宁为首的五人小组对它直接领导。它在各区建立了小组，在工厂设有收集情报和散发文件的组织员，在大企业则建立工人小组。

彼得堡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它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把在少数先进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在无产阶级广大群众中进行政治鼓动。它领导了工人运动，把经济斗争同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该组织的倡导和影响下，莫斯科、基辅等地工人小组也联合组成了这样的协会。这就为建立统一的工人政党打下了基础。

沙皇政府对协会的活动十分恐惧，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逮捕了以列宁为首的大部分领导人。但列宁在狱中仍然领导了协会的工作。他提出各种建议，寄出各种密码信件和

传单，并写了《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等文章。

从一八九八年下半年起，由于列宁等领导人长期流放西伯利亚，协会的领导权被“经济派”所掌握，他们在俄国极力宣扬经济主义和伯恩施坦主义，导致了协会的变质和瓦解。

崩得派

崩得，俄文“бунд”的音译，是立陶宛、波兰、俄罗斯工人总同盟即“犹太社会主义总同盟”的简称，成立于一八九七年，是一个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组织。其成员大半是俄国西部地区犹太手工业者。它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

在一八九八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它加入该党。在一九〇三年的“二大”会议上，它要求承认它是犹太无产者的唯一代表，并根据联邦制原则来建党，其实质是要组织一个独立的犹太党。大会拒绝了这些要求，它就退出了党。在一九〇六年的“四大”，它重新加入党内，但仍然坚持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一九一二年第六次全俄党代表会议终于把它开除出党。

国际社会党执行局

第二国际的常设执行机关。它是根据一九〇〇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的。比利时工人党的右派首领王德威尔得被选为执行局的主席。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二年，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

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名为第二国际的最高组织机关，但没有起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作用，只不过对各国发生的事件进行了搜集和登记而已。列宁称国际执行局只是一个“信箱”。

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领导权后来为修正主义分子所把持。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费边社

英国的一个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改良主义团体。它以善于等待时机，避免决战的拖延战术著称的古罗马将军费边命名。一八八四年创立，成员几乎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主要领导人是肖伯纳、韦伯夫妇、华勒斯等。一九〇〇年英国工党成立后，成为工党的团体成员。

费边社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否认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宣扬用“合法的、和平的手段”，通过国有化、市有化来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社会主义就会“一点一滴地”实行起来。费边社在工人阶级中传播资产阶级影响，是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发源地之一。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列宁全集》第21卷，第237页）。

费边社在第二国际中是最露骨的机会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成为赤裸裸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以后，费边社虽然在形式上仍是工党的一个团体成员，事实上它与工党领导集团已溶为一体。

青年派(德国)

原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个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派别，形成于一九〇〇年左右，其主要成员是一批以理论家和领袖自居的青年作家和大学生，头目为恩斯特。

“青年派”无视“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的变化，反对党利用合法地位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攻击党参加议会斗争是执行机会主义路线；他们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则，进行脱离群众的冒险活动，并且胡说他们的活动原则和恩格斯是“一致的”。

恩格斯严厉地谴责了“青年派”的这种“极端无耻行为”，指出他们的理论和观点，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策略是断送党的一切事业的策略，他们的实践是毁灭党的实践。恩格斯为挽救和教育“青年派”的某些成员，诚恳地告诫他们要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实践，首先要当一名普通战士，虚心向工人学习，然后才能有些作为。

经过恩格斯的批评和帮助，“青年派”中的一部分人改正了错误，而以恩斯特为首的另一部分人则继续顽固地坚持其错误观点，在一八九一年的爱尔福特大会上，拒绝服从党的决议，而被开除出党。不久，这些人完全滚到了无政府主义方面，从而在党内的影响也逐渐消失了。

英国工党

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政党。一九〇〇年以“劳工代表委员会”名义成立，一九〇六年定名为工党。开始是由一些行业工会和独立工党、社会民主联盟、费边社等

团体联合而成，后来逐渐吸收了一些个别党员。早期的首领为凯尔·哈第、阿瑟·韩德逊、拉姆齐·麦克唐纳等。

工党的上层领导人奉行改良主义政策，抹煞阶级斗争，主张调和劳资矛盾，实行阶级合作，以此来麻痹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服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其首领们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支持政府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战后加入伯尔尼黄色国际。

工党自一九二四年到现在，已五次上台执政，它和保守党轮流充当巩固和加强英国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

工党的基层虽然绝大多数是工人，但领导权却掌握在工人贵族手中。因此，工党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政党。

美国社会党

美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改良主义政党，成立于一九〇一年。它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反德里昂派和一八九七年成立的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的。利昂·格林鲍姆当选为书记。

该党虽然和工人运动保持了比较密切的联系，但仍然是一个机会主义政党。它反对暴力革命，把议会斗争和争取选票作为唯一的斗争方式。在美国工运左、右两派的斗争中，采取“不干涉”政策，实际上是支持了右倾机会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的右翼多数为帝国主义辩护，并支持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左翼少数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一九一九年该党发生分裂，左翼退出社会党，发起建立美国共产党。

经济派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俄国工人运动内部出现的机会主义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克里切夫斯基、马尔丁诺夫、普罗柯波维奇等，主要刊物有《工人事业》杂志和《工人思想报》。

经济派打着反对“教条主义”、“批评自由”的旗号，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理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它公开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认为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与工厂主进行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工资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则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事。它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贬低和轻视革命理论的作用，认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可以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它否认建立一个统一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性，鼓吹涣散性和小组习气，企图把党引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它大量翻印伯恩施坦的著作，声称伯恩施坦主义的出现是工人运动发展的“最合逻辑的进程”，伯恩施坦也得意地宣布，经济派的观点同他是一致的。

列宁在反对经济派的斗争中，于一九〇二年写了重要著作《怎么办？》，彻底揭露了它的反动实质，指出它所宣扬的经济主义是伯恩施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经过三年的斗争，终于粉碎了这一机会主义流派。

社会革命党

一九〇二年初由俄国几个仇视马克思主义的民粹派小组和集团组成。开始是作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出现的，后来成为代表富农利益的反革命组织，其首领有切尔诺夫、克伦斯

基等。

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混合物。列宁指出，社会革命党人“竭力用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时髦‘批评’的补丁来修补民粹主义的破洞。”（见《列宁全集》第9卷，第295页）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革命时期，该党同自由资产阶级百般妥协，帮助沙皇欺骗工农，引诱群众脱离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它同孟什维克一起窃取了工兵苏维埃的领导权。他们认为革命已经完结，当时的任务只是转上“正常的”宪制的轨道。经过密谋之后，克伦斯基等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这个政府被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推翻。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成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阴谋集团与武装叛乱的组织者，后被苏维埃政权所粉碎。

布尔什维克

俄文“Большевик”的音译，即多数派的意思。在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领导的革命派和马尔托夫为首的机会主义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时，拥护列宁的一派获得了多数，称为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派退居少数，称为孟什维克。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体系，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列宁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一九〇三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产生的。”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

党的“二大”以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已分裂，但在组织上仍然在一个社会民主工党内。直到一九一二年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把孟什维克清除出党后，

才组成了布尔什维克的独立政党。

孟什维克

俄文“Меньшевики”的音译，即少数派的意思。它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有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策烈铁里、波特列索夫等。

“二大”后，孟什维克的首领们进行了分裂活动。一九〇五年革命时，它反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反对工农联盟和武装起义。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孟什维克发生了分裂，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少数人成了“护党派”，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多数人屈服于反动恐怖，主张用合法的团体来代替党，否认建立秘密党的必要，因此被称为“取消派”。一九一二年，孟什维克被驱逐出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孟什维克依附于各资产阶级派别，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它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它公开号召推翻苏维埃政权，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

世界产业工人联盟

美国的工会组织，于一九〇五年在芝加哥建立。开始的领导人为尤金·德布斯、比尔·海伍德、丹尼尔·德利昂等。

该组织与劳联不同，是按产业部门建立的职工会，主要吸收非熟练工人参加。它在美国工人运动中坚决反对劳联领导集团的反动政策，曾多次领导美国工人的罢工斗争，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它的一些领导人热烈欢迎俄国十月革命。

但是，该组织的活动带有显著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特点，不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否认通过武装起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该组织的领导人带有严重的宗派情绪，脱离广大工人群众。该组织后来蜕变为一个对工人不起任何作用的宗派主义的无政府工团集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渐消声匿迹。

取消派

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出现的孟什维克极端右倾机会主义派别。代表人物有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唐恩等。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革命暂时转入低潮，布尔什维克主张不仅要利用一切公开机会进行斗争，而且要利用合法形式来掩护党的秘密组织，保存党的力量，发展革命队伍。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路线，他们企图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只限于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甚至不惜以公然放弃党的纲领为代价，换得斯托雷平政府对冒牌“工人党”存在的允许，所以“取消派”又称为“斯托雷平工党”。

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巴黎召开第五次全俄代表会议。根据列宁提议，会议斥责了“取消派”，指出“取消派”实质上是自由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会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把秘密工作与合法工作结合起来，彻底粉碎了“取消派”。一九一二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把“取消派”分子清除出党。

立宪民主党

俄国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成立于一九〇五年十月，首

领为米留可夫。

该党以反对君主制、成立一个立宪国家为幌子，而力图保持沙皇制度，因此实际上是一伙十足的保皇党人。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明显地暴露出它的反革命面目。它代表资产阶级感谢沙皇镇压了革命，献媚地说：“因为只有政府才用刺刀和牢狱来替我们挡开人民的横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积极支持沙皇把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到底。二月革命后，它领导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外听命于英美帝国主义，继续拖延帝国主义战争；对内残酷镇压布尔什维克和工农群众。十月革命后，它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多次组织反革命暴动，反对苏维埃政权。

召回派

又称“左派”布尔什维克，是一九〇六年俄国革命低潮时期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产生的“左”倾机会主义派别。代表人物有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沙皇政府残酷镇压工农群众，出现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这时，布尔什维克中一些不坚定分子，对革命产生了严重的动摇。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集团，反对合法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列宁路线。他们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宣称只有走上街垒的人才是革命者，而留在国家杜马中的人不配为革命者。他们要布尔什维克拒绝在工会和其他合法团体中进行工作，并从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因而被称为召回派。如果党按召回派的主张去做，势必脱离工人群众，丧失同广大群众的联系，使秘密组织失去合法工作的掩护，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害。所以，召回派实际

上是“变相的取消派”。

一九〇九年，召回派被清除出布尔什维克。

人民社会党

一九〇六年成立的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由社会革命党分裂出来的右翼分子组成，首领是彼舍霍诺夫、米雅柯金、安年斯基等人。

该党提出了不超出君主立宪制范围的温和的民主要求，拒绝接受社会革命党关于土地社会化的纲领性原则，主张以赎买的办法征收地主的土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投入反革命阵营。

列宁称人民社会党人是“市侩机会主义者”、“社会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

劳动派

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一九〇六年四月由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农民代表组成。劳动派党团在所有四届国家杜马中都存在。

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地方和城市的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他们的土地纲领是根据民粹主义的土地平均使用制的原则制定的，即用官地、皇族土地、寺院土地以及私有土地（如果占有的面积超过了规定的劳动土地份额）组成全民土地；只许耕者本人享有土地的使用权。对出让的私有土地规定给予报酬。由地方农民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采取了沙文主义的立场。

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后，他们同人民社会党一起投入反革命阵营。

英国社会党

一九一一年由社会主义联盟和独立工党左派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团体组合而成。该党曾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进行宣传 and 鼓动，但由于有宗派主义情绪，脱离群众，党员人数逐渐减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党内出现两派：一是以海德门为首的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派；一是以河·英克平和费·罗特施坦等人为首的国际主义派。一九一六年四月该党发生分裂。海德门及其拥护者占少数，他们退出该党，另组“国家社会党”（后又改名“社会主义联盟”）。国际主义派在一九二〇年和其他左翼团体组成英国共产党。

八月联盟

托洛茨基基于一九一二年八月在维也纳组成的反党联盟。这个反党联盟在一切基本问题上都采取了取消主义的立场，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主张“取消”秘密的党组织，反对布尔什维克关于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的革命口号和策略。列宁揭露了这个联盟的机会主义实质，并成立了由主张保卫和巩固秘密党组织的分子所组成的护党联盟。不久八月联盟即分崩离析，于一九一四年瓦解。

斯巴达克联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一个

革命团体，一九一六年一月成立，以古罗马奴隶起义领袖斯巴达克命名。其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等。

斯巴达克联盟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左派，它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在群众中积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宣传，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并对第二国际中机会主义者的叛卖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列宁指出：“斯巴达克派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系统的革命宣传工作，真正地拯救了德国社会主义和德国无产阶级的荣誉。”（《列宁给斯巴达克派成员》，《列宁全集》第23卷，第202页）但斯巴达克派在理论上和政策上也犯了一些错误。

一九一七年四月，斯巴达克联盟加入德国折衷主义派成立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在组织上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后，斯巴达克联盟与独立社会民主党断绝了关系，并于同年十二月成立了德国共产党。

“左派”共产主义者

一九一八年初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反对列宁路线的反党集团。其首领是布哈林、拉狄克、皮达可夫，他们都是托洛茨基的帮手。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坚决主张与德国签订和约，以便赢得时间，整顿国家经济，建立红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左派”共产主义者却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反对签订和约。他们还对党进行诽谤，竭力分裂党，瓦解党的队伍，并以辞去党和苏维埃的领导职务来要挟党。列宁把他们称为“帝国主义进行挑衅的工具”。

为了解决签订和约问题并粉碎“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党反人民的活动，布尔什维克党于一九一八年三月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确认列宁在解决和约问题上的路线是正确的，并批准苏维埃政府与德国签订的和约。“左派”共产主义者遭到了失败。

民主集中派

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由原来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有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和斯米尔诺夫等。

这个集团力图破坏党在苏维埃和职工会中的领导作用，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在工业部门实行一长制和厂长个人负责制，反对组织问题上的列宁路线，要求党内有组织派别和集团的自由。列宁称他们为“叫喊得最响亮”的派别组织，把他们的纲领称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纲领。

俄国共产党(布)第八、九、十次代表大会都批判了民主集中派。一九二七年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将这个反党集团的分子开除出党。

第三国际

即共产国际，是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联合组织。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六日，在列宁的领导下，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国际的成立。参加大会的有三十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左派组织的五十四名代表和一些国家(包括中国)的观察员。列宁在大会上作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经大会通过作为

共产国际的政治纲领。大会发表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号召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赢得工人阶级的政权而进行坚决的斗争。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为代表大会，各国共产党则是它的支部。它从成立到解散一共召开了七次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的建立，标志着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彻底破产，并使世界无产阶级有了团结的中心和革命的战斗司令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页）共产国际总的来说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帮助各国先进工人组织了自己的政党，支持了社会主义苏联，百折不挠地进行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援助了东方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也曾获得共产国际的帮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鉴于当时各国内部和国际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原来的这个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斗争的需要。同时考虑到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为了迅速和有效地组织一切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这一决议为各国共产党一致批准。

伯尔尼国际

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二国际”，也称“黄色国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右翼社会党人为了破坏在十月革命影响下蓬勃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召开会议，恢复第二国际。以后的国际被称为“伯尔尼国际”。

“伯尔尼国际”是一个完全由工人贵族、社会主义叛徒把持的国际，在会上通过了一个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维护资产阶级民主，支持帝国主义侵略工具——国际联盟的决议。列宁说它是“黄色的、背叛的、变节的国际”，“实际上是一个国际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组织”。

一九二三年五月，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在汉堡举行合并会议，合并后的第二国际称“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个组织已基本瓦解。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又在英国工党和美国劳联、产联的发起下，一些国家的右翼社会党人成立了“国际社会主义会议委员会”，并于一九五一年组成“社会党国际”，直至今日。

军事反对派

一九一九年三月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出现的在军事问题上反对列宁路线的派别。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先前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也有从未参加过任何反对派，但对托洛茨基在军队中的领导表示不满的人。

“军事反对派”虽然反对托洛茨基崇拜沙皇军队的军事专家，反对他藐视和仇恨军队中老布尔什维克干部的行为，但他们的许多观点却是错误的，如赞成军队中游击主义的残余，反对建立正规红军，反对利用资产阶级军事专家，认为军队不需要铁的纪律等。列宁、斯大林同这个派别进行了严肃的斗争。斯大林指出：“要就是我们创造起真正是工农的，主要是农民的，有严格纪律的军队而把共和国保持住，要就是我们陷于灭亡。”(转引自《苏联共产党(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10页)

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否决了“军事反对派”提出的许多错误

意见，同时也给了托洛茨基一个打击。大会要求改善中央军事机关的工作，并加强共产党员在军队中的作用，从而使红军更加巩固和发展壮大。

国际联盟

又称国际联合会，简称国联，一九二〇年一月十日成立，先后参加的有六十一个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近结束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倡议成立国联，企图通过它来瓜分战败国的殖民地，抵制英法签订的瓜分世界的秘密协定。但国联成立后，大权实际上仍操在英法手中，美国因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拒绝参加。国联以委任统治的方式，对殖民地进行了帝国主义再分割。它将社会主义苏联排斥在外，企图使国联成为帝国主义反苏大本营。它对日、德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纵容包庇，企图将法西斯侵略矛头引向苏联。在国际局势紧张关头，苏联为了利用一切场所进行保卫和平的斗争，于一九三四年九月参加了国联。苏联在国联中坚决主张集体谴责和制裁侵略者，并揭露意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亚的罪行。

国联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员国大会，并设有行政院、秘书处、国际常设法庭、国际劳工局等机构，总部设在日内瓦。

由于日、德、意等国的相继退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联就无形中解体，一九四六年正式宣布解散。

工人反对派

一九二〇年下半年在俄国共产党(布)党内形成的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反党集团，首领是施略普尼可夫、梅维捷夫

和柯伦太等。

这个反党集团否认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认为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是职工会。他们还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把职工会与苏维埃国家及党对立起来，提出要把全部国民经济管理事业交给“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的荒谬口号。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论我们党内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批判了“工人反对派”，认为宣传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是共产党员所不能容忍的事，并号召全党同这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该派被粉碎后，其残余分子投靠了托洛茨基集团。

第二半国际

即“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又名“维也纳国际”。一九二一年二月，由原第二国际内中派(考茨基派)的十三个社会党和组织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会成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头目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被选为总书记。因该组织标榜站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故被称为第二半国际。

该组织的建立，是考茨基分子在革命高潮时，欺骗各国工人群众、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阻止在十月革命影响下觉悟普遍提高的各国工人阶级转向共产国际方面来的一种手段。该组织的首领们在高喊保卫俄国革命，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恶毒攻击苏维埃政权，破坏、分裂工人阶级队伍，支持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反对共产国际为建立统一战线的各项措施。它和伯尔尼黄色国际是一丘之貉。一九二三年，当革命低潮来临时，便与伯尔尼国际合并。

托季联盟

一九二六年夏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结成的反党联盟，主要成员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

托季联盟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前夕，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及其它几个城市中的工厂党员大会上搞突然袭击，企图强迫党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新的争论。他们建立秘密印刷所，在自己的同伙中征收党费，进行分裂党的罪恶活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召开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和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扩大会议，都讨论了托季联盟问题，并在决议中痛斥了这个联盟。

一九二七年，托季联盟又抛出一个所谓“八十三人政纲”。他们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在口头上同意遵守党的决议，主张党的统一，赞成工业化和集体农庄运动。但在事实上却一再违背党的决议，破坏党的统一，成立反列宁主义的秘密党，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破坏工农联盟。同年十月，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宣布了全党的争论，通过大辩论，投票赞成党中央政策的有七十二万四千党员。赞成托季联盟的只有四千党员。十一月十四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开除出党。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批准了上述决议，并决定把托季联盟中的其他主要成员拉狄克、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加米涅夫等开除出党，宣告了托季联盟的崩溃。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为交换经验和协同行动而成立的联合机构。

一九四七年九月，欧洲九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在波兰西部斯科利阿斯卡·波伦巴的小温泉场举行了会议。考虑到战后的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各国党之间有交换经验和协同行动的必要时，与会各国党取得了下列协议：

一、设立情报局，由南斯拉夫共产党、保加利亚工人党、罗马尼亚工人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波兰统一工人党、苏联共产党（布）、法国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组成。

二、情报局的任务为组织经验交流，并在必要时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协调各个党的活动。

三、情报局由各个党的中央委员会派代表两名组成，代表的任命和调换均由各个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

四、情报局将创办一机关报，初为半月刊，后改为周刊。机关报将以法文、俄文，如果可能并以其它文字同时出版。

五、情报局设在贝尔格莱德。

一九四八年一月中旬所召开的情报局会议，讨论了关于建立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报的常设编辑委员会的问题。

情报局于一九五六年四月结束其活动。

(四)

科学社会主义

也称科学共产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它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重要科学原理的基础之上的，其思想来源是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一词，就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区分而使用的。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共同组成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体系。

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也就是关于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规律的科学。它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阐明了无产阶级只有组织起自己的政党，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通过暴力革命，彻底打碎反动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后消灭一切阶级和剥削，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最终获得彻底解放等基本原理。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在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列宁在帝国

主义阶段，继承、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内容，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或几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論，把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进一步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德国古典哲学

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它是资产阶级哲学的最高发展。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开始，经过费希特和谢林，到黑格尔，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最终体系”。他们的哲学都是唯心主义的，但在不同程度上阐述了辩证法。后来，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巴哈，冲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个代表。

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万物的起因，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它派生出来的。但是，在其唯心主义体系中，他第一次表述了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他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都看成一个不断运动和发展的过程，并企图揭示这些运动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

费尔巴哈的主要功绩就是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他肯定自然界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客观存在；人是自然的产物；人能认识物质世界和客观规律。他把批判唯心主义同批判宗教联系起来，指出唯心主义是宗教的理论基础。但由于他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立场，不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因而他的哲学仍然没有摆脱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机械性和唯心史观的缺陷。

德国古典哲学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向往革命而又怯懦的阶级特性。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他们的合理部分，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进步阶段。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英国，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经济自由，反对封建制度。其创始人是英国的威廉·配第，其体系的建立者是亚当·斯密，最后完成者是大卫·李嘉图。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大的功绩，就是创立了在资产阶级的眼界内所能达到的劳动价值论，即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亚当·斯密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和价值的尺度。大卫·李嘉图则进一步认为：“物品的价值的增加或减少是按照耗费在物品中的劳动的增加或减少而定的”。但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局限性，他们的劳动价值论是不彻底的。亚当·斯密把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和生产这种商品的工人所必需的“生产维持费”（即工资）混淆起来，错误地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工资确定的。大卫·李嘉图虽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耗费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但也不知道劳动力与劳动之间的差别。他把劳动看作具有价值的商品，这就不能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作出一个正确的解释，因而他们都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性。相反，他们都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永恒的、万古长青的东西。

西。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它的合理部分，确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空想社会主义，

在科学社会主义产生前出现的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客观上反映无产者的要求，幻想建立美好社会的学说。它出现于十六世纪，创始人是莫尔。十八世纪有以摩莱里、马布利、巴贝夫为代表的空想共产主义。十九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

空想社会主义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它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雇佣劳动、产品分配等种种罪恶，抨击了这个社会的全部基础，为启发工人觉悟程度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材料；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如消灭私人经营、消灭雇佣劳动、消灭城乡对立和工农差别、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实行有计划的生产，把国家变成纯粹管理的机构，即废除国家，主张妇女解放，等等，都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对立的社会。这些对未来社会的卓越的预见，为马克思、恩格斯提供了思想资料，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

空想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之上的，它的错误在于：只看到无产阶级是受苦最深的阶级，看不到无产阶级是一个不仅能解放自己，而且也能解放全人类的最革命最伟大的阶级；幻想依靠统治阶级的帮助实现社会主义，以为

只要统治阶级认识了他们的社会主义体系，就会帮助自己实现美好社会的美好计划；它不了解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反对搞阶级斗争，特别是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企图通过小型试验，来显示共产主义的优越性，鼓吹通过和平途径过渡到理想社会。

空想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还很不发展的反映。正如恩格斯所说：“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9页）随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愈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并日益成为阻碍工人运动发展的障碍。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门徒们仍旧死抱住先师们的那一套空想教条不放，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活动，就完全堕落成为一伙反动的宗派主义分子。

空想共产主义

指十八世纪中期以法国摩莱里、马布利等人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因它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要求建立不仅消灭阶级特权，而且也消灭阶级差别的理想社会，故把它称作空想共产主义。空想共产主义的特点是主张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主义和压低消费水平的禁欲主义，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

空想共产主义也泛指主张消灭私有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斯巴达式共产主义

一种主张实行苦修苦练、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平均共产主义。

斯巴达是古希腊一个奴隶制国家，位于希腊半岛南部。在这个国家里，斯巴达人是奴隶主，被它征服的希洛人和庇里阿西人全是奴隶。斯巴达人内部是平等的，奴隶是他们的公共财产；土地分成等量的地块平均分配给斯巴达公民，并禁止买卖或再分割成小块；为了不让私人积蓄财富，曾经用极其笨重的铁币代替银币，使其贮存困难；命令只能使用最简单的工具来建造房屋等。斯巴达人不参加劳动，长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男子从达到成年并取得公民权利的时候起，就被编入军队并一直到年老。他们都住在军营里，禁绝一切生活享受，苦练军事技术，集体食宿，武器和服装都是一个式样，甚至讲话都非常简洁和不连贯，象军队口令一样。他们组成一种异族人无权参加的、军事性质的所谓“平等人公社”。

斯巴达式共产主义主要是指十八世纪法国摩莱里和马布利等人的平均共产主义，他们主张消灭阶级差别，实行财产公有制，并把反对奢侈、主张节欲作为改造社会的主要措施。他们把斯巴达人的“平等人公社”当成自己的理想蓝图，因此被称为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

魏特林主义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产生于德国的一种空想的平均共产主义。当时德国阶级矛盾尖锐，工人运动日趋

高涨，在欧洲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下，德国出现了一批共产主义者，他们要求财产公有，主张以平等要求为依据的共产主义。魏特林为其主要代表，其他还有沙佩尔、亨·利希、鲍威尔、约瑟夫·莫尔等。

魏特林在他的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平均共产主义观点。一方面，他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认为“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资产阶级是“人类之敌”。另一方面，他主张实现“共有共享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里，必须“把一切凡是受到社会供养和维持的人的生活地位作一律平等的安排。一切人没有第一和最末的区别”。因而他竭力主张消灭私有制，实现财产共有，解放劳苦大众。共同劳动，待遇平等，平均领取生活必需品，这种绝对平等的观点，是魏特林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

魏特林主义曾是“正义者同盟”的政治和思想纲领，在工人运动中曾起过一定作用。马克思对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也给予较高的评价，称之为德国工人史无前例的处女作。但魏特林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是根本对立的。在理论方面，它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不了解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的客观规律。因此，它理想的“共有共享制社会”是空想的；在实践方面，他不是引导无产阶级为争取解放而斗争，而是搞兴办集体食堂等空想的试验；在策略方面，他不是依靠无产阶级，而是依靠小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依靠少数人的暴动，立刻实现共产主义，并反对德国无产阶级支持当时的民主革命。魏特林主义这种理论和策略，日益成为工人运动发展的障碍。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起，魏特林主义在工人运

动中逐渐失去了影响。

封建社会主义

代表没落封建贵族利益的反动社会主义思潮。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流行于法、英等国。主要代表有法国正统派维尔纽夫——巴热尔蒙(1784—1850)伯爵，英国有“青年英国”这一反动政客文人集团首领迪斯里(1804—1881)公爵。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英两国封建贵族又一次被资产阶级所打败，再也没有力量进行大规模的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于是他们改变手法，想借助工人的力量，以同情工人的面目出现，挂起“社会主义”招牌，进行文字斗争。封建社会主义指责资本主义造成贫富对立，道德败坏等，并低声细语地说了一些资本主义是人类末日之类的凶险预言进行恫吓；它伪装维护工人利益，指责资本主义使劳动者贫困；但却力图证明封建剥削比资本主义剥削好，工人状况的恶化是因为封建王朝被推翻的缘故；它美化封建制度，胡说专制政权会“拯救世界”和把社会导向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控告资产阶级的主要罪状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下产生了一个将整个旧制度炸毁的革命无产阶级，这充分暴露了它们反对资产阶级的目的是害怕、仇恨无产阶级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他们在政治上总是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帮凶，在经济上则违背自己的那一套“社会主义”的言词，搞资本主义经营，参与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总之，封建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妄图倒转历史车轮，梦想复辟封建制度。

基督教社会主义

也称僧侣社会主义，它是和封建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一路货。主要流行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法等国。

在英国，它和“青年英国”是同时代产物。从一八四四年开始活动，一八五四年逐渐消失。主要代表人物是神学家莫里斯和金斯莱。他们宣扬人类追求物质和肉体的欲望是罪恶和痛苦的根源，人们只有克制这种欲望，才能摆脱灾难。因此它激烈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国家强力。他们批评资本主义的“贱买贵卖”违反了基督教的教义原则，又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国家的工作而是基督教的工作。因此，主张在基督教之下建立一个“互爱”、“合作”和“没有人有权利把任何东西据为己有”的富有活力的社团。他们反对英国宪章运动，说什么宪章派企图用魔鬼的工具来从事上帝的工作，等等。

在法国，其代表人物有拉梅耐、毕舍等人。他们把基督教说成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宗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学说。一八三四年拉梅耐所写《信徒的话》一书，抨击当时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用“劳工获得了选举权，就能主宰世界”的说教来代替革命斗争，而毕舍则在其创办的《作坊》杂志上，宣扬国家帮助建立工人生产合作社以引诱法国工人脱离阶级斗争。

总之，基督教社会主义不过是披上宗教外衣，涂上了一层神圣色彩的封建社会主义。

“真正的”社会主义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广泛流行于德国知识分子中间的一种

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是：卡尔·格律恩（1817—1887）、莫·赫斯（1812—1875）、海·克利盖（1820—1850）等。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刚刚开始，小资产阶级害怕资产阶级的发展和革命无产阶级的兴起，妄图保存自己的小生产者的地位。于是代表小市民利益的一些德国著作者们便将法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文献搬到德国，并同德国的唯心主义、人道主义的哲学词句调和起来。他们自己把它称之为“超阶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真正的”社会主义咒骂资本主义是一种罪恶，因它使小生产者破产；他们把宗法的小土地私有制理想化，主张用无代价地分给贫困者以小块土地的办法来消灭地租，认为解决矛盾的唯一出路在于把无产阶级变为小生产者。他们恶毒咒骂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向广大人民宣扬，说什么在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他们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抹煞阶级矛盾，反对革命的政治斗争，宣扬人类不分阶级、彼此相爱的超阶级的人道主义，把“爱”奉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万应灵药。格律恩说：“在任何情况下，只有人道主义的世界观才能开辟通向人类未来生活的道路”。赫斯认为，如果人们不通过爱结合起来就“只能更加猛烈地相互剥削和吞食”，“共产主义就是应用于社会生活的爱的生活规律”等等。

“真正的”社会主义为了挽救小资产阶级的灭亡，保存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既反对资产阶级革命，又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起着一箭双雕的反动作用。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又称保守的社会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一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

十九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在欧洲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在英法等主要国家取得了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充分暴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激化。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于是，产生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作。蒲鲁东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商品交换是任何社会永恒不变的基础；资本主义制度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好的”，由此带来的贫困是“坏的”。他主张保存“好的”方面；用和平的、改良的方法消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这就是要资本主义的生存条件即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剥削雇佣劳动，不要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经济危机；要资本主义制度，不要由社会生产力和无产阶级的发展这些使社会发生革命和解体的因素；要剥削雇佣劳动的资产阶级，不要革命的无产阶级，并力图使工人相信，只要进行一些物质生活条件方面的点滴改良如举办各种慈善事业，成立什么济贫所、劳动阶级福利会、工厂互助会等，就能使工人摆脱贫困。从而诱骗无产阶级放弃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以保存资本主义。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质正是在于既希望保全现代社会一切祸害的基础，同时又希望消除这些祸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94页）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资本主义，企图恢复封建行会制度或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为瑞士籍法国人西斯蒙第(1873—1842)。

十九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大批小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日益分化和破产，于是，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就随之产生。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用小资产阶级的尺度，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但他们并不了解资本主义矛盾的实质，认为这个矛盾是大生产造成的，因此反对大生产，主张倒退到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把社会一切人员变成小生产者，建立起一个小生产者的社会。他们认为这是可以避免两极分化的、最理想的社会。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竭力掩盖阶级矛盾，呼吁资产阶级政府来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尽管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一些矛盾，但不懂得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企图用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他们反对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而主张用小生产经济代替资本主义大生产。这既是反动的，又是空想的。这就决定了这一思潮在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一种怯懦的悲叹。

庸俗社会主义

出现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法、英等国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它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种宣扬分配决定论，否定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反动思潮。其代表

人物有法国的蒲鲁东、路易·勃朗和英国的威廉·汤普逊等人。

庸俗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分配看作是事物的本质，把斗争的目标和重点放在分配问题上，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如蒲鲁东渴望在所谓“永恒公平”的社会里，每个人应当用自己的产品换得“自己劳动的十足收入”，“自己劳动的十足价值”。路易·勃朗幻想在资产阶级国家帮助下组织起来的“国民工厂”里，在工人集体管理下，实行收入平均分配。汤普逊认为，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是不等价的，工人只得到自己的劳动产品的一部分，但也只主张改变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来实现工人获得自己的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

庸俗社会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它不懂得分配是由生产所决定，不懂得消费资料的分配取决于生产资料的分配，从而否定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起着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

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

指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英法等国出现的庸俗社会主义。其代表人物主要是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门徒，在法国有圣西门主义者勒鲁（1797—1871）、傅立叶主义者孔西德朗（1808—1893），在英国欧文主义者布雷（1809—1895）等，他们都是经济学家。此外还有许多站在工人运动之外的各种庸俗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却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他们不但没有根据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发展，把三大空想社

会主义者的学说推向前进，相反的把它庸俗化。他们把空想社会主义各学派创始人的各种不同观点和意见拼凑起来，成为一种色调复杂的混合物，变成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他们继续宣扬脱离现实的空想计划，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社会主义。因此，他们不得不求助于资产阶级的善心和钱袋。他们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阶级矛盾，极力反对工人阶级的一切政治运动。这些庸俗的社会主义者，随着历史的发展，便逐渐堕落到反动的或保守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一伙中去了。

布朗基主义

十九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以路易·布朗基(1805—1881)为首的一个社会主义流派。主张进行政治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行革命专政，以摆脱资本主义制度。但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工人革命政党的必要性，不考虑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和客观形势，幻想依靠少数革命家的密谋活动来制造革命，建立少数人的专政，一步就跳到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布朗基主义者英勇革命精神都有很高的评价，认为布朗基是杰出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同时又尖锐地批评他的宗派主义立场及冒险主义策略。

波拿巴主义

是大资产阶级依靠暴力和欺骗进行统治的一种形式。产生于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波拿巴·拿破仑统治时期。在拿破仑第三(路易·波拿巴)统治时期，得到进一步发

展。波拿巴主义是在君主制丧失了旧有的宗法制或封建制的牢靠支柱以后产生的。专制君主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采取了顺风转舵的手段和策略，玩弄政治手腕，搞阴谋诡计，竭力维持各阶级各政治集团的平衡以防止跌倒；卖尽笑脸、实行收买、进行讨好，以便统治；同社会渣滓、同公开的小偷和骗子讲交情以便利用他们的力量同刺刀相结合作为自己的工具。波拿巴主义的特征是以军阀为首领，以“超阶级”“超党派”为幌子，以顺风转舵和轻诺寡信的方式，以军队、警察、官僚、教会为工具实行阶级镇压和民族侵略政策。以后，波拿巴主义成为各国资产阶级所惯用的统治方法，在一定阶段成为反革命统治的主要形式。

蒲鲁东主义

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法国。曾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里风行一时，流毒甚广。其创始人是蒲鲁东。托伦、利穆津、米尔伯格等，都是他的忠实继承者。

蒲鲁东主义宣扬反动的英雄史观，否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蒲鲁东把自己打扮成“超人”的“社会天才”，宣称他的著作“只要被人阅读，旧社会就从此完蛋”。人民群众不过是供他们使用的工具。

蒲鲁东主义从抽象的、超阶级的“自由”、“平等”、“独立”观出发，把维护小私有作为他们终身奋斗的目标。蒲鲁东认为，共产主义要消灭包括小私有制在内的一切私有制，这就会使小生产者丧失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又会造成贫富不均，违反平等的原则。他杜撰了一个

超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即以个人所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企图用小私有制的普遍化来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把社会一切成员都变成小资产者和小农。

蒲鲁东主义反对工人罢工、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一切政治行动，认为用文火把私有制烧掉“比实行暴力革命”要好。他们鼓吹建立交换银行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途径。交换银行对工人发放无息贷款，协助工人建立合作社、作坊或小工厂，收购一切产品，发给劳动者一种证券，作为劳动货币。生产者可以凭这种证券进行直接的“平等的”的交换，以避免商业资本的中间剥削，从而取得自己所需要的其它商品。这样，既可挽救濒于破产的小生产者，又可以为无产者购买工具、原料进行独立生产创造条件，“美妙”的“互助制”社会就实现了。

蒲鲁东主义鼓吹无政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认为国家是由家长制传统和宗教思想产生的，就其原则的本质而言是反革命的，“政权是暴政工具和堡垒，而政党则是它的生命和思想。”他的口号是：“打倒政党、打倒政府、要求人和公民的充分自由”。他还从反对国家进而反对工业管理，反对一切权威，即任何形式的“统治与服从”。

蒲鲁东主义集中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打击下摆脱破产命运的心理和愿望。恩格斯指出：“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厌恶工业革命，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蒸汽机、纺织机以及其它一切伤脑筋的东西统统抛弃，而返回到旧日的可靠的手工劳动上去。”“如果这个蒲鲁东主义的反革命一般真能实现，世界是要灭亡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9—480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的贫困》、《论住宅问题》等著作中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同蒲鲁东主义者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巴黎公社后，蒲鲁东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基本消失。

工联主义

也叫工会主义，是十九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因首先在英国工人联合会(简称工联)中泛滥而得名。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齐治·奥哲尔、亚历山大·麦克唐纳、托马斯·伯特等。

欧洲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失败和英国宪章运动的衰落，曾一度使英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对外侵略扩张，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加剧，工人运动也日趋高涨。英国资产阶级用它从垄断市场和广大殖民地榨取来的大量超额利润中的一小部分，收买熟练工人和工会官僚，培植工人贵族阶层，以改良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毒害工人群众，阻止他们的觉醒，破坏并控制工人运动。工联主义正是英国资产阶级这种政策的产物。

工联主义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把工人运动局限在狭隘的经济斗争范围内。它认为工人运动的唯一目标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同工厂主进行经济斗争，争取减少工人劳动时间，增加工人工资。它的信条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工联主义主张阶级调和，散布改良主义幻想，认为实现改善工人处境的根本手段是合法的和平谈判，争取签订劳资协议，颁布劳动立法，以达到劳资两

利。它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劝告工人要“公平和克制自己”，要避免残酷的阶级斗争。工联主义还支持殖民主义的政策，反对民族解放运动，认为要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必须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沙文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

工联主义代表了少数工人贵族的利益。恩格斯指出，它“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7页）正是由于工联主义的统治，使英国工人运动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拉萨尔主义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德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创始者和主要代表人物为拉萨尔、贝尔克、施韦泽、哈赛尔曼、哈森克莱维尔等均为其忠实信徒。

拉萨尔主义是德国无产阶级同地主资产阶级日益尖锐的矛盾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反映，是普鲁士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反动政策的产物。拉萨尔主义否认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特别否认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露骨地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它宣扬超阶级的国家观，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把“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方案，企图用争取普选权的议会斗争来代替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主张用“自由的人民国家”来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兜售分配决定论，否定消灭地主资本家所有制的必要，提出了“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的谬论，把“公平分配”、“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庸俗分配观点作为革命的最终目的。它还根据马尔萨斯人口论，提出了一个“铁的工资规律”，说工人所得到的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最低的生活限度，即维护工人生存和生殖所必需的限度上，把无产阶级贫困的原因归于人口的自然繁殖，而不是资本家剥削的结果。拉萨尔主义混淆敌我界限，说除工人阶级外，其他所有的阶级都是“反动的一帮”。它还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工人运动看作是“宗派的运动”。

由普鲁士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和争取普选权来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是拉萨尔主义的核心。马克思指出，拉萨尔主义所鼓吹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88页）拉萨尔主义一度在德国工人中影响很大，成为工人运动的主要障碍。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帮助爱森纳赫派同拉萨尔主义展开积极斗争，并在《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给予毁灭性的批判。

国家社会主义

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出现的一种企图依靠资产阶级甚至封建专制国家权力进行社会改良的极端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罗贝尔图（1805—1875）、瓦格涅尔（1838—1917）和拉萨尔。国家社会主义抹煞国家的阶级性，反对无产阶级用革命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鼓吹依靠“国家的帮助”来建立工人生产合作社，逐步使土地和资本国有化，并通过社会改革而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从广义上来说，这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

产阶级专政，主张在维持资本主义的前提下，企图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来调和劳资关系，以谋求工人生活局部改善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都可称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如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甚至于现代各国的社会改良主义。总之，国家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巩固和加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为混淆视听，欺骗工人阶级，也打起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号，并把法西斯党称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最反动的纳粹主义和纳粹党。

巴枯宁主义

出现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是发展了的蒲鲁东无政府主义。以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巴枯宁而得名。它流行于意大利、瑞士、西班牙等国，反映了被资本主义发展弄得破产的农民和小生产者以及流氓无产者的绝望心理和情绪。

巴枯宁主义宣扬个人绝对自由，鼓吹“各阶级的平等”。认为最完满的人性只有在个人获得“最充分的自由”即“不受任何限制”的时候才能实现。主张社会成员不分阶级、性别都绝对自由平等，把“一切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平等”作为奋斗目标。巴枯宁主义反对一切国家，否认任何权威。认为国家是产生私有制的根源，只要“废除国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他们还说什么任何国家权威都是扼杀自由、反人性的，因此是绝对的坏事。认为国家意味着统治，而任何统治都意味着剥削，所以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必须无条件反对一切国家，而代之以理想的“无政府状态”

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将没有任何权威，人人都享有“绝对的自由”。巴枯宁主义鼓吹“完全放弃一切政治”反对进行任何政治运动。他们说“任何政治运动都是反动的”，“进行政治活动，尤其是参加选举，那是背叛原则的”。认为废除国家、建立无政府社会的途径，不是依靠无产阶级有组织的政治斗争，而是靠象巴枯宁那样的天才人物的领导，不需任何准备，不需积聚革命力量，只要有少数虎胆的骨干，利用密谋策略，在二十四小时内一举消灭国家，实行“摧毁一切”，或叫“社会清算”，并认为这是革命的全部秘密。巴枯宁主义认为，国家法律规定的继承权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的主要条件，只要废除继承权，人们就可以把财产交给社会，私有制将变成集产制，社会上的各阶级平等就可以实现。资产阶级私有制和资产阶级国家也随之灭亡了。因此它鼓吹以“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巴枯宁主义反对生产资料国有化，主张在废除国家建立无政府社会后，通过自由联合，自下而上地实行“集体制”，即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建立农业组合、工业组合，各自为政，分散经营，反对任何自上而下的集中领导和统一计划。

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主张绝对的“自由”和“平等”，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核心。巴枯宁这套无政府主义理论和纲领并不是新鲜货色，不过是东一点西一点地草率拼凑起来的杂拌。

巴枯宁主义的极“左”词句，蒙蔽了不少人，特别在意大利、瑞士、西班牙等经济落后、小生产众多的国家，影响较大。巴枯宁主义是第一国际后期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马克思、恩格斯写了大量著作如《论权威》、《巴枯宁〈国家

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等，严厉批判了巴枯宁主义的理论和策略。一八七三年的西班牙革命，最后宣告了巴枯宁主义在实践中的破产。

无政府主义

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思潮。产生于十九世纪上半叶。十九世纪下半叶广泛流行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施蒂纳(1806—1856)，法国的蒲鲁东(1809—1864)，俄国的巴枯宁(1814—1876)和克鲁泡特金(1842—1927)等人。

无政府主义认为，社会最高理想就在于无秩序与无政府的结合。它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和国家权力，认为“任何国家都是剥削和压迫的工具，一切权力都是祸害”，主张“向任何国家，甚至最民主的国家宣战”，(施蒂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无条件地反对国家”。(巴枯宁)它还主张放弃一切政治斗争，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消除”资本主义，或用恐怖的手段摧毁国家机构，在一天之内废除任何形式的国家，建立一个“无政府”的社会。

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它鼓吹“一切为了个人”，声称“我就是一切”，“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东西高于我”(施蒂纳)。它排斥集体和他人，宣扬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把个人的私利放在首位，反对集体主义的约束，强调所谓个人的绝对自由。它的哲学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我论。

无政府主义的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的个人主义理论和个人主义的理想是同社会主义直接对立

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列宁选集》第1卷，第218页）

无政府工团主义

又称工团主义（法国等国家的工会称工团）或工会主义，是工人运动中的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是机会主义的同胞兄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流行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和拉丁美洲等一些国家，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索烈尔（1847—1922）等。

无政府工团主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认为工会（即工团）是团结和领导工人的唯一组织形式，主张工会脱离并代替党的领导。它鼓吹“工会高于一切管理一切”，认为生产资料转入工会手中是一切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主张由工会组织和领导生产，以各地的工会联合组织代替国家。它否认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宣扬经济总罢工是消灭资本主义的万能手段，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无政府工团主义严重地危害了工人革命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转向社会沙文主义，支持本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

基尔特社会主义

基尔特，德语Gilde的音译，意即同业联合或行会。基尔特社会主义也叫行会社会主义，是英国工联中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以柯尔（1889—1959）为其主要代表。基尔特社会主义力图把中世纪行会的狭隘思想同现代资本主义

思想、无政府工团主义、费边主义混合起来，在工人当中散布有可能不通过阶级斗争而摆脱剥削的幻想，鼓吹在资产阶级国家范围内由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联合组成产业基尔特，用和平的，即从内部实行监督的办法把这些基尔特变成领导和管理生产的机构，实行产业民主和产业自治。国家则负责分配和保证全民消费。基尔特社会主义认为只要把全体工人逐步地组织到基尔特之中，基尔特就能代替现行一切组织和平地消灭资本主义，解放劳动者。因此，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引诱工人阶级脱离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民主主义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是一些根本不主张把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人。在法国指的是对工人阶级怀着一定程度同情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即一八四八年赖特律——洛兰类型的人物和一八七四年带有蒲鲁东情绪的“激进社会主义者”。在德国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是拉萨尔派。因此，那时马克思、恩格斯总是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共产主义者。

第二国际时期的无产阶级政党一般都称为社会民主党，其成员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自己的任务，一是领导无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一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这两个任务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达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首先要推翻专制制度，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然后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民主主义这个名称，就体现了民主革命任

务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不可分割的联系，故无产阶级政党定名为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为革命运动的旗帜，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当时社会民主主义一般就是指科学社会主义。但从严格意义上讲，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个名称来表达科学社会主义，是不确切、不科学的。恩格斯指出：

“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0页）由于当时这个名称尚不致引起人们误解，而更重要的是看到党在发展，名称不是主要问题。恩格斯便同意采用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个词和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

二十世纪初，机会主义在第二国际各国党内占统治地位，社会民主党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蜕化为主张社会改良的资产阶级政党，于是社会民主主义也就成了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代名词。

改良主义

工人运动中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又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或社会改良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已蓬勃兴起的年代。它把资产阶级国家描绘成超阶级的工具，宣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反对阶级斗争，鼓吹阶级调和、阶级合作，主张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行微小的点滴的社会改良。宣扬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议会的多数，就可以取得政权，“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改良主义最多只能稍微改善工人阶级出卖劳动力的条件，而始终让他们作雇佣奴隶，其

目的就是用小恩小惠来分化欺骗工人，麻痹他们的斗志，使他们不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

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改良主义思潮曾在国际范围内广泛流行，如讲坛社会主义者、费边社会主义者、工联主义者，以及工人运动中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蒲鲁东、拉萨尔、伯恩斯坦等人都是它的积极鼓吹者。当前，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内那种以提高工人福利、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来瓦解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巩固资本主义统治的改良主义思潮，正日益抬头，严重地腐蚀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

机会主义

源出法语，意即应付或妥协。用来形容十九世纪法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些没有固定政治见解、随机应变的政客。后来指工人运动内部或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或路线。机会主义包括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

右倾机会主义是以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恩格斯指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是：

“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页）它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在革命斗争中，他们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不能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坐失时机，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甚至不惜背叛革命等，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

“左”倾机会主义是以“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它不顾客观条件，脱离时代、脱离现实、脱离大多数人民群众。它或是混淆革命的发展阶段，或是错误估计革命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因素，在革命条件还不成熟时，就轻率地发动革命；或把幻想当作真理；或把将来才可能实现的理想硬放到现在来做。因而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盲动主义，在组织上表现为宗派主义、关门主义。

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它们的阶级根源都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表现；认识根源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并都能发展成同马克思主义路线相对立的错误路线，同样会给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带来极为严重的危害。

讲坛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十九世纪后半期产生于德国，后来在英国、美国和法国广泛流行。其代表人物大多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大学教授，如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他们在大学的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因而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它的产生是由于资产阶级害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并力图寻找新的手段使劳动群众顺从他们的统治。

讲坛社会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正在发展的工人运动，抹杀资本主义的矛盾，鼓吹阶级调和，硬说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它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用社会改良的办法使资本主义完善起来，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而丝毫不触动资本

家的利益。其纲领是局限于组织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等，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思想来源之一。

合法主义

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产生于十九世纪末的德国。以福尔马尔、奥艾尔为代表。

十九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在反动的“非常法令”期间，经受了种种考验，领导德国工人运动获得了重大成就。一八九〇年俾斯麦的下台，“非常法令”的废除，德国党在国会选举中的新胜利，表明了反动统治阶级用强暴手段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政策的完全破产。反动阶级为了更好地巩固他们的统治，用社会改良的“自由主义”政策代替了“鞭子政策”，妄图蒙蔽群众，分化无产阶级的队伍。

由于统治阶级策略上的改变，使得德国党内以福尔马尔、奥艾尔等为头子的右倾机会主义嚣张起来。他们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大肆宣扬“自由主义”政策的“进步性”，胡说政府废除“非常法令”是对“工人真正友好”的表现，叫嚷社会主义者应当“用友好的手欢迎善意”，要党“放弃对政府的不妥协政策”，要“毫不含糊地反对暴力革命”，竭力散布“通过议会可以达到一切目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幻想。因此，这种对资产阶级政府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妄图在资产阶级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合法手段，和平实现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称为合法主义。

合法主义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恩格

斯不顾德国党的领袖们的阻挠和反对，于一八九一年连续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对合法主义展开了无情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右派的嚣张气焰，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议会主义

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十九世纪末，首先产生于德、法等国的工人党内。它抹杀国家的阶级本质，美化资产阶级民主，迷恋议会斗争，并把议会斗争看作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形式。妄图通过这种斗争，使无产阶级的代表在议会中取得多数，从而取得政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其实质就是诱骗无产阶级脱离暴力革命的轨道，为资产阶级效劳。

议会主义在第二国际各国党内曾广泛流行，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参见“合法主义”条）

新康德主义

是十九世纪后半期的资产阶级哲学派别之一。流行于德俄等国，首创者为德国哲学家李普曼、朗格和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柯亨·文德尔班，俄国的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等。康德是十八世纪后半期至十九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但在其体系中还存在着唯物主义成分。“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妥协，使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列宁全集》第14卷，第203页）新康德主义完全抛弃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成分，而把其中最反动的唯心主义成分拼凑成一个体系，并因康德哲学体系中有唯物主义成分

而批评康德。它企图使科学与康德的唯心主义哲学相调和，否认“自在之物”的存在，认为它是“异己的血滴”，不承认社会的客观规律性，把科学范畴归结为主观范畴。因此它是极端反马克思主义的。它的流派很多，在德国主要有马德堡学派和福来堡学派。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新康德主义者（爱·伯恩施坦、卡·施米特等人）对马克思的哲学、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及其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进行了修正。在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都是新康德主义的拥护者。

伦理社会主义

十九世纪末由新康德主义者柯亨等人提出的一种反动社会主义学说，流行于德、意、俄等国。伦理社会主义认为人们的道德（伦理）自我修养能够使社会摆脱一切社会灾难，宣称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抽象的道德理想，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应当是伦理学，用道德伦理来代替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伦理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用来对抗科学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并成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和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哲学家卡·伏尔伦德尔的观点中的主要论点之一。在现代，伦理社会主义的思想被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右翼社会党人广泛地利用着。

马赫主义

即经验批判主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出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西欧流行的一种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无产

阶级革命时代已经到来。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在思想上，就需要有一种更为反动的诡辩哲学来为其服务。马赫主义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

马赫主义是由奥地利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马赫(1838—1916)和德国的反动哲学家阿芬那留斯(1843—1896)所创立。他们声称要批判地了解经验，把自己的哲学叫做经验批判主义。但他们所说的“经验”并不包括在客观的社会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实践中，而纯粹是主观自生的东西，即“感觉的复合”。他们认为正是这种主观经验或感觉构成了世界的一切事物。因此，他们所说的“批判”，就是清洗掉对经验的唯物主义的理解，坚持唯心主义的理解。所以马赫主义哲学实际上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唯我论。

马赫主义和一般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比较有以下的特点：一是它打着“无党性”的旗号，标榜自己是“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没有片面性的“中派”哲学；二是披着科学的伪装，声称自己是反映了“最新自然科学的哲学”；三是它把相对主义作为自己认识论的基础，否定客观真理和真理的客观标准，宣称一切都是相对的，把任何诡辩、任何反动理论都宣称为“真理”。马赫主义的这些特点，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它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无产阶级的反动哲学。一些跟在资产阶级屁股后面跑的修正主义者(如俄国的波格丹诺夫等人)，都企图用马赫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它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指出“马赫主义这个变相的唯心主义客观上就是反动派的武器，反动派的宣传工具。”(《列宁全集》第17卷，

马尔萨斯主义

英国牧师马尔萨斯(1766—1834)创立的一种反科学的反动理论。他在《人口论》(1798年)一书中断言,生活资料是按算术级数(1、2、3、4、5……)增加的,而人口是按几何级数(1、2、4、8、16……)增加的,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人民饥饿贫困的原因在于他们“繁殖得太快”,超过了生活资料增长的速度。认为防止人口增加的主要方法,是瘟疫、饥馑,特别是繁重的劳动和毁灭大量劳动人民的战争,并主张劳动人民只有独身或者大规模削减他们的生殖能力,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显然,这种反动理论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贫困的真实根源,转移他们反对雇佣奴隶制度的斗争,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效劳。

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如美国的佛格特、斯宾格勒,英国的道逊、丁-赫胥黎等)赋予这种谬论以更加反动的形式,成为“种族论”的思想伪装。他们为希特勒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制造“理论”根据,公开主张消灭“劣等”民族的生殖力,消灭“过剩”人口,甚至主张用细菌和原子武器来大规模毁灭劳动人民。它成为帝国主义者进行侵略、发动战争的思想工具。

马尔萨斯主义是完全违背客观实际的。事实上生产力的发展足够保证世界人类生存和繁殖所需要的一切必要生活资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彻底揭露了这种反动理论的反科学性,指出人类社会并没有“永恒”的和“自然”的人

口规律，每一种社会制度有它特殊的人口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口相对过剩（即失业）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必然结果。

自由主义

一种流行于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初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潮，以英国的康斯坦、边沁和穆勒为代表。自由主义者把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民主”等口号，按资产阶级政权确立以后的要求加以修改和补充。它主张个人活动和发展的完全自由，提倡个人权利，实行毫无约束的企业主的自由竞争和资本主义的剥削自由，拥护有财产限制的选举权和两院制议会，以剥夺劳动人民的政治权利。随着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时，自由主义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它反对马克思主义、抹杀阶级斗争、鼓吹改良主义、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维护资本主义，成为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工具。

伯恩斯坦修正主义

国际工人运动中最早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产生于十九世纪末，因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右翼首领、修正主义的始祖伯恩斯坦而得名。在第二国际各国党内都有其忠实信徒。

伯恩斯坦是隐藏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者。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不久，他就公开叫嚷马克思学说已经“过时”，应当予以修正。“修正主义”一词即由此而来。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攻击和“修正”。

在哲学方面，它否定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出“回到康德去”的反动口号，企图用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用庸俗的“进化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为其反对暴力革命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谬论制造哲学根据。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它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切根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剩余价值和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学说，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日益贫困化、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事实，认为卡特尔和托拉斯能消除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不会崩溃，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必要。

在政治方面，它极力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专政，猖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消除了阶级斗争，社会改革无须进行流血革命，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等手段就可以实现。他诬蔑暴力革命是“无谓牺牲”，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历史的倒退。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改良，主张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进行社会改良就可以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它还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主张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变成“改良的党”。它抛弃党的最终目标，提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修正主义公式。列宁深刻地指出：“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列宁选集》第2卷，第7页）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是第二国际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逐步

滋长起来的，是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发展和继续，是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策略改变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直接产物。它破坏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解除无产阶级的思想武装，从而葬送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列宁同它作了坚决的斗争，并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从而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米勒兰主义

又称内阁主义，一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因法国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首领亚历山大·米勒兰参加法国反动的资产阶级内阁并协助资产阶级执行其政策而得名。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机会主义在第二国际内部泛滥，米勒兰极力鼓吹只要在选举产生的各种机关中争得多数，这就能够“从经济上政治上解放全人类”。因此，实现社会主义不必求助于革命，不必诉诸暴力，借助于普选制，求助于全民投票，来夺取国家政权就已完全足够了。米勒兰这种思想后来更加发展，于一八九九年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同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利费将军合作。其后，社会党人维维安尼、布里安等人也相继入阁。米勒兰入阁，取得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支持，他们力图证明，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是社会党人强大的表现，是形势发展所需要和无产阶级利益引起的。他们甚至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起点。这种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企图借助资产阶级的普选制，通过加入资产阶级政府以夺取政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被称为“米勒兰主义”或“内阁主义”。米勒

兰入阁，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耻背叛；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阶级斗争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是法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向机会主义蜕化的必然结果。列宁把它称为“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米勒兰主义虽然遭到了第二国际内左派的坚决反对，但由于第二国际领袖考茨基等人的庇护，未曾受到应有的批判和制裁，因而成为一种国际现象。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各国党的机会主义头子纷纷加入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考茨基主义

第二国际中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集团所表现出来的修正主义思潮。其代表人物还有希法亭、鲍威尔等一些典型的假马克思主义者。

考茨基主义是第二国际内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矛盾和斗争的社会产物。它口头上忠于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形成一套完整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最阴险的敌人。

考茨基主义鼓吹“超帝国主义论”，掩盖帝国主义的本质和深刻的矛盾，否认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认为帝国主义只是金融资本“情愿采取”的一种政策，胡说资本主义会经历一个“超帝国主义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各国金融资本将联合起来共同剥削世界，从而可以消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停止战争，出现“持久和平”的“新纪元”；宣扬庸俗的“生产力论”，认为只要

生产力发展了，资本主义就可以自行崩溃，社会主义就会自动产生；鼓吹超阶级的国家观，反对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认为资产阶级国家已开始从镇压被剥削者的工具转变为解放他们的工具；反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武装斗争没有存在的余地；鼓吹无产阶级通过取得议会多数的办法“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考茨基主义者在历次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斗争的重要关头，总是采取调和主义立场，以不左不右、不偏不倚的姿态蛊惑人心，以隐蔽的形式为机会主义辩护，实际上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倒向机会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考茨基主义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向社会帝国主义投降，成为暗藏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由于第二国际中右派叛徒面目公开暴露，逐渐被劳动人民所识破和唾弃，而考茨基主义者却凭他们“中派”的两面手法，玩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因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考茨基主义成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十月革命后，考茨基主义者不相信十月革命的胜利，把民主和专政对立起来，颂扬所谓“纯粹民主”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恶毒攻击和咒骂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说什么专政就是“毁灭民主”，是个人“独裁”等等。考茨基主义者堕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凶恶敌人。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二国际的破产》、《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一系列著作中对考茨基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指出：工人阶级若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考茨基主义，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任务。

农民社会主义

一种企图通过农民村社，不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直接走上社会主义的理论。十九世纪五十——六十年代为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亚·伊·赫尔岑(1812—1871)所创立。

农民社会主义认为俄国的农民村社已具有社会主义的萌芽，把村社和工人组合加以理想化，把农民连带土地的解放，把村社土地占有制和农民的“地权”思想看作社会主义。这种理论显然是空想的。列宁指出：它不过是“幻想的词句和善良的愿望”，“是没有丝毫社会主义气味的”。(《列宁选集》第2卷，第418页)但是其中却包含有进步的因素，反映了当时争取推翻地主政权和消灭地主所有制的农民革命要求，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的旗帜。

赫尔岑的农民社会主义思想，在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观点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革命民粹派的主要理论之一。

民粹主义

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产生于俄国的一种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当时俄国资本主义开始发展，但小生产还占优势，一些革命青年知识分子自称“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被称为民粹主义者。(按俄文原意为人民主义者，当时所谓人民，一般是指农民)主要代表人物为彼·拉甫洛夫。

民粹主义看不见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偶然”的现象，因此无产阶级也不能成长发

展起来。他们把无产阶级在俄国的出现看作是“历史的不幸”，指摘无产阶级化是一种“病害”，因而否认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他们从相信俄国人民生活的特殊方式这一观念出发，认为只要发展农村“村社”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相信“村社”农民具有共产主义本能，是直接为社会主义奋斗的战士，因而把农民看作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认为单靠农民的“骚动”，就能消灭沙皇君主专制制度和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制度；他们否认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极力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把群众看作是跟着“英雄”走的“群氓”；他们否认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宣扬并采取个人恐怖政策。

六十——七十年代的民粹主义代表了农民的利益，具有反对封建统治和一般民主要求，有一定的革命性。到了八十年代，由于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农村两极分化加剧，农村资产阶级增加，加上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民粹主义成了农村富农利益的代表者，政治上也从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蜕变为自由民粹主义，即指望在保存现存的社会基础的条件下去补缴和“改善”农民状况。主要代表人物为米海洛夫斯基。他们主张与沙皇制度妥协，破坏俄国革命力量的团结，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阻挠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民粹主义成为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开展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道路上的主要思想障碍。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中对它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合法马克思主义

即司徒卢威主义。十九世纪末在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流行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布尔加也夫等。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工人运动兴起，马克思主义获得广泛的传播。这时，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沙皇政府批准的合法报刊上发表文章，因此被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他们想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使工人运动服从和适应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赞美资本主义，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说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存在将是巩固的、持久的，号召俄国工人阶级要“承认我们不文明，去向资本主义学习”，而不是去进行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他们根本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根本否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进行过反对民粹派的斗争。列宁在反对民粹派的斗争中，曾同他们达成暂时的协议，利用他们去反对民粹派。但列宁同时又非常尖锐地批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无产阶级的、自由资产阶级本性。二十世纪初，大多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倒向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和“批评”思潮，公开进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这样，马克思主义者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联盟破裂了。这一事实说明了“合法马克思主义”是俄国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萌芽。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以后的年代中，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公开维护斯托雷平的反动统治。此后，许多人成为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司徒卢威成为俄国的思想家之一，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掩护，坚持沙文主义，为掠夺战争、兼并和民族压迫作辩护，说什么“我国的胜利会加速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说会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十月革命后，国内战争时期，原来一些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堕落成为白卫分子，成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凶恶敌人。

国际主义

是无产阶级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和处理国际关系和民族问题的观点，它强调无产阶级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争取民族解放和建设共产主义斗争中的国际团结。它同帝国主义者用以欺骗世界人民以利于垄断资本集团统治世界弱小民族的“世界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也同表面上是为了自己的民族利益，实际上是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的“民族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在于无产阶级的状况是相同的，利益是相同的，又有同样的敌人和共同的奋斗目标。无产阶级只有团结起来共同战斗，才能战胜国际资本，获得彻底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伟大口号，极其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实质。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求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认识和处理国际关系和民族问题时，不仅要从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而且也要从全世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要把本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把本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联系起

来，在反对压迫、剥削，反对国际资本，争取民族解放，争取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中，要亲密团结，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只有这样，世界革命才能胜利。

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把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作为自己的最高国际义务，并以国际主义和革命的爱国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教育全体人民，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

狭隘爱国主义

资产阶级认识、处理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的一种思想表现。

狭隘爱国主义只顾本国、本民族的局部利益，不考虑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它把本国、本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本国、本民族的利益置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之上，不支持别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不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有时甚至支持本国、本民族的反动政府，去反对和侵略别的国家和民族。

狭隘爱国主义是剥削阶级用来维护、扩张本阶级利益的思想工具。它同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相对立的。

民族主义

资产阶级对于民族的看法及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

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总是把本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并且为了把自己的利益置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

之上，以自己的阶级私利取代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总是把自己打扮成全民族利益的代表。在为本民族利益而斗争的幌子下，压迫、奴役和剥削本民族人民和其他民族。

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起着不同的作用。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它的进步作用表现为消灭封建割据，实现国家统一，发展民族经济；在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民族国家，其进步作用则表现为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但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彻底的，它以是否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为转移的。当资产阶级得势以后，就必然要加紧压迫和奴役本民族人民和其他民族，或者侵略其他国家，实行扩张主义；或者在民族利益同阶级利益二者择一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勾结外来侵略势力，镇压国内的革命运动；垄断资产阶级则更要利用民族主义，挑拨各民族间的关系，煽动各民族间的仇恨，制造各民族间的对立和冲突，为其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服务。这些都是反动民族主义的具体表现。在当代，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已成为超级大国实行侵略、颠覆和推行霸权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进步的民族主义，同反动的民族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大国沙文主义

也叫大国主义，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沙文主义在国际生活中的一种反映。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它以大国自居，发号施令，把本民族和本国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不尊重别国的独立平等地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甚至粗暴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人民的利益，损害他国的独立和主权。

大国沙文主义并不是某一国家特有的现象。乙国比甲国小和落后，但是比丙国大而先进，这样，乙国尽管埋怨甲国的大国主义，却往往同时对于丙国摆出大国的架子。大国沙文主义就其性质来说，和大民族主义的思想实质是一样的，都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妨碍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国际团结，一方面要在较小国家中克服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还必须首先在较大国家中克服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

泛斯拉夫主义

俄国沙皇政府为实现其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而制造大民族主义的反动理论。它形成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沙皇政府为了自己的目的，企图利用当时在土耳其和奥地利奴役下的各斯拉夫民族的解放愿望，以虚构的全体斯拉夫人的民族特征为幌子，鼓吹要使各个斯拉夫民族形成一个以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强大而统一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使命是建立一个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利亚海到北冰洋的大斯拉夫帝国。俄罗斯资产阶级接受泛斯拉夫主义的思想。立宪民主党人更是大肆宣扬这种思想。当代新沙皇鼓吹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实际上也是泛斯拉夫主义这种反动理论的变种和发展。恩格斯早就揭穿了泛斯拉夫主义的反动本质。他尖锐指出：“泛斯拉夫主义是在并不存在的斯拉夫民族这一假面具之下争夺世界霸权的骗人计划，它是我们和俄国人的最凶恶的敌人。这种骗局总有一天会烟消云散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63页）

殖民主义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用政治、经济、军事的手段，剥夺经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独立自主，使之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受其奴役和剥削的理论和政策。殖民主义的形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是通过海外移民、海盗式掠夺、欺诈性贸易、奴隶贩卖等方式，从落后国家和地区掠夺巨额财富。现代资本主义确立特别是帝国主义阶段，则通过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占领、控制，直接或间接的统治，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丧失独立和自主，而变成资本主义强国的垄断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军事基地，以获取最大限度利润。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文化长期停滞和处于极端落后状态。人民遭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生活十分贫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一开始就同殖民主义作坚决斗争，以摆脱殖民统治，取得独立自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帝国主义鉴于直接统治和露骨压迫剥削殖民地人民的旧政策业已破产，于是改换手法，采取了一系列进行殖民统治和剥削的新方法、新形式，这就是新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的特点是：在政治上允许和承认被压迫民族在形式上的独立，而通过收买、扶植代理人和傀儡政权实行间接统治；在经济上通过“援助”、合作贸易、组织跨国公司 etc 加强经济扩张以控制其国民经济；在军事上通过“军援”、设立基地、派遣顾问等进行军事控制；文化上则通过文化侵略、思想渗透、培植亲帝国主义的知识分子等，以腐蚀民族意识，借以巩固殖民统治。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也是新殖民主义者。它在自己的“大家庭”内，以所谓“经济一体化”、“国际分工”、“国际专政”、“有限主权”的名义以及结成军事联盟，在军事、经济、政治上对“兄弟”国家实行全面控制，剥夺它们的独立自主，残酷剥削和奴役“兄弟国家”的人民。对第三世界各国，它打着“援助”等旗号，输出商品和资本，以控制其国民经济；在“天然盟友”的桂冠下，签订“友好条约”、“援助”武器、派遣军事顾问、建立军事基地，以控制一些国家的军队，继而全面控制其政治、经济；破坏其国内的团结，挑起内战和国家之间的战争，全面控制该地区和国家；到处扶植亲苏势力，制造社会动荡，不惜采取政变、暗杀直至派遣雇佣军等办法进行颠覆，以建立完全听命于苏联的政权。

军国主义

垄断资产阶级鼓吹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产物，是它们攫取巨额利润的手段。帝国主义为了奴役和掠夺其他国家，竭力扩张军备，把国家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国内政治、经济、文化都为侵略目的服务。它对内无限制地增加军费，使国民经济军事化；强迫人民服兵役和接受军事训练；实行奴化教育，向人民灌输侵略思想；实行军事独裁统治，残酷镇压革命运动。对外则加紧剥削、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干涉破坏他国主权，进行颠覆活动，以至公开发动侵略战争以扩张其势力范围，争霸世界，这就是军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等都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

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也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形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帝国主义具有五大经济特征：①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了这样的高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②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融合成金融资本，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③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④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⑤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垄断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本质。

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就是战争。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由于这一规律的作用，一些国家超过了另一些国家，于是要求按实力来重新瓜分世界。争夺世界霸权，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

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帝国主义的三大矛盾，即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殖民地附属国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这表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已完全成熟，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已经开始了。

当前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一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社会沙文主义

沙文主义是资产阶级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它宣扬本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煽动民族仇恨，鼓吹侵略和压迫其他民族，因法国士兵沙文狂热地拥护拿破仑第一的侵略扩张政策而得名。沙文主义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其他民族的思想工具。

社会沙文主义就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它是机会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环境中的产物。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首领们，否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在“保卫祖国”的口号下，公然投入资产阶级怀抱。他们鼓吹阶级合作，拒绝宣传和支持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他们投票赞成军事预算，积极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维护本国资产阶级利益，完全堕落成为沙文主义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社会沙文主义者中，直接站到资产阶级方面的，如普列汉诺夫、谢德曼、盖得等，是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此外，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常常用一些欺骗性的“左”的反党词句，来掩盖自己的背叛，是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社会沙文主义是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

社会和平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国际内形成的一股政治思潮，它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事实上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

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抹杀战争的阶级性，不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而反对一切战争，主张不消灭战争的根源，不动员和依靠群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无条件地乞

求和平。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是帝国主义者掩盖准备战争的阴谋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屠拉梯之流，成为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应声虫，帝国主义和平骗局的吹鼓手。他们离开阶级斗争，离开革命，谈论空洞的和平主义言词，在战前竭力掩盖帝国主义准备战争的阴谋，帮助帝国主义者欺骗和麻痹群众；战争爆发后，他们掩盖战争的真实根源，歪曲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为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辩护。他们妄称帝国主义本身就可以带来和平，松懈群众的斗志，转移人民斗争视线，破坏无产阶级革命，为帝国主义效劳，成为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事实上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

民主社会主义

一种标榜为社会主义，公开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代改良主义思潮。是英国右翼工党和各国右翼社会党领袖所鼓吹的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以资产阶级御用学者凯恩斯的反动经济学为基础，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工党和其他国家社会党右翼领导集团，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声势日益浩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纲领性口号，并于一九五一年在法兰克福召开的“社会党国际”成立大会上公开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鼓吹者们宣称它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有力武器”。它以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为幌子，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是超阶级的，资本主义国有化和资产阶级对国家经

济生活的干预就是社会主义。因此，他们主张在保存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条件下，通过小规模的改革，通过阶级的“和平合作”，资本主义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反动实质，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保护资本主义制度。它是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死敌。

革命护国主义

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鼓吹的一种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战争政策辩护的反动思潮。它放弃一切社会主义原则，去维护那种用“保卫祖国”的空话掩盖起来的大资本的掠夺利益。

二月革命胜利后，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支持下，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建立了临时政府。它仍然执行沙皇专制政府的反动政策，对外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竭力为临时政府辩护效劳，胡说什么由于革命的胜利，俄国参加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是帝国主义战争了。因此，他们号召人民去“保卫资产阶级祖国”，并自称为“革命护国派”。革命护国主义即由此而来。

革命护国主义，代表着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和富裕农民的利益和观点，这些阶层也想从压迫弱小民族来攫取利润。革命护国主义是当时俄国革命发展和取得胜利的死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同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认为对革命护国主义的丝毫让步，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但对受革命护国主义思潮影响的广大劳动群众则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使他们认清临时政府进行战争的帝国主义本质，从而站到革命

方面来。

托洛茨基主义

用“左”的词句伪装起来的反对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二十世纪初在俄国出现，以托洛茨基为代表。托洛茨基主义的核心是所谓“不断革命论”。它以极“左”的面目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其基本观点是否认无产阶级领导权，否认农民的革命性以及建立工农联盟的可能性。在民主革命时期，忽视农民的民主主义革命要求，否认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宣扬跳越民主革命阶段而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竭力反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胜利的理论，鼓吹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欧洲几个联合为欧洲联邦的主要国家(英、俄、德)的胜利，否则社会主义胜利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一国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建立自己的政权，如果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支持，无产阶级也会因和广大劳动农民发生敌对冲突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定会灭亡；托洛茨基还硬说，世界性分工，苏联工业对外国的依赖，欧洲先进国家的生产力对于亚洲原料的依赖等等，这一切使任何一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是决不可能的。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错误就在于它抹杀了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重大意义，否认在帝国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因此不是去发挥那些有可能单独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主动性，推动他们去向资本主义进攻，夺取革命的胜利，

而是要他们去消极等待世界革命的总爆发的时机；它的错误还在于不相信一国无产阶级有条件并且有能力建成社会主义，而把希望直接寄托在渺茫的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上面。因此，尽管托洛茨基经常披着极“左”外衣，妄图欺世惑众，但仍无法掩盖其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实质。斯大林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上的投降主义是内容，‘左的’词句和‘革命’冒险主义的态度是掩蔽和吹嘘投降主义内容的形式，——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10页）托洛茨基主义在俄国革命各个历史阶段都发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特别是在列宁逝世前后，成为联共（布）党内最危险的敌人。当前，托洛茨基主义尚在一些国家内有一定影响。

法西斯主义

意大利语 *fasismo* 的音译，来源于拉丁语 *fascis*，原指中间插着一把斧头的一捆棍棒，象征暴力与强权。法西斯主义是极端沙文主义的、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反动思潮，又指垄断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最露骨、最残暴的恐怖独裁统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一切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世界革命运动空前高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垄断资产阶级在原来那一套虚伪的民主制已经失灵，再也不能欺骗人民的情况下，妄图采用赤裸裸的独裁专政和对外扩张侵略来继续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法西斯主义就此产生。它最先由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所提出，而德国希特勒是其最反动的魁首和最典型的代表。一九二二年、一九三三年意、德两国先后建立起法西斯专政。其他如日本、

西班牙、保加利亚、波兰等国也都相继推行过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对内实行极权的独裁统治，残酷地迫害劳动人民和进步知识分子，镇压一切革命运动；对外疯狂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思想上则宣传露骨的强盗哲学和反动的种族论。法西斯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特别是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人民粉碎了德、意、日等国的法西斯主义统治。由于帝国主义未消灭，法西斯主义的基础尚存，因此它在一些国家内仍不同程度的存在着。

纳粹主义

纳粹是德语 National-sozialistische 的两个音节Nazi的音译。纳粹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希特勒纳粹党即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国社党)的指导思想和建立起来的反动恐怖独裁统治。它除了具有法西斯主义的一般特征外，还有煽动复仇主义、宣扬大日耳曼主义和反犹太运动的特点。

绥靖主义

也称妥协主义，是对侵略者抱姑息态度，幻想用牺牲别国人民的利益来满足侵略者欲望的办法以求得妥协的理论和政策。它的反动实质就是出卖小国利益，保存自己，企图苟安于一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德、意、日等国侵略面前，不仅在经济、政治上作种种让步，而且以牺牲中欧、东欧一些弱小国家的利益，满足侵略者的欲望，以求得与它们的妥协，妄图把祸水东引，进攻当

时社会主义的苏联。一九三八年签订的《慕尼黑协定》就是绥靖主义的突出表现。绥靖主义决不能制止侵略，避免战争，相反，只能纵容侵略，加速战争的来临。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即是明证。

近年来，在西方一些人士中曾出现过一股绥靖主义思潮，在苏联的战争威胁面前，步步退让，苟且求安，妄想以贸易、贷款、输送技术等办法“安抚”苏联，以期它“缓和”同西方国家的紧张局势，更有甚者，还想再演一次新的慕尼黑丑剧，把这股祸水东引，进攻中国。这一切更加助长了苏联的侵略扩张野心，增加了战争的危險，加速了它发动世界战争的步伐。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都证明，绥靖主义是战争的催化剂，必须予以不断揭露和坚决反对。

(五)

一六四〇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一六四〇年至一六八八年英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

十七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在英国迅速发展，代表封建专制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反动统治，已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查理一世继位后，推行对抗国会、压迫清教徒、打击新兴工商业的政策，更使人民不满。一六四〇年，查理一世为筹集军费而召开国会，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占多数的国会一开始就与国王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查理一世不但拒绝国会提出的一系列改革的要求，并于一六四二年宣布讨伐国会，从而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一六四二至一六四八年，曾两次爆发内战，资产阶级在独立派代表克伦威尔指挥下，击溃了国王的军队。一六四九年一月查理一世被处死，三月废除了君主制，宣布成立共和国。革命胜利后，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控制了国家政权，镇压了小资产阶级(平等派)和农民(掘地派)的革命运动，扼杀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民族起义，并于一六五三年建立了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政权。克伦威尔死后，一六六〇年，查理二世继位，封建王朝复辟。一六八八年，代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辉格党人发动政变，推翻了国王查理二世政权，从而最终结束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这在英国历史上称为“光荣革命”，从此确立了资产阶级——新贵族专政的君主立宪政体。

一六四〇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历史上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它宣告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诞生，标志着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三年法国人民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

十八世纪末，腐朽的法国封建统治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国王为首的第一等级（僧侣）、第二等级（贵族）同第三等级（手工业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推翻封建统治，消灭封建特权，已成为当时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共同要求。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举行起义，攻占巴士底狱，揭开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后来，七月十四日成了法国的国庆日。

七月十四日革命后，代表金融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利益的君主立宪派取得政权，废除了种种封建特权，颁布了著名的《人权宣言》，宣布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的民主原则。一七九一年通过的新宪法，规定法国为君主立宪国家。

一七九一年底——一七九二年初，欧洲各反动君主国家策划对法国进行武装干涉，革命的法国面临严重的威胁。一七九二年三月，吉伦特派组阁。在欧洲君主国家的武装干涉面前，四月二十日，法国对奥宣战。由于军官的叛变，致使法军节节败退，奥军攻入法国国土，雅各宾派激励着人民为拯救祖国而战斗。在革命热情和爱国激情的驱使下，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巴黎人民举行了第二次起义，占领了王宫，逮捕了国王路易十六，击退了奥军的入侵，召开了国民大会，宣

布法国为共和国(即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政权，不敢从根本上铲除封建制度，在欧洲君主国家的武装干涉面前妥协投降，并在国民大会内部同雅各宾派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分歧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七九三年初，法国经济情况急剧恶化，吉伦特派的政策日益不得人心。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巴黎人民举行第三次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了雅各宾派的革命专政。雅各宾政府颁布了一七九三年宪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平息了吉伦特派的反革命暴乱，粉碎了欧洲君主国家的武装干涉。列宁说：“一七九三年的雅各宾派是十八世纪最革命的阶级即城乡贫民的代表。”（《列宁全集》第25卷，第41页）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大资产阶级发动政变，推翻了雅各宾专政，建立了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宣告结束。

这次革命是继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一次更彻底、更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不仅摧毁了法国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欧洲和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

英国工业革命

十八世纪末叶在英国发生的手工工场向大机器工厂发展的工业技术改革，也称产业革命。

英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确立以后，通过掠夺殖民地和圈地运动，拼命扩大资本的原始积累，致使工业高速发展。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工业革命首先从纺织工业开

始。一七六四年和一七六九年，先后出现了手摇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一七八五年，水力织布机和大规模的织布厂随之出现。以后，在动力机械、冶炼铸造、铁路等部门，也都有新的机器发明和使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七八四年瓦特发明的蒸汽机。

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在机器生产这一强大的物质基础上，从而确立了它对封建生产方式的绝对优势，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它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

英国废除谷物法运动

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四六年英国资产阶级同土地贵族之间围绕着谷物法而展开的激烈的斗争。

十九世纪初，法国同英国之间进行封锁和反封锁的斗争。拿破仑颁布了大陆封锁令，切断了英国与欧洲国家的贸易，迫使英国谷物自给，使农产品价格上涨，造成农业人为的繁荣景象。拿破仑帝国垮台后，谷物自由输入英国，使农产品价格低廉，造成了土地贵族利润下降和地租收入减少。一八一五年，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托利党政府制定了维护土地贵族利益的谷物法。谷物法规定了高额的谷物进口税，其目的在于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

谷物法的颁布，损害了劳动人民的利益，也阻碍了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于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在一八三八年组织了“反谷物法同盟”，同土地贵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

人的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一八四六年谷物法废除后，引起了谷物价格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扫除了工业资产阶级发展的障碍，促使了英国资本主义更迅速的发展。

英国议会改革运动

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为争取选举权利同土地贵族进行的斗争。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国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争夺政治权利的斗争日趋激烈。工业资产阶级提出每年要进行议会选举，给成年的男性居民以选举权，降低选举人财产资格的限制，并重新划分选区，取消那些居民稀少或根本没有居民的市镇和乡村，实际上是由当地大土地贵族指派的议会代表的权利。

一八三二年六月经上院最后批准的选举法改革，打破了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议院打开了大门。但在争取改革的斗争中作为主力军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却没有获得选举权。

英国宪章运动

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英国工人阶级反对压迫，争取政治权利的政治运动。在一八三二年的英国议会改革运动中，产业工人起了主导作用，但结果没有得到选举权。他们决定用自己的独立行动来争取政治权利。一八三六年六月，伦敦工人协会成立。一八三七年六月，工人协会草拟了一份以实行普选权为中心的包括六点要求的请愿书。请愿书命名为

“人民宪章”。一八三八年五月，这个文件以法案形式公布出来，号召人民签名，从此开始了著名的宪章运动。一八三八至一八三九年，一八四二年和一八四八年，运动三次进入高潮，先后签名的达一千万人之多，工人群众在运动中还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要求。所以，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但是，随着法国一八四八年六月革命失败，欧洲反动势力重新得势，加上宪章派领袖“合法革命”思想的影响，运动终告失败。

宪章运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成为英国无产阶级第一次独立的政治斗争。在宪章运动中，工人阶级先进分子还形成了具有政党形式的全国性政治组织。

十小时工作日运动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无产阶级争取用立法手段把工作日限定为十小时的斗争。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工人正常的劳动日为十小时。但是，到了十八世纪末，资本家把劳动日延长到十四至十六小时，甚至更长。于是，无产阶级开始了反对资本家延长劳动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运动。

当时，英国主要有两大政党：托利党和辉格党。前者代表土地贵族的利益，后者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一八四六年，辉格党曾利用工人的力量，废除了《谷物法》，损害了土地贵族的经济利益。这时，托利党也利用工人的力量，于一八四七年六月八日使国会通过了关于童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法案，以表示对资产阶级的报复。这样，无产阶级通过长期的斗争，终于利用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取

得了十小时工作日运动的胜利。

法国七月革命

一八三〇年七月法国资产阶级反对波旁王朝的革命。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帝国瓦解，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贵族、教会势力卷土重来。波林雅克内阁是复辟期间最反动的内阁，代表着贵族、僧侣和大地主利益，同新兴的资产阶级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六日，内阁公布国王查理十世六条敕令，解散议会，改变选举制度和修改出版法，削弱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敕令引起了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者的愤怒，逐渐发展为群众的起义，七月二十九日推翻了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路易一菲力浦继任国王，建立了七月王朝，从而开始了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

法国里昂工人起义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里昂纺织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两次起义。一八三〇年，七月王朝建立后，法国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状况更为恶化，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一八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里昂纺织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被政府拒绝。于是，工人们在“工作不能生存，毋宁战斗而死”的口号下举行起义。经过三天的浴血奋战，控制了整个里昂市，但最后被反动政府的军队所镇压。一八三四年四月九日，工人为反对政府颁布的禁止工人集会结社的法令而再次起义，并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政治口号。这次起义虽有若干城市响应，但在经过六天的血战后，也被镇压下去了。

里昂工人的两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它在工人运动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它标志着法国工人已经走上了独立的政治斗争的道路。马克思指出：“里昂的工人们以为自己追求的只是政治的目的，以为自己只是共和国的战士，可是事实上他们却是社会主义的战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6页）

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

一八四四年六月，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为了反对工场主剥削而发动的起义。西里西亚是德国纺织工业发达的地区。在西里西亚，资本主义关系和封建关系交织在一起，工人深受封建和资本的双重压迫和剥削，终日劳累不得温饱，工作条件十分恶劣。四十年代初，当地的工场主为同英国商品竞争，又大量压低工人工资，以减低生产成本，因而遭到工人的强烈反对。一八四四年六月，工人们高唱着《血腥的屠杀》的歌谣，发动了起义。他们捣毁了工场主的住宅、厂房、机器，烧毁了票据、帐簿和仓库，并同前来镇压的军警展开了搏斗，最后被反动政府镇压下去。

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虽然是自发的，但他们的斗争目标极其鲜明地对准了私有制，对准了资本的剥削，表明了年轻的德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开始逐渐成熟，继英、法等国无产阶级之后，走上了独立的政治斗争的道路。

十九世纪波兰民族解放运动

一八三〇年、一八四六年和一八六三年波兰人民三次抗击沙皇俄国统治的斗争。波兰原是欧洲的一个封建农奴制大

公国，一七七三年和一七九三年两次被外国侵略者瓜分。一七九五年，普鲁士、奥地利和沙皇俄国再次瓜分波兰。沙皇俄国把波兰的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划入了它的版图，成为沙俄的殖民地。

占领者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波兰人民的强烈反抗。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华沙爆发了闻名于世的波兰起义，给了沙皇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在普鲁士占领区和奥地利占领区也展开了争取波兰民族统一的斗争。此后，在一八四六年和一八六三年又发生过两次反抗沙皇统治者的起义。在沙俄的血腥镇压下，这些起义都失败了。但波兰人民反抗沙俄的斗争，不仅获得了欧洲人民的同情和支援，同时对欧洲革命也产生了巨大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曾给予高度的评价。

美国独立战争

一七七五年至一七八三年北美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自由独立的战争。从一六〇七年到一七三三年，英国在北美建立了十三个殖民地。殖民者不仅残酷剥削这里的劳动人民，而且打击了这里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大种植园主的利益，他们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引起了当地新兴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反抗。一七七三年，波士顿居民捣毁英国装载茶叶的船只，成为这次战争的导火线。一七七四年九月，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代表召开第一次大陆会议，决定同英国断绝商业关系。一七七五年四月战争爆发。同年五月，召开第二届大陆会议，决定组织大陆军队，并选举华盛顿为大陆军队总司令。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大陆会议通

过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宣布十三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组成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战争初期，英军处于优势，但一七七七年在萨拉托加一役中，英军被围困后投降，整个战局开始扭转。一七八一年八月，华盛顿的军队击溃了英军主力，英国被迫媾和，一七八三年签订巴黎和约，英国承认北美十三个州独立。

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不仅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解放了美国的生产力，而且还给欧洲资产阶级敲起了警钟。

美国南北战争

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美国反对奴隶制的国内战争。

美国独立后，建立的是资产阶级和奴隶主的联合政权，在北部和东部地区，近代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建立和发展，而南方各州还继续保存和发展着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一八五〇——一八六〇年期间，这两种社会制度发生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支持奴隶制与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一八六一年初，主张解放黑奴的共和党人林肯就任联邦政府总统，而此时南部各州相继脱离联邦，成立南部各州同盟，选举总统，制定新宪法，公开进行分裂活动。同年四月十五日，林肯号召人民为恢复联邦的统一而战，南北战争从此开始。一八六二年五月，林肯政府发表《解放黑奴宣言》，颁布土地无偿分配法，改组了军队，封闭了反动报纸，大大鼓舞了黑人、工人、农民群众参加战争的积极性，逐渐取得了军事力量的优势。一八六五年六月，南部联军投降，内战以林肯政府取得胜利而结束。

在粉碎南方奴隶主势力的军事行动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工

人、农民、黑人等人民群众。战争结束后，北方工业资本集团控制了政权，使工业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取得了统治地位，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最后的障碍，使美国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大国。

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

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席卷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欧洲各国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殖民主义同被压迫人民的矛盾日益激化；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六年欧洲农业歉收和一八四七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导致了革命的爆发。一八四八年一月，意大利西西里首府巴勒莫人民的起义揭开了革命的序幕。法国二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成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对其他各国的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接推动了德国、奥地利的三月革命。接着，匈牙利、捷克、意大利人民也相继起义，争取民族独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把革命推向顶峰。随着六月起义的失败，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反动势力重新抬头，各国革命先后失败了。

这次革命是在欧洲无产阶级已经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次革命尽管各国的具体任务不尽相同，但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无产阶级是这次革命的主力军，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充分暴露出它的软弱性和动摇性，而资产阶级则随时准备背叛革命。这次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不同程度上打击和动摇了封建制度及其残余势力的统治，为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它也锻炼和教育了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亲身参加了这

次革命斗争，总结了革命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

法国二月革命

一八四八年二月法国人民推翻奥尔良王朝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代表金融贵族利益的奥尔良王朝统治着法国，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大批小资产者破产，无数农民沦为乞丐，广大工人工时延长、工资下降、失业人数不断增加，所有这一切，都激起了人民群众对奥尔良王朝的不满和愤恨。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巴黎自由资产阶级举行目的在于鼓吹改良活动的宴会运动，遭到政府的禁止，于是巴黎人民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以示抗议。二十三日，工人举行总罢工，并同军队展开了巷战。二十四日，街垒战发展成为武装起义，推翻了奥尔良王朝，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领导的临时政府。二十五日，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巴黎无产阶级是这次革命的主力军。但是，共和派资产阶级却篡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当工人手中还握有武器的时候，资产阶级被迫通过了一些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有关的法令，规定实行普选，保证工人有“劳动权”，缩短工作时间等等。一旦工人的武装被政府解除后，资产阶级便马上调转枪口来镇压无产阶级。

二月革命虽然推翻了七月王朝，实行了共和制度，但它只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成为更加全面的统治；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所获得的只是为本身革命解放进行斗争的基地，而决不是这种解放本身”。

巴黎工人六月起义

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至二十六日,巴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武装起义。二月革命后所建立的共和国(即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它以多少改变的形式继续推行七月王朝时期的各种政策。五月十五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反对临时政府的示威游行,遭到了资产阶级的镇压。随后,资产阶级剥夺了无产阶级在二月革命时争得的一切“利益”。六月二十二日,资产阶级政府宣布解散二月革命后建立的“国家工厂”,把约十一万多工人抛上街头。巴黎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逼得走头无路的情况下,若不甘饿死,只有展开斗争。六月二十三日,巴黎无产阶级在“民主与社会共和国”的口号下举行起义。起义的工人在街垒中同反动的临时政府的军队进行了四天的浴血战斗,最后被政府军所镇压。

六月起义具有明显的无产阶级性质,它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它揭露了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虚伪本质,使无产阶级开始认识到:要实现自身的解放,归根到底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统治。

柏林三月起义

一八四八年三月,柏林人民反对普鲁士王朝统治的武装起义。十九世纪中叶,德意志人民迫切要求消除封建分裂,实现民族统一。在一八四八年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德意

志各邦相继爆发革命。柏林人民从三月十三日起，连日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答应即将召集联邦议会，进行立宪议会选举和建立国民自卫军等，妄图以改良作法来阻止革命。但所有这些并没丝毫涉及到改善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愤怒的人民群众于三月十八日包围了王宫，要求政府军撤出柏林。威廉四世拒绝了群众的要求，反而下令镇压人民群众。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在全城筑起街垒同反动政府进行了近十八小时的激烈战斗。结果人民获得胜利，国王被迫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宣布召开会议，制定宪法，并委任了一个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内阁，即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马克思认为，柏林无产阶级三月十八日胜利的结果，是人民在街垒战中获得了无疑是具有民主性质的自由，但是直接的统治权落入了大资产阶级的手中。

德国护宪运动

一八四九年五月德国掀起的维护帝国宪法、反对封建王朝统治的革命运动。一八四九年三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的帝国宪法，原是一个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与君主专制互相妥协的产物，但它规定了德国的统一问题。因此，德国的立宪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却把它看成是三月革命以来唯一被保留下来的“成果”。可是，德意志各邦政府都拒绝承认这部宪法。同年五月，萨克森、巴登等地爆发了维护宪法的大规模起义，赶走了国王，成立了临时政府。马克思、恩格斯对护宪运动给予巨大的支持，提出了许多正确的建议，力图把它引上革命的轨道。但是，领导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害怕人民群众革命，竭力使运动

不超出“合法”的范围。在普鲁士反动军队的镇压下，七月中旬，各地的护宪运动先后归于失败。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一八四八年五月十八日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全德国民议会。三月革命后，为解决德国的统一问题，五月十八日，在法兰克福召开了全德国民议会。参加会议的五百七十三名议员中，多数是自由派资产阶级代表，以及归附于它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胆怯和妥协，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会议除起草了一部矛盾百出的帝国宪法外，既没有采取任何巩固三月革命成果的措施，也没有成立真正统一德国的机构，来解决德国革命的主要问题。会议实际变成了失去实际权力，引导群众离开革命斗争的纯粹争论的俱乐部。一八四九年夏天，议会停止了活动。

芬尼亚运动

芬尼亚社社员争取爱尔兰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的运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间，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出现的芬尼亚社社员，是爱尔兰革命兄弟会这个秘密组织的参加者。芬尼亚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按其社会成分说来，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密谋策略、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芬尼亚社社员脱离了爱尔兰人民的广大阶层，并且没有把自己的活动和当时英国的一般民主运动联系起来。在六十年代后期，芬尼亚社社员在长期准备的一八六七年二月至三月武装起义失败之后，该组织的活动逐渐消

失。马克思、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了芬尼亚运动的弱点，但对它的革命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力图使它走上群众性的并和英国工人阶级共同行动的道路，但却没有成功。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一八五二年十月四日至十一月十二日，普鲁士反动政府策动的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案件。一八五二年十月，普鲁士政府以捏造的“进行叛国性密谋”为罪名，在科伦逮捕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十一名成员，送交法庭审讯。科伦法庭根据普鲁士警察从被共产主义者同盟开除出去的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手中索取的“同盟”情报，及伪造的材料和假证词，判处了七名被告三年至六年徒刑。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发表的文章中，对普鲁士当局迫害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一八六一年俄国农奴制改革

一八六一年沙皇政府为缓和国内阶级矛盾而进行的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一八五三年，沙皇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失败。战争带来的沉重负担使国内的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农民起义和工人运动连绵不断，动摇了俄国农村农奴制社会的经济基础。为了维持沙皇政府的反动统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一八六一年三月签署了关于废除农奴制的特别文告，规定在一个长时间内分段地“解放”大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农奴。农奴制改革从此开始。

这次农奴制改革是在有利于地主阶级的条件下自上而下进行的。它虽然免除了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但规

定了农奴必须向农奴主交纳大量的“赎金”。可见，它实质上是在“解放”的幌子下，向农民进行无耻的欺骗。列宁指出：“臭名昭彰的‘解放’，实际上是对农民进行残酷的掠夺，是对农民施行一系列的暴力和一连串的侮辱。”（《列宁全集》第17卷，第102—103页）

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一八七二年九月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一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六十五名代表。在马克思、恩格斯亲自领导下，大会同巴枯宁派作了尖锐的斗争。大会着重讨论了组织问题和无产阶级政治活动问题。大会通过了扩大委员会权力的决议。大会根据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无产阶级应该组织自己的政党，以保证社会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任务，就是夺取政权。大会对巴枯宁及其“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审查和处理。恩格斯就这个问题向大会作了报告，详细地揭露了巴枯宁及“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分裂活动。大会决定将巴枯宁及其死党吉约姆开除出第一国际，从而给巴枯宁集团以毁灭性打击。这次大会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对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

普法战争

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法国统治者和普鲁士王朝为争夺欧洲霸权而进行的战争。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依靠战争和强制手段，自上而下地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进而蓄谋并吞与南德接壤的法国领土阿尔萨斯和洛林

地区。而法国统治者路易·波拿巴也企图向德国的莱茵河地区扩张，以此来扩大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势力，从而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巩固波拿巴王室的统治。双方都想打仗。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九日，德、法两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上发生了纠纷，法国向普鲁士宣战，普法战争爆发。战争爆发后，法军连连失利。九月二日，路易·波拿巴及其元帅、将军和所属官兵八万六千多人全部被俘和投降。九月四日，巴黎发生革命，第二帝国被推翻。但此时德军仍长驱直入，包围了巴黎，战争性质发生了变化。普鲁士由防御变成对外侵略；法国人民的抵抗则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法军在巴黎签订投降协定，答应解除法国正规军武装，立即缴付二亿法郎赔款。五月十日，在德国的法兰克福签订和约。战争以法国惨败、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赔款五十亿法郎而结束。

普法战争激化了法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伟大的巴黎公社革命就是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端尖锐的情况下爆发的。为了正确对待这场战争，马克思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写了两篇宣言，分析了战争的起因和性质，揭露统治阶级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预示了战争的结局和后果，为德、法两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指出了对待这场战争的正确态度和策略。

法国九月四日革命

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法国巴黎人民推翻第二帝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普法战争开始后，法国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一八七〇年九月二日，法军在色当惨败和路易·波拿巴被俘

的消息传到巴黎，人民群情激愤，举国哗然。九月四日，巴黎爆发革命，广大工人、市民和国民自卫军战士包围了政府大厦，驱散了议会，宣布废除第二帝国，建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但政权落在资产阶级手里，组成了以奥尔良派保皇党人特罗胥为头子的临时政府，即所谓的“国防政府”。

巴黎公社

一八七一年三月法国巴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建立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

法国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革命后，资产阶级组织了所谓“国防政府”，对外卖国投降，对内镇压人民群众，使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国防政府”企图强行解除巴黎工人的武装。巴黎无产阶级被迫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了政权，三月二十六日举行选举，三月二十八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

公社废除了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军队，建立了人民武装；公社摧毁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机构，建立了立法和行政统一的新型政权——公社委员会。同时为了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公社工作人员由人民选举产生，并可随时撤换；公社废除了资产阶级官僚的高薪制，对所有公职人员只付给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公社取消了旧警察和旧法官，建立了新的司法、治安机关，并组织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公社的管理。在经济上，公社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措施。马克思说：“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

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8页）

同年四月，资产阶级反动武装勾结普鲁士侵略军，向巴黎疯狂反扑。巴黎无产阶级奋起保卫自己的政权，同反动军队展开了浴血搏斗。五月二十八日，最后一批公社战士壮烈牺牲在巴黎东部贝尔·拉雪兹神父墓地，为保卫公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赞扬巴黎无产阶级的英勇壮举，并根据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指出巴黎公社的原则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2页）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指出：“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77页）

由于当时法国还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公社的领导成员多属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因此在公社的整个活动中，不能不犯严重的错误，如：没有彻底摧毁反革命的武装力量；没有坚决镇压反革命；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等等，致使公社在国内外敌人的军事进攻下最后失败了。公社虽然只存在了七十二天，但它为建立和保卫无产阶级政权而树立的英雄业绩，却永远放射着夺目的光辉。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灿烂的革命曙光。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一八七八年德意志帝国俾斯麦政府为了镇压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而颁布的反动法令。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得到很大发展，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对此，俾斯麦政府极为恐慌。一八七八年，德国连续发生两次谋杀德皇的事件，俾斯麦蓄意把它归罪于社会民主党，于十月十九日颁布了“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法令”（简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根据这项法令，凡是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各种组织、出版物和集会都被禁止；政府有权随时宣布戒严，可以不按法律手续逮捕社会民主党人，并可不经审判把革命者驱逐出境。在“非常法”时期，有一千三百种党的刊物、书籍被禁止，三百三十二个工人组织被解散，九百多人被驱逐出境，一千五百多人被监禁或服劳役。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战胜了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在艰苦的地下环境中坚持斗争，增强和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一八九〇年十月一日被废除。

米勒兰事件

一八九九年法国社会党右翼首领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事件。米勒兰原属资产阶级激进派，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后来成为法国社会党右翼领袖。一八九九年六月，他借口挽救共和国和维护社会主义利益，参加了法国资产阶级反动政府，任工商业部部长。此后，他积极帮

助资产阶级政府破坏工人运动，成为资产阶级的走狗。

米勒兰入阁一事，在法国社会党内和第二国际内部曾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被称为“米勒兰事件”。列宁把米勒兰的这种叛变行为斥之为“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一九〇三年七月十七日至八月一日先在布鲁塞尔后移至伦敦秘密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一八九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党召开了“一大”，但党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此后，列宁创办了《火星报》，为在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一九〇三年七月十七日至八月一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二十六个组织的四十三名代表出席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和通过党纲、党章，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在‘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则的和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政党。”（《列宁全集》第7卷，第195页）

在讨论党纲时，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党纲草案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以列宁为首的火星报派坚决驳斥了各种错误观点，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大会通过的党纲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来镇压剥削者的一切反抗”。这是当时国际上唯一表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工人政党的纲领。在讨论党章时，列宁认为，党应该是无产阶级先进的、有觉悟的、有组织的部队，是用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司令部；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引导无产阶级走向胜利。而马尔托夫主张党员“自行列名入党”，使党成为成分复杂的、不定型的、

缺乏组织纪律性的党。由于马尔托夫的条文得到了一切机会主义分子的拥护，使它得以在大会上通过，这是大会的一个重大缺陷。大会在决定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编辑部人选时，列宁派获得多数，马尔托夫退居少数。从此，拥护列宁的人称为布尔什维克(即多数的意思)。

这次大会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建立了一个与第二国际各社会民主党有原则区别的、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同时，它标志着列宁主义的正式诞生。

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

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十世纪初，沙皇俄国是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焦点。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三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和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中俄国的惨败，进一步使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广大人民对沙皇制度的不满与日俱增。一九〇五年一月，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工人为反对厂方无理开除工人而举行罢工，遭到沙皇政府的镇压，引起了全俄工人政治性罢工和农民起义。一月九日(俄历)沙皇政府屠杀前往冬宫呈递请愿书的工人，导致了革命的爆发。四月，列宁为这次革命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策略，号召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权，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及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五月，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各地工人举行了有二十万人参加的大罢工。六月，黑海舰队暴动，发生了著名的“波将金”号铁甲舰起义。十月，罢工运动出现新高潮，在“打倒沙皇政府”、“全民起义万岁”的口号下，形成全俄政治总罢工。在斗争

中，各大城市普遍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士兵苏维埃。

在革命高潮面前，沙皇政府玩弄政治骗局，于十月十七日颁布诏书，许诺给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和召开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彻底揭露了这一阴谋，号召无产阶级准备武装起义，为彻底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而斗争。十二月五日，莫斯科的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全俄其他一些城市也相继爆发了武装起义。但由于缺乏统一领导和孟什维克的叛卖，起义被沙皇政府残酷镇压了。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沙皇政府发动政变，解散国家杜马，修改选举法，逮捕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成员，从而结束了一九〇五年革命，开始了俄国历史上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

一九〇五年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使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无产阶级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锻炼，并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列宁称它为十月革命的“总演习”。

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

一九〇七年八月在德国斯图加特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帝国主义疯狂扩军备战，战争危机四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推进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为此，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一九〇七年八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举行。来自二十五个国家的八百八十六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列宁代表俄国布尔什维克出席了大会。

大会的主要工作是在几个决议起草委员会内进行的。列宁参加了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的决议起草委员会工

作。会上列宁团结了各国的左派，在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殖民地问题及党与工会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上，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的讨论中，列宁明确地指出，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决不能保卫资产阶级祖国，而必须利用战争所引起的危机，来加速资产阶级政府的崩溃。必须注意斗争的方法和手段，要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和政治形势的改变而改变。经过激烈的斗争，大会终于通过了倍倍尔起草的，经过列宁和罗莎·卢森堡修改的决议案。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

一九一〇年八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军备竞赛有增无已，战争危机日益加深。在这种紧张局势下，第二国际于一九一〇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三日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再次讨论了反对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的问题，并且通过了基本正确的决议，重申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的主要措施。同时，大会就国际团结和合作社运动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巴塞尔宣言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的第二国际非常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宣言》，是著名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文献。

《宣言》严厉谴责了帝国主义的备战活动，揭露了日益

迫近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掠夺性质；号召各国人民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坚决的反战斗争，号召各国工人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来反对帝国主义；《宣言》重申了一九〇七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的论点（这是列宁和罗莎·卢森堡提出的）；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宣言》并规定了不同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任务和策略。列宁指出：“这个决议总结了各国许多反战的宣传鼓动文献，最确切而全面地、最庄严而正式地阐述了社会党人对战争的观点和策略。”（《列宁选集》第2卷，第615页）

第二国际中以考茨基、王德威尔得为首的机会主义者在代表大会上投票赞成这篇宣言，但是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就公开背叛了巴塞尔宣言，站到本国帝国主义政府方面去了。

日俄战争

一九〇四年日本和沙皇俄国为争夺远东殖民霸权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日益尖锐。沙皇俄国在参加八国联军镇压我国义和团起义后，赖在我国东北地区拒不撤兵，妄图永久霸占我东北三省。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东北三省亦早有野心，力图排挤沙皇俄国在中国和朝鲜的势力。日、俄这一野心与英、美等帝国主义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英、美帝国主义决定扶植日本来对抗俄国。一九〇四年二月七日，日本突然进攻俄国在中国旅顺口和朝鲜仁川港的舰队。次年一月攻陷旅顺口，以后俄军在辽阳、

沈阳、对马海峡等战役中相继战败。一九〇五年九月，双方在美国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日本获得了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特权。日俄战争中沙俄的失败，加速了俄国国内革命的发展。

日俄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战争双方都是非正义的。由于战争主要是在中国境内进行的，它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

斯托雷平反动时期

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一年俄国历史上出现的以沙皇内阁总理斯托雷平为代表的极端反动的统治时期。

斯托雷平(1862—1911)，是沙皇俄国的反动政治家，原任格罗德诺省和萨拉托夫省省长，一九〇六年任沙皇政府内阁总理兼内务部长。一九〇七年他发动了“六三”政变，镇压了一九〇五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而开始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他在执政期间，一方面采用残暴手段，利用宪兵、警察和讨伐队，大肆屠杀工农群众，取缔革命政党和组织，镇压革命运动；另一方面，他又打着“改革”的幌子，实施新土地法，培植富农，作为沙皇制度在农村的支柱，维护其反动统治。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革命斗争，团结和教育了人民，锻炼了自己。一九一一年，斯托雷平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死。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从此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帝国主义国家两大军事集团，

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一场掠夺性的战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国家先后结成以德、奥、意为首的“同盟国”和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双方为重新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奥国皇太子弗兰西斯·斐迪南在塞尔维亚首府萨拉热窝被刺，成为大战爆发的导火线。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奥匈帝国在德国的唆使下进攻塞尔维亚。八月，德、奥向英、法、俄宣战，随后加入“协约国”的有日本、美国、中国。加入“同盟国”的有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国。战火遍及亚、欧、非三洲，以欧洲为主要战场。一九一八年九月，“同盟国”中土耳其、保加利亚先后请降。最后，德国也被迫投降。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大战以“同盟国”集团失败而告终。

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四年零三个月，有三十三个国家参战，被卷入战争的人口达十五亿以上。这次战争给各参战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了空前的、极其深重的灾难，也促使各帝国主义国家内阶级斗争激化和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的加深。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一场世界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经过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七年两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矛盾不但仍然存在而且变得更加激化。同时，由于社会主义苏联的出现，

社会主义苏联同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在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夺又相互勾结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英、美、法和德、意、日两大集团。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力图重新瓜分世界，不断对弱小民族发动一系列局部战争；而英、美、法等国为了维持其殖民统治，妄图诱使德、意、日进攻苏联。英、美、法对法西斯的侵略活动采取绥靖主义的态度，从而助长了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气焰。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国突然袭击与英、法订有盟约的波兰；九月三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大战可分为两个阶段。在初期阶段（一九三九年九月——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侵占西欧和巴尔干半岛，迫使法国投降；英军被迫退出西欧大陆；随后，德军侵入东南欧各国；意大利夺取英、法在地中海和非洲所占的殖民地。在这个阶段，战争的性质，无论在英、法方面，或德国方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帝国主义的战争。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进攻苏联，苏联人民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展开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大战进入第二阶段（一九四一年六月——一九四五年八月）。一九四二年八月，开始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次战役消灭了德国侵略军的大量有生力量，它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而且也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此后，苏联红军开始反攻，德军节节败退。在这期间，英、美军队在北非获胜，并在意大利登陆。一九四三年九月，意大利投降。一九四四年六月，英、美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无条件投降。

在东方战场上，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的阴谋，进行了伟

大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极大地援助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反法西斯各国人民的胜利而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空前规模的战争，先后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二十亿以上的人口卷入了这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布拉格代表会议

一九一二年一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

一九一〇年一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全会后，孟什维克取消派加强了取消主义的宣传，疯狂破坏国内外党的组织。一九一二年一月五日至十七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了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俄二十多个党组织的代表，代表了所有在俄国活动的党组织。会议讨论了形势和任务、党的组织工作等问题。列宁领导了这次会议，作了一系列报告，并就会议议程上各个最重要的问题拟定了决议草案。

会议决定将孟什维克驱逐出党，结束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同在一个党内的形式上的统一。从此，布尔什维克从一个政治派别成为一个独立的、新型的政党，即布尔什维克党。

齐美尔瓦尔得会议

一九一五年九月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得村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人民群众反战情绪空前高涨。为了把各国左派队伍团结起来，建立无产阶级新的国际组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国际修正主义的泛滥，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倡议下，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于一九一五年九月五日至八日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欧洲十一个国家的三十八名代表。其中占多数的是考茨基派。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在会议上，以列宁为首的国际主义者同考茨基主义者展开了激烈斗争。由于列宁和各国左派的努力，会议通过了宣言，宣言指出了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谴责了“保卫祖国”的口号，谴责了机会主义者违背《巴塞尔宣言》、投票赞成军事预算和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行为，号召欧洲无产阶级展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争取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但宣言没有指出第二国际各国党的背叛和第二国际的破产，没有采纳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重要观点，也没有谴责社会沙文主义。因此，这个宣言是妥协的、不彻底的。但考虑到它在同机会主义实行决裂方面前进了一步，所以，在表决时，以列宁为首的左派发表了一个声明，指出了宣言的缺点，同时也在宣言上签了字。列宁称这次会议是走向第三国际的第一步，朝着同机会主义分裂的方向走的畏缩而又不彻底的一步。

这次会议的最大成就是团结了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组成

了齐美尔瓦尔得左派集团，成立了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常务局，并出版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先驱》杂志，为第三国际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昆塔尔会议

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在瑞士的昆塔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第二次代表会议，又称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得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共有四十三名代表，其中左派代表十二名，比上次会议有所壮大。这次会议讨论的最重要问题是无产阶级如何对待和平的问题。在列宁和左派的坚持下，会议通过了一项斥责社会和平主义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的决议，并且通过了一项和平宣言，号召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要求社会党议员拒绝支持帝国主义政府的军事政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持久和平，要争取持久和平就只有争取实现社会主义。这个宣言比齐美尔瓦尔得会议通过的宣言前进了一步，它不仅批判了社会沙文主义，而且也批判了社会和平主义。但是，会议没有采纳布尔什维克党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和建立第三国际的主张。尽管昆塔尔会议有缺陷，以列宁为首的左派还是投票支持会议的宣言和决议，同时又采取了保留的态度。

这次会议进一步提高了各国左派的政治觉悟，促使他们同机会主义者决裂，增进了各国左派之间的国际团结，并为以后第三国际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俄国二月革命

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历)俄国无产阶级在其政党领导下进行的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历时多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使俄国的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土地荒芜，工厂停工，粮价暴涨，物资奇缺，人民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整个俄国变成了一个囚禁人民的军事苦工监狱。广大人民对沙皇制度深恶痛绝，阶级矛盾急剧激化。战争期间，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教育和领导下，俄国工农群众反对战争，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迅猛发展，沙皇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革命形势已趋成熟。

一九一七年二月十八日(公历三月三日)，彼得堡工人为纪念一九〇五年一月“流血星期日”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二月二十三日(公历三月八日)彼得堡的女工们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举行反对饥饿、反对战争、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示威游行。男工也走上街头，支援女工的革命行动。二月二十五日，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罢工变成了起义。驻守在彼得堡的六万多士兵拒绝向工人开枪，转到革命方面来。起义的工人和士兵逮捕了沙皇政府的大臣和将军，释放了政治犯。彼得堡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出后，全俄各地纷纷响应，摧毁了沙皇政权。二月革命胜利了，骑在俄国人民头上达三百多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终于被人民推翻了。

二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临时政府，这个政权是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背着人民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二日成立的。另一个政权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它是二月革命胜利后的

最初几天，由起义工人和士兵根据一九〇五年革命经验而建立的。两个政权的同时并存，反映了二月革命后俄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说明了俄国革命正处在一个过渡的、不稳定的阶段。

七月事变

一九一七年七月三日(公历七月十六日)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镇压工人群众游行示威的事件。

一九一七年六月，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支持下，临时政府利用在前线发动进攻来挽救自身的政治危机，但进攻很快就失败了。消息传来，群情激愤。七月三日，工人和士兵走上街头，举行武装示威，要求政权归苏维埃。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认为，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的时机尚未成熟，但群众已行动起来了，便决定将这次示威变成有组织的和平示威。临时政府纠集了反革命武装力量，对和平示威的群众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接着，临时政府又大肆逮捕革命者，封闭、捣毁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和印刷厂，解除工人赤卫队的武装，七月七日下午下令逮捕列宁。白色恐怖笼罩着全俄各地。

七月事变表明，政权完全落入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已告结束，摆在布尔什维克党面前的任务，就是准备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

一九一七年八月俄国资产阶级策划的一次反革命军事叛乱。

七月事变后，临时政府为挽救其垂死的命运，任命沙皇俄国将军科尔尼洛夫为陆军总司令。为镇压革命运动，科尔尼洛夫公然要求在军队内“废除各委员会和苏维埃”，并采取残酷的办法压制军队中的革命情绪，“加强前线纪律”和整顿后方“秩序”等等。在克伦斯基政府的策划和国际反动派的支持下，科尔尼洛夫于八月二十五日命令第三骑兵团和由高加索山民组成的“野蛮师”进攻彼得格勒，企图消灭苏维埃，成立军事独裁政府。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领导下，一方面发动群众反对叛乱；另一方面揭露临时政府及其帮凶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阴谋。几天后，叛乱就被粉碎了。列宁说：“科尔尼洛夫暴动是地主和资本家所支持、立宪民主党所领导的军事阴谋，这种军事阴谋事实上已经是资产阶级发动的国内战争的开端。”（《列宁全集》第26卷，第12页）

这次叛乱被粉碎后，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俄国国内的形势。人民群众认清了临时政府及其帮凶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反革命面目，并从实践经验中认识到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是正确的，从而纷纷转到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一边。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历十月二十五日）俄国无产阶级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人民带来了饥饿、贫困和死亡，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空前高涨。因此，爆发了二月革命。二月革命后，窃取政权的资产阶级马上反过手来，首先把刺刀

提到日程，对布尔什维克和革命人民实行血腥镇压，制造了七月流血事件，把无产阶级浸入血泊之中。这一切说明，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用革命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俄国无产阶级的唯一出路。布尔什维克党根据列宁的指示，提出了经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日，列宁从国外回到彼得堡，亲自领导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十一月七日，彼得堡工人和士兵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彼得堡各重要据点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当晚，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农民书》，宣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并通过了《和平法令》与《土地法令》，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此诞生了。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革命。它和以往任何阶级的革命不同，它从根本上推翻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成功地冲破了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即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它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变成现实，从而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的彻底破产。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表明，无产阶级要获得革命的

胜利，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同贫苦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以革命暴力打碎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经验反映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

苏维埃和平法令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历十月二十五日)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它是苏维埃政权对外政策的第一个法令，是列宁亲自起草的。该法令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和政府建议立即停战，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废除沙皇俄国同东方各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同时，号召资本主义国家的觉悟工人，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

苏维埃土地法令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历十月二十五日)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是苏维埃政权第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立法文件。该法令是列宁提议制定的。它宣布永远废除土地私有制，确立全部土地、矿藏、森林、河流无偿地收归国有，没收地主、皇室、寺院、教堂的土地连同耕畜、农具、庄园建筑和一切附属物，由乡土地委员会和县苏维埃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使用。按这个法令，全俄农民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共领得了一万五千俄亩的土地，从而使农民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皇室、寺院和教堂交纳的约五亿金卢布的租金。

苏维埃国内战争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同国内反革命武装和外国武装干涉者所进行的战争。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国际帝国主义者妄图在苏维埃政权尚未巩固的时候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企图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这两股反革命力量很快联合在一块，国内的反革命叛乱成为国际帝国主义对苏维埃政权武装干涉的内应。

一九一八年春，英、法、美、意、日等十四国干涉军先后侵犯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乘机发动叛乱，先后在北部和中部地区组织了反动政府。俄国各族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投入了艰苦的国内战争。在战争的第一个时期，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克服了经济上的巨大困难，保证了战争的胜利进行。一九一九年三月，战争进入第二个时期，红军先后粉碎了邓尼金、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弗兰格尔等白匪军的三次进攻，并逐步收复了被白匪军占领的地区，到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国内战争结束。经过近三年的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进攻，保卫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

一九一八年芬兰革命

一九一八年一月芬兰南部赫尔辛基、维波尔格等城市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影响下，芬兰南部各大城市的工人在中央革命工人委员会领导下，于一九一七年十

一月十三日，举行政治总罢工。一星期后，罢工转为武装起义。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赤卫队占领了赫尔辛基。一月二十九日，组织了革命政府——芬兰人民委员会。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把芬兰北部变为反对革命的基地，组织了富农白卫军，挑起内战，在德国、瑞典的反动军队和俄国白卫军的帮助下，于一九一八年二月开始向南部无产阶级发起进攻。芬兰的无产阶级及其赤卫军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叛卖性策略及反革命势力的强大，经过三个月激烈内战，到一九一八年五月在芬兰白卫军和德国反动军队的联合进攻下，芬兰的无产阶级被残酷镇压，成万的工人群众惨遭枪杀，白色恐怖笼罩着芬兰。一九一八年革命失败了。

布列斯特和约

一九一八年三月苏维埃俄国同德国在布列斯特签订的和约。全称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尚在进行，俄国还处于同德、奥等国交战的状态。列宁认为，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必须退出帝国主义战争，迅速同各交战国缔结和约。签订和约不是为了向帝国主义投降，而是为了准备同它进行严肃认真的战斗，这是采取的暂时退却的策略。一九一七年底，苏维埃政权同德国在布列斯特进行单独谈判。但是，党内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拚命反对这一正确方针，又由于当时担任首席谈判代表的托洛茨基从事破坏活动，致使德军于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八日发动全面进攻，直接威胁到彼得堡。以后，在重新恢复谈判的时候，德国提出了十分苛刻的割地赔款条件。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布列斯

特和约终于签订。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宣布废除这个和约。

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使年轻的苏维埃俄国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巩固了政权，恢复和整顿了国家经济，建立了红军，为以后击溃白匪军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正如列宁所说：“布列斯特和约的重大意义，在于我们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第一次大规模地利用了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使社会主义终于占了便宜。”（《列宁全集》第31卷，第400页）

奥匈帝国一九一八年革命

一九一八年十月奥匈帝国各地相继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一八六七年，奥、匈统治阶级签订协定，在奥地利帝国的基础上建立奥匈帝国，奥皇兼任匈牙利国王和奥匈帝国元首。奥、匈各自设立政府和议会，但外交、国防和财政则由帝国政府统一管理。二十世纪初，奥匈帝国不断扩大军备，对外进行侵略战争；对内则一贯实施民族压迫，加紧封建剥削，引起人民不断地反抗。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促使国内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一九一八年十月，奥匈帝国各地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和波兰等一系列新的民族独立国家。反动、腐朽，被称为“民族大监狱”的奥匈帝国从此崩溃。

德国十一月革命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面临着军事、经济的总崩溃。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国内的革命运动空前高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三日，基尔军港的水兵举行起义，宣告了十一月革命的开始。十一月九日，柏林工人和士兵在以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为首的斯巴达克团的号召下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

起义胜利后，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首领谢德曼篡夺了工兵代表苏维埃的领导权，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成立了艾伯特——谢德曼临时政府，宣告“自由德意志共和国”诞生。艾伯特——谢德曼政府推行的是保护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反对斯巴达克团提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与苏俄友好等主张，并把斯巴达克团排除于政府之外。斯巴达克团揭露了艾伯特——谢德曼政府的反动政策，为了从组织上同机会主义决裂，更好地领导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斯巴达克团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脱离了社会民主党，成立了德国共产党。一九一九年一月，艾伯特——谢德曼政府蓄意挑起战斗，对柏林工人的示威游行进行了血腥镇压。德国工人阶级的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以及数以万计的德国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惨遭杀害。一九一九年四月，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工人起义，成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但不久又遭到反动政府的残酷镇压。至此，德国十一月革命结束。

这次革命是一次规模巨大的、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群众

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革命高涨的重要组成部分。

匈牙利一九一九年革命

一九一九年三月，匈牙利共产党领导的一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匈牙利内部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劳动群众对当时的物价高涨、商品不足、粮食困难等情况非常不满，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间曾举行过罢工。大战结束后，奥匈帝国解体，匈牙利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匈牙利共产党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诞生。一九一九年二月，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口号。同年三月二十一日，共产党领导布达佩斯的工人和士兵举行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由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共同组织苏维埃政府。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其主要内容是：全部土地国有；银行、工业和运输业国有；对外贸易与批发商业国家专营制；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教会与国家分离；两党加入共产国际；同苏俄结成同盟等。

由于年轻的匈牙利共产党在斗争中犯了一些严重错误，如没有镇压反革命，没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在同社会民主党合并时取消了独立的共产党。加之国内严重的财政和粮食危机，反革命叛乱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特别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背叛，匈牙利苏维埃政府只存在了一百三十三天。一九一九年八月一日，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

中被推翻。这次革命给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日本“米骚动”

一九一八年八月至九月，日本劳动群众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的自发的革命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日本的地主资产阶级大发横财，却给劳动人民带来贫困和灾难。一九一八年八月，日本政府又参加了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随着战争的急剧发展，日本国内粮食十分紧张，政府又抢购军粮，米商乘机囤积居奇，致使米价暴涨，人民生活更为恶化，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一九一八年八月三日，富山县西水桥町的渔村妇女冲入米店反对米商抬高米价和食粮外运，并同前来镇压的警察发生冲突。八月十二日，“米骚动”席卷全国，普遍发生了捣毁米店、殴打米商、袭击军警等事件。某些地方还爆发了罢工、示威和暴动，发展成为一次反对封建和资本主义压迫的群众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约有一千万人以上，时间延续达三个月之久。但由于缺乏组织和领导，最后被反动政府残酷镇压下去。日本人民从这次起义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促进了无产阶级觉悟的提高，推动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一九二二年成立了日本共产党。从此，日本人民的解放运动进入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时期。

朝鲜人民“三·一”运动

一九一九年三月朝鲜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一九一〇年，日本吞并了朝鲜，从此，朝鲜成了日本的殖民

地。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深受日本压迫的朝鲜人民革命情绪极为高涨。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汉城市民高呼“朝鲜独立万岁”的口号，举行示威游行。接着，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相继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和示威游行。三月五日起，许多地方转为武装起义。参加这次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群众共有二百多万人。后因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叛卖，起义被日本统治者用极野蛮的手段镇压下去。但是，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从此进入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阶段。

印度尼西亚一九二六年起义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荷兰殖民主义统治的起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荷兰殖民主义政权加强了对印度尼西亚的掠夺和统治，印尼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下，爪哇岛上的雅加达市和万丹市的人民举行反对荷兰统治者的起义。次年年初，起义蔓延到苏门答腊，形成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起义。由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尚处于幼年阶段，斗争经验不足，致使运动失败，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和枪杀。从此，印尼共产党转入地下，斗争暂时处于低潮。

这次起义震撼了荷兰在印尼殖民统治的基础，鼓舞和推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特别是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

基马尔革命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土耳其争取民族独立的资产

阶级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意等国瓜分了土耳其的大部分领土，任意奴役土耳其人民。土耳其工农群众纷纷开展反占领军的游击活动。一九一九年，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基马尔组织了以商业资产阶级为核心的护权协会，领导民族解放运动。英帝国主义者指使它的附庸国希腊对土耳其进行武装干涉。土耳其人民在苏维埃俄国的支援下，于一九二二年战胜了希腊军队。一九二三年，基马尔创建人民共和党，同年成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土耳其共和国，基马尔当选为总统。

基马尔在执政期间，执行了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他解散人民群众组织的游击武装，镇压工农运动，迫害共产党。总之，基马尔式的革命，是民族商业资产阶级上层革命，它是在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产生的。在其继续发展中，它又反对农民和工人，阻碍土地革命的进行。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所谓基马尔的土耳其，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的怀抱，一天一天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横排合订本第642页）

英国一九二六年大罢工

一九二六年五月，英国工人阶级反对剥削和压迫的一次规模巨大的罢工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曾称霸于世的“大英帝国”开始衰落下来。资产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进一步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一九二六年四月，英国煤矿矿主提出降低工人工资百分之十，并延长工作日一小时。五月一日，矿主以同盟歇业相威胁，要工人接受其条件。五

月三日，矿工在英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对削减工资举行罢工。次日，全国开始了总罢工。参加罢工的达六百万人，使全国所有大工业区陷于瘫痪。后来，由于全国职工大会总理事会右翼领导背叛工人利益，并勾结当时任英国政府财政大臣的邱吉尔，采取分化收买政策，孤立矿工斗争，使这次罢工遭到失败。但英国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和罢工规模震撼了全世界。

国会纵火案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后，为镇压共产主义运动而制造的挑衅事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希特勒夺取政权后，立即实行反动恐怖政策，疯狂镇压人民革命运动。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在希特勒亲信、国会议长兼内政部长戈林的指使下，法西斯分子焚烧了柏林的德国国会大厦，却诬陷共产党为纵火犯。于是，法西斯军警在全国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三月三日，德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台尔曼被捕。三月九日，当时在德国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季米特洛夫被诬告“参加国会纵火”而遭逮捕。九月至十二月，在来比锡法庭开始了“国会纵火案”的审讯。在法庭上，季米特洛夫义正辞严地揭露了法西斯的反动本质和卑鄙行径，阐释了共产主义原则和纲领，由被告而变成了审判者。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庭被迫宣布季米特洛夫无罪，但仍把他关在地牢里。在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之下，德国法西斯不得不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将季米特洛夫释放。

慕尼黑协定

一九三八年九月德、意、英、法四国首脑在德国慕尼黑签订的《德国、联合王国、法国及意大利间的协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极力纵容德国法西斯。希特勒气焰十分嚣张，妄图称霸欧洲，重新瓜分世界。它首先并吞了奥地利，接着又提出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要求，并陈兵德捷边境，企图用武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幻想以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把祸水引向东方，推动德国法西斯向社会主义苏联发动进攻，从而保全自己的利益。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在美国的支持下，背着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同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在慕尼黑签订了臭名昭著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协定”即《慕尼黑协定》。

协定共分八条。主要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在十天之内将苏台德以及捷奥接壤的南部地区割让给德国；同时，这些地区的军事设施、工矿企业、运输工具等不得受到破坏；捷克斯洛伐克剩下的领土由德、意、英、法“保证”不再受侵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德国军事威胁和英、法的压力下，接受了慕尼黑协定。

但是，英、法等国的绥靖政策不仅没有使战争危机有丝毫缓和，反而更加助长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气焰。德国法西斯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占领了苏台德区后，一九三九年三月又出兵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全部领土，并于同年九月进攻与英、法订有盟约的波兰，终于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搬

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之流政策的必然结果。张伯伦之流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后来，人们把类似这种几个大国纵容侵略、出卖他国的阴谋叫做“慕尼黑协定”。

德黑兰会议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会议。会上主要讨论了有关加速击溃德国法西斯和战后和平问题。会后发表了《德黑兰宣言》和《关于伊朗的宣言》。《德黑兰宣言》主要内容是声明三国已拟定了消灭法西斯德国军事力量的详细计划，并就三国联合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时间取得了协议，规定盟国军队应于一九四四年五月发动诺曼底登陆战役。《关于伊朗宣言》表示三国对伊朗政府维护其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愿望表示赞成，并保证在战时及战后继续给予经济援助。会议有利于反法西斯联盟的加强，但后来英、美两国政府完全违背了自己应承担的义务。

茉莉芬事件

一九四八年由印度尼西亚反动派制造的一起反革命事件。

一九四八年八月，美、荷帝国主义慑于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伙同印尼哈达反动政府共同策划“消灭红色分子的建议”计划，并供给印尼反动政府以武器和活动经费。同年九月一日，印尼哈达反动政府借“裁军”为名，

采用绑架和暗杀等各种手段来解散一向主张民族独立、受革命影响的军队，造成了梭罗地区的武装冲突事件。九月十八日，当这个卑鄙阴谋引起茉莉芬地区的反对时，哈达反动政府借此掀起反共恐怖浪潮，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共产党人被迫进行自卫。在这次斗争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表现了高度的英雄气概和坚定的革命意志，为维护民族利益，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约一万多名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被杀害，其中包括共产党领袖慕梭和沙里弗丁等二十多名领导干部。有二万五千多人被捕入狱。党的数万名武装力量被打散，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一九五四年四月，我国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印度期间，代表我国政府同印度政府签订的一项协定中首次提出。

五项原则是：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四、平等互利；五、和平共处。它是我国处理国际关系时所遵循的指导原则，它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已被许多国家所承认。

亚非会议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亚、非二十九个国家的代表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市举行的会议。

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是这次会议的发起国。周恩来总理率领我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这是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由渴望掌握自己命运的亚洲和非洲国家第一次当家作主自行召开的，讨论

对亚非人民切身利益有关的共同问题的国际会议。会议广泛地讨论了民族主权和反殖民主义斗争，世界和平和合作，与会各国的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由于中国和大多数与会国的努力，击败了帝国主义破坏会议的阴谋，严正地谴责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罪行，支持被压迫国家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斗争。会议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宣布殖民主义是应该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倡议以和平共处十项原则（即：1.尊重基本人权、《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2.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3.承认一切种族平等，大、小国家平等；4.不干涉他国内政；5.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6.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为任何大国特殊利益服务，不对他国施加压力；7.不侵略他国；8.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9.促进相互利益和合作；10.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作为有关国家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基础。会议所反映的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和增强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精神，被称为“万隆精神”。这次会议有力地推动和鼓舞了亚非地区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斗争。

(六)

《莱茵报》

即《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由莱茵省的一些工业家和商人集资创办。一八四二年一月一日至一八四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在科伦出版。创办时该报编辑部负责人是青年黑格尔派。一八四二年四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十月起，任该报主编。在马克思担任主编期间，该报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声誉日益扩大。这种民主主义倾向引起了政府当局的恐惧和不满，并受到反动报刊的攻击。一八四三年一月十九日，普鲁士政府决定：从一八四三年四月一日起查封《莱茵报》，在查封之前对该报实行特别严格的双重检查制。马克思在一八四三年三月十七日发表声明，宣布退出编辑部。不久，该报被迫停刊。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德法年鉴》

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青年黑格尔派卢格在巴黎合办的德文刊物。仅在一八四四年底出过一期双刊号，是唯一的一期。该杂志上刊有马克思的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还刊载了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这些文章，阐述了自己的新观点，反映了马克思、恩格

斯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前进报》

(一) 一八四四年一月至十二月，在巴黎用德文出版的报纸。创办人是经营戏剧业和出版业的德国人波恩斯坦。一八四四年夏天开始，马克思参加该报编辑工作，利用该报，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为该报写了许多文章，尖锐地抨击普鲁士的反动专制制度。该报还系统地阐述德国工人的状况和介绍法国工人的阶级斗争，以鼓舞德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因此，普鲁士政府要求法国政府查封该报，并驱逐编辑人员出境。该报在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版了最后一期。马克思被迫迁居布鲁塞尔。

(二) 一八七六年十月，在来比锡出版的《前进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主编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公布后，该报于一八七八年十月停刊。从一八九一年起，又用《前进。柏林人民报》名称出版，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恩格斯经常在该报发表文章，并纠正编辑部的错误，帮助编辑部和机会主义作斗争。恩格斯逝世后，该报经常发表机会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站到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该报于一九三三年停刊。

(三) 此外，许多党派也曾用《前进报》的名称办过机关报。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的《前进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也办过《前进报》。还有意大利社会党的《前进报》，加里西亚和西里西亚波兰社会民主党

的《前进报》等。

《新莱茵报》

全称是《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是世界上第一张无产阶级的报纸，总编辑是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为了能直接指导德国革命，于一八四八年四月上旬，从巴黎回国，着手创办一份大型日报，作为宣传革命主张，团结、教育、组织一切革命力量，为彻底实现民主革命任务而斗争的战斗武器。他们选择工业发达、无产阶级比较集中并有出版自由的莱茵省科伦市作为活动基地和办报地点。为了区别于一八四二年的《莱茵报》，而称为《新莱茵报》。由于策略上的需要，以民主派机关报的名义出现，但到处都“强调了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该报于当年六月一日正式出版。

该报的社论和重要文章几乎都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执笔。这些社论和重要文章，评论了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一些最迫切的问题；坚决支持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揭露了当时欧洲反动支柱沙俄的侵略扩张政策；号召无产阶级联合农民，起来推翻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朝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而斗争。列宁称它“是革命无产阶级最好的机关报”。

（《列宁全集》第21卷，第60页）

《新莱茵报》的战斗精神，引起了普鲁士政府的不安。一八四八年九月，普鲁士政府下令该报停刊，并制造借口，通缉恩格斯，迫使恩格斯流亡国外三个月。在马克思坚持下，报纸于十月复刊。但反动政府仍不断进行刁难。一八四九年

二月，普鲁士当局又以报纸侮辱检察长和诽谤宪兵的罪名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诉讼，并搜查编辑部。此外，由于资产阶级股东对报纸的革命方针不满，以改组编辑部、驱逐马克思为要挟，停止对该报的投资。在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坚持革命阵地，马克思毅然卖掉了自己的印刷机、家具、首饰等，接收了报纸，独自承担了报纸的全部债务。

一八四九年五月，反动当局以没有普鲁士国籍为借口，下令驱逐马克思出境；又以参加爱北斐特起义的罪名下令逮捕恩格斯。《新莱茵报》被迫停刊。五月十九日，该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301号，发表了马克思亲自写的题为《致科伦工人》的告别词。文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19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九年十二月创办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性刊物，是《新莱茵报》的续刊。该杂志共出了六期，其中第五、六期是合刊。一八五〇年十一月停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杂志上发表了马克思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德国农民战争》等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革命经验，进一步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了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

《民主周报》

是德国工人的报纸。一八六八年一月至一八六九年九月

在来比锡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主编。从一八六八年十二月起，成为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开始时，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经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开展了同拉萨尔主义的斗争，宣传第一国际的思想，刊登第一国际的重要文件，为创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起了重要的作用。一八六九年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宣布该报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并改名为《人民国家报》。

《人民国家报》

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从一八六九年十月二日至一八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在来比锡出版，每周两次，一八七三年起改为每周三次。由于该报经常反映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刊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在反动政府的迫害下，编辑常被逮捕，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总的领导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中。

根据一八七六年哥达代表大会的决定，从一八七六年十月一日起出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统一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以代替《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

是德国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从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六年在柏林用德文每周出版三次。该报完全反映了拉萨尔派所执行的迎合俾斯麦政府的政策，反映了拉萨尔派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观点。该报站在宗派主义

立场上，一贯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分子等反对派反对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活动。一八七六年哥达代表大会后，出版统一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该报即停刊。

《社会民主党人报》

（一）德国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在一八六四年十二月至一八七一年出版的机关报。在一八六四年至一八六七年期间，由约·巴·施韦泽任主编。该报曾刊登过马克思的《论蒲鲁东》、《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恩格斯翻译的古代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发觉该报的错误观点，就发表声明和该报断绝关系。该报于一八七一年停刊。

（二）在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报——《前进报》停刊后，用《社会民主党人报》名义出版周刊。一八七九年九月至一八八四年八月在苏黎世出版，一八八八年十月至一八九〇年九月在伦敦出版。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〇年由格·福尔马尔任主编。一八八一年至一八九〇年由爱·伯恩施坦任主编。马克思、恩格斯经常批评和纠正该报的错误。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该报停刊，又恢复《前进报》为党中央机关报。

（三）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从一九〇八年二月到一九一七年一月，共出版五十八期。创刊号在俄国出版，以后在巴黎、日内瓦等地出版。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的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

该报刊登了列宁的八十多篇文章以及斯大林的不少文章。列宁努力使编辑部贯彻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一部分编辑(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对取消派采取调和态度。孟什维克的马尔托夫和唐恩在编辑部内怠工,并在他们小集团的报刊上公开为取消派辩护。列宁和他们作了坚决的斗争。马尔托夫和唐恩于一九一一年六月退出编辑部。自一九一一年十二月起,该报由列宁主编。

(四) 一九〇六年九月十七日至十一月十八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彼得堡秘密发行的机关报。实际上是孟什维克的机关报。

《新时代》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一八八三年至一八九〇年十月是月刊,以后改为周刊。一八八三年至一九一七年十月,由卡·考茨基任主编;一九一七年十月至一九二三年秋,由享·库诺夫任主编。

恩格斯十分关怀《新时代》杂志的工作。从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五年,恩格斯在该杂志上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法德农民问题》、《资本论第三卷的补充和附录》等等。恩格斯还为杂志提供文学作品和书评,介绍外国通讯员,尽力扩大该杂志在国外的影响,直至关心刊物的经济困难。

恩格斯逝世后,杂志开始登载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如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纲领》。该杂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

《纽约每日论坛报》

是一八四一年至一九二四年在美国出版的报纸，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派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马克思从一八五一年八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一八六二年三月。马克思还约请恩格斯为该报写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和罪恶。

该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随意处理，有些文章甚至不署作者姓名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自一八五五年中期起，所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都不署名，有时还删改内容，任意加注日期。编辑部的这种行为一再引起马克思的反对。后因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转向右倾，马克思遂停止为该报撰稿，并与其断绝了关系。

《火星报》

全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性报纸。最初是由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代表列宁、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和劳动解放社的代表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六人组成《火星报》编辑部。从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一期到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四日第五十一期，先后在来比锡、慕尼黑、伦敦和日内瓦出版，报头下面的题词是“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烈焰！”

创办《火星报》，是列宁建党工作的第一步。一八九八

年虽然召开过党的“一大”，但在组织上，党并没有建成。为了反对腐蚀党的“经济主义”，为了克服当时严重存在的“思想上分离”、“组织上涣散”、“政治上动摇”的“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有政治要求的独立政党，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时，就周详地考虑建党计划——通过报纸，弄清党的目的和任务，聚集干部以及把他们结合成全俄集中的战斗性的革命政党的核心。但这样的报纸在警察监视下不可能在沙俄境内出版，因此列宁从流放所出来后，即去国外与劳动解放社磋商共同出版事宜。

《火星报》不仅成为思想上策略上统一党的认识的工具，而且从组织上把俄国已存在着的许多小而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串联起来。《火星报》在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按照列宁在《火星报》所拟定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一九〇三年七月三十日召开了党的“二大”，建立了俄国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

党的“二大”宣布《火星报》为党中央的机关报，但《火星报》内存在着激烈的思想和路线斗争。在党的“二大”上，批准参加《火星报》新编辑部的是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三人，但马尔托夫硬是要把原先六个编辑中拥护他的另外三个孟什维克也选进编委会，否则就不参加编辑部。普列汉诺夫被这种分裂的要挟所吓倒，主张调和，要求被大会否决的三个旧编辑加入编辑部。列宁不同意这种做法，于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一日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而从中央委员会这个阵地继续反对机会主义。不久，普列汉诺夫帮助孟什维克篡夺了《火星报》领导权。孟什维克把《火星报》变成

了宣传自己机会主义观点和反对列宁及布尔什维克的阵地。从这时起，党内把列宁曾主持过的《火星报》第一期到第五十一期称为旧《火星报》，而把第五十二期后孟什维克办的《火星报》叫做新《火星报》，以示区别。

《曙光》

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理论杂志。由列宁、普列汉诺夫等担任主编，和《火星报》同一个编辑部。一九〇一年四月至一九〇二年八月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版四期，第二、三期是合刊。杂志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俄国党内的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以及国际上的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曙光》杂志曾刊载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等著作。

《无产者报》

(一)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创办的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周报。一九〇五年五月十四日至十一月十二日在列宁领导下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二十六期。列宁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回俄国后，该报停刊。

(二)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的)代表大会以后，布尔什维克经办的秘密报纸。一九〇六年八月二十一日至一九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由列宁主编，共出版五十期。前二十期在芬兰出版，后三十期在日内瓦和巴黎出版。该报刊载了列宁的一百多篇文章。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它对于保存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九一〇年停刊。

(三)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三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日报。它代替被临时政府封闭的《真理报》，共出版了十期，在同年八月二十四日即停刊。主编是斯大林。

《斗争报》

是梯弗里斯社会民主党用格鲁吉亚文秘密出版的报纸。发起人是斯大林。该报在巴库秘密印刷。报纸上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和策略等论文是斯大林写的。从一九〇一年九月至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共出四期，第二、三期是合刊。《斗争报》也同《火星报》一样，捍卫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

《真理报》

布尔什维克的全国指导性、群众性日报。

一九一二年连纳金矿工人罢工，惨遭枪击，死伤五百人，激起全国性抗议怒潮。连纳事件期间，专供先进工人阅读的布尔什维克的《明星》周报在报道工人生活、驱散谎言、揭露真相、提出斗争口号上曾起过很大的作用。但在革命高涨的情势下，周报已不能满足需要，必须出版一种能供最广大工人阅读的、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公开的政治日报。由于彼得堡工人倡议和全国工人捐助，根据列宁的指示，在《明星报》的基础上，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创办了《真理报》。

《真理报》使党建立并扩大了同工人群众经常的联系，是党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组织，争取把广大群众团结在自己旗帜周围的思想武器。列宁对《真理报》进行了思想领导，几乎每天都忙着给报纸写文章，给编辑部以指示。斯大林、斯

维尔德洛夫、莫洛托夫都参加了《真理报》的编辑工作。高尔基在文艺栏起了很大作用，在报纸周围形成广大的工人通讯员网和进步写作团体。《真理报》培养起来的一代先进工人，后来在十月革命中起了杰出的作用。

《真理报》不单纯是一张宣传鼓动的报纸，它还进行相当多的党的组织工作。各个工厂里党的工作报告送到这里来，而中央和彼得堡党委会的指示从这里转发出去。《真理报》在维护党性，在重建群众性的工人政党的斗争中是个领导中心，它使各地方组织在党中央周围彼此联系起来，它把合法组织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秘密组织的周围。

沙皇政府曾采取一切措施力图绞杀《真理报》：警察搜查、勒索罚款、没收报纸、关押编辑，在该报出版的头两年零三个月中就被封禁过八次。但《真理报》在工人援助下，顽强地不断更换名称继续出版，直到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终于被沙皇政府封闭停刊。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八日，《真理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机关报复刊。列宁一回国就参加了编辑部的领导工作。在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和印刷所又被捣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屡次迫害，使报纸不得不多次更换名称出版。直到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十一月九日，才复用《真理报》原名，作为俄共(布)中央机关报出版。

现在，《真理报》仍为苏共中央的机关报。

《国际歌》

一八七一年，法国工人诗人、巴黎公社委员欧仁·鲍狄

埃在巴黎公社失败后，怀着对阶级敌人的满腔仇恨，对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强信念，写了《国际歌》歌词，并在一八八七年发表。一八八八年法国工人作曲家比尔·狄盖特看到歌词后，连夜把这首诗谱上了歌曲，于一九〇二年正式发表。这就是巴黎公社的工人阶级用生命和鲜血谱成的《国际歌》。列宁称它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列宁选集》第2卷，第434页）

君主制

在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由世袭的君主为国家元首的一种政治制度。君主制分为专制君主制和有限君主制两种。

专制君主制也称专制制度或专制政体，以世袭君主为国家元首，实行君主独裁，掌握全部国家权力，君主权力不受限制，故又称无限君主制。奴隶主阶级和封建主阶级国家，通常采用这种政治制度。

有限君主制又分为等级代表君主制和君主立宪制。等级代表君主制由等级代表会议限制君主的权力，例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等级代表由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产生。有限君主制也是封建地主专政的一种政权形式。

君主立宪制

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政权形式，是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妥协的产物。在这一形式下，君主的权力受到宪法的限制，故又称有限君主制，资产阶级则通过制宪、立法和行政取得一定的权力。

君主立宪制国家有议会制和二元制两种。议会制是君主

不直接支配国家政权，由内阁掌握行政，并对议会负责，如英国。二元制是君主任命对自己负责的内阁，直接掌握行政，立法权归议会行使，但君主对议会通过的法案有否决权，如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德意志帝国。

共和制

即共和政体。泛指国家代表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叫共和国。

在剥削制度下，国家机关和元首的选举，只是在剥削阶级内部选择能更好地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代理人。共和制又有总统制与内阁制之分。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新型的共和制，成为全体人民积极参加国家管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

两党制

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由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两大政党交替组织政府的制度。起源于英国。十七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国会中有着代表新兴资产阶级——新贵族利益的辉格党和代表地主——贵族利益的托利党相对峙，到十八世纪后期形成一种制度，流行于英、美等国。它通过几年一次的议会选举或总统选举，由在议会中获得多数议席或当选总统的政党，组织政府，成为执政党，失败的政党退出政府，成为反对党（亦称在野党）。现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每隔四年竞选一次总统，就是典型的两党制。其实这些政党彼此竞选，交替执政，无非是在伪装民主的幕布下，欺骗劳动人民，维护资产阶级专政。

议会制

亦称“国会制”或“代议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政权形式。资产阶级宪法标榜议会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最高机关。宪法中规定议会行使立法和监督政府的权力，政府由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组成，并对议会负责。资产阶级把议会宣扬为反映全国人民意志，实现民主政治的标志。实际上，在议会形式下，全部政权集中在资产阶级手中。议会权力的大小，是由资产阶级根据它的利益来决定的。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议会权力逐渐缩小，行政权力逐渐扩大，立法权实际掌握在政府手中，议会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和工具。

议会制有一院制与两院制。多数国家是两院制，就是上议院和下议院，也有称参议院和众议院。有的把众议院称为国民议会。上院议员由国家元首任命，下院通过选举产生，期满全部改选。上院有否决权，可以否决下院通过的法案。

普选制

指公民普遍有权参加国家代表机关的选举制度。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曾提出“争取普选权”，作为反对封建专制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的一个政治口号。当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为维护其剥削制度和实行民族压迫，又往往对选举权作种种限制，并在选举中利用各种非法手段，剥夺广大劳动人民的选举权利。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普选制已成为欺骗人民、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工具。

一八七一年，巴黎人民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

政权——巴黎公社。公社规定一切公职人员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代表对选民负责，并且随时可以撤换。在人类历史上，劳动人民第一次真正获得了选举权。

国家杜马

杜马是俄语Дума的译音。市杜马是市参议会。国家杜马是沙俄国家的议会，它比西方国家资产阶级议会残缺不全的民主还要少。

沙俄本来是君主专制独裁政体。但沙皇慑于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形势，在该年八月六日颁布了由内务大臣布里根起草的召开咨议性杜马的法令。规定杜马百分之八十五的席位都给地主，“一个工人代表也不要”。布尔什维克采取积极抵制的正确策略，于十月举行了全俄政治总罢工，使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流产了。为了平息革命的形势，十月十七日沙皇又颁布宣言，答应扩大选举权，召集具有所谓立法权的杜马。这是沙皇引诱农民离开革命，分裂革命力量的诡计。布尔什维克认为，在革命高涨时期参加杜马，等于是帮助沙皇政府诱骗人民脱离革命而走上“宪制”的道路。所以，布尔什维克仍然强调巷战，准备实行武装起义，而对杜马继续采取抵制选举的策略。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于一九〇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召开了第一届国家杜马。农民代表组成的劳动派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和平均分给农民使用的土地法。沙皇感到这届杜马太不驯顺，于七月八日将农民代表占百分之四十的第一届杜马解散。由于环境不利和革命趋于低潮，如果继续采取抵制杜马的策略，便是错误的了。列宁认为需要重新审议一下对杜马

的策略。布尔什维克决定改变方针，在革命低潮时期参加一九〇七年二月二十日召开的第二届杜马，遂同劳动派结成了“左派联盟”，利用杜马作为揭露沙皇、鼓动革命、宣传社会主义的讲坛，使农民摆脱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影响。因此，第二届杜马对沙皇来说更不驯服。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沙皇政府举行政变，解散了第二届杜马，六十五名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被捕流放西伯利亚。

沙皇政府修改选举法，更加限制工人农民和少数民族的选举权，保障农奴制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能充塞到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一日至一九一二年六月九日举行的第三届杜马。沙皇借杜马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资产阶级借杜马来取得沙皇的某种让步。社会民主党有十八名代表参加了第三届杜马。布尔什维克中出现了召回派，要求召回参加第三届黑帮杜马的代表。这在当时情况下，实际是放弃合法斗争，取消革命工作。它遭到列宁的强烈反对。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是第四届杜马时期，有六名布尔什维克代表和七名孟什维克代表参加，起初联合组成一个共同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但因孟什维克取消派代表处处妨碍布尔什维克代表进行革命工作，于一九一三年十月成立了单独的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与党中央及列宁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常在杜马内抨击专制制度，并在杜马外加紧革命活动。但当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全体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代表在讨论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和决定反战集体行动时，由于叛徒告密遭受逮捕，被扣上“叛国”罪名，剥夺代表权，终身流放西伯利亚。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二月革命时，沙皇命令解散第四届杜马。

俄国的杜马从未成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君主权力的立法机构，它只是纠合资产阶级和地主来对付革命的工具。

苏维埃

俄语СОБЕТ译音而来，是会议或代表会议的意思。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中，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七万罢工工人，选出了俄国第一批工人代表苏维埃。随后，彼得堡和许多大城市工人也相继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士兵代表苏维埃。这是在反抗沙皇制度的斗争中革命群众自发创造的权力机关，而为列宁所肯定和赞扬。苏维埃最初是作为各企业的工人代表机关，领导罢工出现的，后来变成了准备起义的机关和发布命令的新政权的雏型。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期间，起义的工人和士兵，根据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经验，首先在彼得格勒，接着在全国各地又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这时，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时期，列宁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但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持苏维埃领导权的情况下，苏维埃被败坏和糟蹋了，变成了清谈馆。七月事变后，苏维埃竟完全是拥护反革命的了。直到在平息科尔尼洛夫的叛乱中，苏维埃才摆脱掉妥协派的幻想，重新活跃壮大起来，这时已是由布尔什维克掌握，并且是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苏维埃了。十月革命中，苏维埃由动员群众的机关变为起义的机关，变为政权机关，最后变为新型的国家机关。

列宁认为，苏维埃不是通过国家由上面颁布法律产生，而是依靠人民群众的革命主动精神，从下面建立起来，苏维埃

是工农的直接武装代替脱离人民的常备军；苏维埃的成员不是经过官僚手续而是依民意选出和更换的；苏维埃把立法和执法的职能结合起来；苏维埃也是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能够用来教育、训练和领导广大群众的机关。正是由于苏维埃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比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得多，是巴黎公社的继续和发展，所以，列宁给予苏维埃很高的评价。

“三八”国际妇女节

全世界劳动妇女团结战斗的节日。简称“三八节”或“妇女节”。

一九〇九年三月八日，美国芝加哥的妇女和全国的纺织工业及服装工业的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示威和游行，要求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获得选举权。这一斗争得到美国和全世界广大劳动妇女的热烈支持和响应。

一九一〇年八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根据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国际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书记克拉拉·蔡特金的倡议，通过把三月八日定为国际劳动妇女节的决议，以团结全世界广大劳动妇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反对压迫，争取妇女解放。我国妇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召开第一次群众性的“三八”纪念大会。解放后我国政府规定三月八日为妇女节。

“五一”国际劳动节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团结战斗的节日。简称“五一节”或“劳动节”。

一八八四年美国和加拿大的八个工人团体在美国芝加哥开会，决定在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举行大罢工，以争取实现工作、教育、休息各八小时的“三八制”。五月一日那天，美国芝加哥等地二十万工人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由于工人们坚持斗争，取得了胜利，争取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权利。为了纪念美国工人这次罢工斗争，显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力量，一八八九年在恩格斯领导下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成立大会上，决定以象征工人阶级团结、斗争和胜利的五月一日为国际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节日。这项决定得到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热烈响应。从此，五月一日就成为世界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加强国际团结的伟大的战斗的节日。一九二〇年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大规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解放后，我国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规定五月一日为劳动节。

容克地主

“容克”是德文Junker的译音，意为乡绅。原指德国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贵族地主阶级，后泛指德国的整个地主阶级。容克地主阶级形成于十六世纪，以贵族武士阶层为其社会基础。它和一般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地主阶级不同，容克地主既占有大量土地，又经营商品经济，同世界市场有密切联系。在普鲁士王国的几百年中，容克地主阶级一直掌握着政治和

军事的领导权，是德国军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重要支柱。家中男子按习惯通常留一人经营庄园，其余都去做武官或文官。容克地主的这种统治地位是普鲁士以及后来德意志帝国建立军国主义和警察官僚制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到十九世纪末，虽然德国资产阶级实力超过容克地主阶级，但后者在国家机关和军队中仍占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帝国主义就成为容克——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容克地主阶级和垄断资本密切勾结，两者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德国的大地主，同时也是德国的大工业家。他们一同积极参加准备和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容克地主把持着德国参谋本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容克地主仍然保持其经济和政治的地位，具有一定的势力。

第三等级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法国的社会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高级僧侣、教士和神父。第二等级是高级贵族、小贵族。以上两个等级总人数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占有全国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土地，无纳税义务。其余全属第三等级，包括资产阶级、富农、贵族自由派、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城市平民、工人和广大农民。他们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担负着全国的纳税义务。在封建等级代表会议里，第三等级不能与第一、第二等级合厅开会，每个等级只有一个表决权。

从狭义来说，第三等级一般指资产阶级。

工人贵族

工人阶级队伍中被资产阶级收买的极少数上层分子。工人贵族是产生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由于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壮大，工人运动的发展，资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难以破坏和控制工人运动了，因而不得不在工人中寻找资本主义的社会支柱。资产阶级从剥削所获得的超额利润中，拿出极小的一部分，用来收买和腐蚀工人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分子，尤其是工人领袖和上层分子，给他们优于其他工人群众的高额薪金，使他们中有些人握有若干数量的企业股票，安排他们在企业和公用事业管理机关里担任种种好差事，使他们在国家中享有某种特权和处于优裕的社会地位，使这些工人领袖和上层分子完全贵族化和资产阶级化。资产阶级利用工人贵族在工人阶级中散布阶级合作和改良主义主张，出卖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分裂和破坏工人运动，使这些由无产阶级蜕化为资产阶级的分子成为他们的代理人，成为资本主义的看门狗，从而使工人阶级屈服于资产阶级的统治。

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

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是：（一）细胞学说。它是论述生物体的结构及其发育的理论，由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1804—1881）和德国动物学家施旺（1810—1882）所创立。细胞学说指出了动植物的内部联系，证明了生命起源的共同性，整个有机界从最简单的生物（最低级的除外）到人，都是建立在“细胞”的基础上，从而动摇了“上帝分别创造动植物”

的唯心主义谬论，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提供了科学根据。

(二)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它是由英国物理学家焦耳(1818—1889)、德国自然科学家迈尔(1814—1878)等人研究发现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说明能在量上是守恒的，既不能消灭，也不能创造，一切形态的能都是互相转化的，而这种转化的能力是物质本身所固有的。如煤在燃烧时，化学能就转化为热能；用这种热能来发电，则热能就可转化为电能；用电来开动机器，则电能又转化为机械能等等。恩格斯指出：这种现象说明“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1页)

(三)达尔文进化论。它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关于生物界物种变化发展的理论。它指出整个生物界都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人类也是由一种古猿进化而来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把变化、发展和普遍联系的观点带进了生物界。恩格斯指出：“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0页)由于这三大发现有力地打击了宗教迷信、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世界观，初步揭示了自然界的联系和发展，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创立提供了丰富的自然科学材料，所以说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前提。

橡皮决议

指一九〇〇年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

所通过的一个由考茨基提出的含义暧昧的代表中派立场的决议。

这次大会，讨论了《关于夺取社会权力和与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的提案，中心内容是讨论法国社会党领导人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问题。讨论中分为左、中、右三派。以盖得、卢森堡为首的左派，坚决反对并谴责了米勒兰的叛卖行为，主张对米勒兰实行严厉制裁；以伯恩施坦、饶勒斯（法国社会党）为头子的右派，极力为米勒兰辩护，认为这是情有可原的，是为了拯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由此可以和平取得政权等等；以考茨基为头子的中派，起草了一项调和折中的决议，粉饰米勒兰的叛卖行为，认为这是与困难环境进行斗争时所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暂时和特殊的手段，因而如果在个别场合下，政治形势要求这种冒险尝试，则不应该在国际代表大会上加以讨论。也就是说，米勒兰入阁，不是原则问题，而是具体策略问题。由于当时左派居于少数，结果大会以二十九票对九票通过了这项决议。由于它以模棱两可有弹性的词句代替了右派露骨的言词，巧妙地掩盖了机会主义的实质，故称之为“橡皮决议”。同时，在德文中，“橡皮”和“考茨基”的发音很相近。

“民族文化自治”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第二国际和奥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奥托·鲍威尔提出，而为俄国犹太资产阶级政党和崩得派以及孟什维克所鼓吹的在民族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纲领。

这个纲领否认民族和地域的关系，要求同一民族不管居住得如何分散，一定要把他们组织起来，组成“自治”团体，

强迫自己的成员纳税，建立民族议会，有本民族的“大臣”，按民族划分国民学校，按民族特征建立工会，把工人政党按民族分成几个小党，确立和巩固民族主义。这个纲领把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分隔开，使各个民族的劳动人民只关心文化问题，鼓吹被压迫民族在全部政治和经济权力仍操纵在统治民族手中的条件下，设立有自己文化机关的权利，而这个文化机关又是赞美过“安息日”和“犹太行话”，维护犹太帮会，保存一切落后的东西，妨碍走上高级的文化阶段。这个纲领把犹太人和一切非犹太的东西分隔开，加深民族间的隔阂，挑唆各民族的工人相互斗殴，策划犹太工人和犹太资产阶级合伙，使每个民族的劳动者服从本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

由此可见，“民族文化自治”的理论和纲领是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神圣化，用来腐蚀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的机会主义纲领。列宁在批判“民族文化自治”时说：“这个纲领主要的、根本的罪过，就在于它想要实现最精致的和最绝对最彻底的民族主义。”（《列宁全集》第20卷，第16—17页）斯大林也指出：“民族文化自治并不能解决民族问题。不仅如此，它还使民族问题更尖锐，更紊乱，更容易使工人运动的统一遭受破坏，使工人们彼此按民族隔离开来，使他们中间的纠纷加剧下去。”（《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26页）

民族自决权

列宁在论述民族问题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联合起来，——这就是

马克思主义教导给工人门的民族问题纲领。

民族自决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民族问题时的重要原则。民族自决权主要是民族政治自决，各民族自己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它有权按自治原则安排自己的生活，它有权和其他民族建立联邦关系，它也有权完全分离出去直至成立独立国家。

列宁强调民族自决权，目的在于反对民族压迫和兼并，消除民族隔阂和互不信任。列宁认为，压迫民族应坚持“分离自由”，否则就不是国际主义；被压迫民族应坚持“联合自由”，否则不能达到民族联合。列宁的意图是使各民族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联合起来，打破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压迫和束缚，求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在此基础上根据自愿原则，由各民族实行平等的联合。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只有消灭阶级压迫，才能消灭民族压迫。民族自决权、分离权问题的解决，应根据社会发展的利益，应服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如果民族分立意味着削弱帝国主义而加强革命阵地，意味着被压迫的殖民地民族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就应该赞成分立；如果民族分立意味着削弱革命力量而加强帝国主义阵地，意味着破坏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把某一民族拉出去重新遭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就要坚决反对这种分立。所以，决不能把承认民族自决权同某一民族实行分离是否适当混为一谈，必须结合具体的国际条件和阶级斗争的利益来加以考虑。

“社会主义殖民政策”

是第二国际一九〇四年阿姆斯特丹和一九〇七年斯图加特第六、第七两次代表大会上，以荷兰万·科尔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在殖民地问题上提出的谬论。

万·科尔认为，不应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谴责一切殖民统治，认为在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后出现新的需要，将使殖民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是必要的，也必须实行殖民政策。也有人认为，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或许可以起到传播文明的作用。万·科尔等人主张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只应限于争取在殖民地内实行一些社会改革。这就是“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由来。

列宁对这种机会主义论调进行了坚决的批判，指出，“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资产阶级实际上是在殖民地实行奴役制度，社会主义者竟然承认殖民政策，这就是直接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殖民国家的侵略行径辩护。

“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伯恩施坦一八九八年在《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中，首次提出的臭名远扬的修正主义谬论。他说：“我公开地承认，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我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无论这一目的是什么，它对我说来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我把运动理解为既是社会的一般运动即社会进步，也是促进这一进步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德国工业有所发展，商业比较繁荣，

伯恩施坦就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崩溃”的概念是“彻底虚妄的”，社会主义不是一代人能实现的，用不着用这个“模糊的‘最终目的’”去鼓动无产阶级。他辱骂马克思主义是“布朗基主义”，诅咒最终目的是“空谈”，暴力革命是“大灾变”。他主张调和阶级矛盾，搞改良主义：“经济生活监督权的扩张”、“社会义务的范围不断的扩大”、“民主的自治机构的成立”、“改选国家制度的改革”，还有职工会、合作社、议会活动——这就是一切。

伯恩施坦这种修正主义谬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曾受到卢森堡和蔡特金的尖锐批评。列宁给伯恩施坦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他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指出：“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列宁选集》第2卷，第7页）

“超帝国主义论”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考茨基在《帝国主义》、《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等文章中，杜撰出来的一种骗人理论。他宣称，随着国际垄断组织的发展，帝国主义可以进入一个由战争转向和平的“超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即所谓全世界各帝国主义彼此联合而不是互相斗争的阶段，也就是“由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的阶段。考茨基认为，那时

这种统一的世界托拉斯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战争、军备竞赛、生产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

这种理论完全是粉饰帝国主义的机会主义谬论。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中都给予有力的批判，指出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抹杀帝国主义的固有矛盾和反动本质，掩盖帝国主义战争的深刻根源，漠视了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幻想在帝国主义时代矛盾会大大“缓和”，能有停止战争、建立永久和平的“新阶段”，以转移群众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现代的尖锐问题，而去等待将来所谓超帝国主义的虚假前途。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能达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新阶段的。尽管各帝国主义在瓜分世界中可能组成几个彼此敌对的联盟，甚至所有帝国主义结成一个联盟，但这种联盟毕竟是暂时的，不管帝国主义头子们在订立联盟时如何信誓旦旦，其实都不过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列宁说，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不过是“超等废话”，除了欺骗群众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战略和策略

战略是指导阶级斗争在一定历史阶段内全局的方略。它依据革命斗争的基本内容和性质，确定革命的依靠力量、可以争取联合的力量和打击的对象，预见长远的斗争进程并规定最终目标，制定出总方针总政策，并准备和运用相应的物质力量以保证总路线总任务的实现。

策略与战略相对，策略是为实现战略任务的要求并适应

革命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对策，策略研究局部性的阶级斗争指导规律，是一种斗争艺术，它依据当前的形势特点，提出斗争的具体口号，选定斗争最有利的形式和方法，决定斗争最有效的途径和手段，从而取得局部斗争的胜利。

战略和策略的关系是：战略决定策略，策略服从战略和为达到战略目标服务。战略是关键性的，战略上的错误会导致革命斗争的失败和严重损失，但策略也不是可以漠视的，战略任务必须通过各局部的策略任务一步步地完成。

战略在一定历史阶段内具有相对稳定性，策略则在战略原则许可的范围内要求有较大的灵活性。在战略上要打倒敌人，在策略上则可以暂时退让、妥协、通融，在具体斗争中需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在军事方面，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则要重视敌人。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的重要原理。

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 发展不平衡的规律

列宁发现，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客观规律。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条件下，不平衡原是生产发展不可分离的特征；但在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大体上还是进化式地，而不是跳跃式地赶上和超过其他国家。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这种情况就根本改变了。这时，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技术迅速发展，垄断组织已经形成，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出现了资本输出，帝国主义列强已完成了世界领土分割和经

济分割，各列强间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尖锐起来。在这些条件下，一些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较晚的国家，利用技术进步的成果，跳跃式地赶上或超过较老的手，无情地把另一些国家排挤出世界市场，并定期地用战争重新分割已被瓜分完毕的世界。帝国主义者为了夺取市场和势力范围走向武装冲突，一方面削弱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另一方面也使无产阶级容易冲破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下，曾得出社会主义必须在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结论。而列宁则根据帝国主义新的历史条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论欧洲联邦口号》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所创立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理论，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发挥革命的主动性，冲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在个别国家首先夺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

战时共产主义

一九一八到一九二〇年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非常时期，苏维埃政权所实行的一种带有临时性质的战时措施。

在战争和国家经济遭受破坏的严重情况下，为动员国内一切资源保证国防需要，在商品缺乏和极度贫困的情况下，为供应前线军队和后方工人、农民不可缺少的粮食和工业品，苏维埃政府实行下列经济政策：

除大工业企业早已由国家控制外，中小工业企业也由国家掌握管理，各企业不独立进行经济核算，实行实物供给制，所有企业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的供应以及产品的分配，都凭中央管理机关的领物证进行。

对有劳动能力的人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不劳动者不得食”，迫使资产阶级分子参加必需的体力劳动，以便抽出更多的工人到前线去从事更为重要的战斗。

颁布余粮收集制，按国家规定的固定价格收集农民的一切剩余粮食，禁止私人贩卖粮食，对粮食投机商作国家罪犯惩处。

实行对外贸易国家垄断制；在国内也有计划、有组织地以产品分配来代替私人商品贸易，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生产消费公社中去，对工人发给有限的配给票。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基础是工人和农民在反对白卫军和外国武装干涉者斗争中结成的军事政治联盟。这一政策对苏俄战胜国内阶级敌人和打败外国武装干涉者的斗争，曾起过重大的历史作用，但是，战时共产主义并不是一切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经阶段。

新经济政策

列宁拟定的在过渡时期实行的经济政策，为了有别于战时共产主义的旧政策，故称新经济政策。一九二一年三月党的“十大”通过后实行。

征缴一切剩余粮食的余粮收集制，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已同农民的利益发生了严重抵触。由于商品的缺乏，农民上缴了粮食，事实上常常得不到什么工业品；另一方面，过低的口

粮配给和极度疲惫，也使工人感到不满；而反革命分子正在利用这些不满情绪煽动叛乱。

列宁认识到不能再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下过日子了。除了工农军事政治联盟外，还需巩固工农经济联盟，建立城乡联系，尤其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努力经营的兴趣。党决定以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农民可以自由出售超过税额的剩余粮食，以换取所需的工业品。新经济政策不是直接产品调拨、绕过市场来战胜资本主义，而是利用商品货币、通过市场来战胜资本主义。

新经济政策在国营企业中实行经济核算制，强调经营管理，照顾职工物质利益。在商业中，由国家调节市场，允许自由贸易和私商存在。在农业中允许有限的租佃和雇工。列宁还提出“租让和合营公司”——吸收外国资本和技术力量。

新经济政策是一种两重性政策：在主要经济命脉由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的某种存在，它在最初阶段曾在某种程度上便利了富农和城市私商的发展；但是，新经济政策更多的是帮助了社会主义成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它是社会主义成分利用资产阶级的方法和武器来克服和消灭资本主义成分，它预计到两种经济成分在“谁战胜谁”的斗争中，将造成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势。

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底，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工人农民物质状况初步改善，国内政局趋于稳定；第二阶段，一九二六至一九三六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在工业、农业和商业中完全占了统治地位，新经济政策时期也就结束了。

同过急的、直线式的、没有准备好的战时共产主义相比，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是一种迂回包围敌人的办法，它是在发展生产力、巩固工农联盟、有胜利保障的情况下再进行进攻，以排除私人资本。不容置疑，新经济政策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无产阶级政策。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为了对付日益严重的法西斯恐怖和侵略的威胁，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及建立更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策略。

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为基础，建立无产阶级统一的群众性政党，工会也相应地统一为职工国际；动员和团结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组成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以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苏、美、英、中等二十六个国家又签订“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号召运用军事经济全部资源对抗企图征服世界的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结成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

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不同社会集团也追求着不同的目的。但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在保障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上，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